

02	主編的話 陳恒安
04	校史在於揭露：博物館做為一種方法 江映青
08	為什麼我們需要「符合當代」的校史與大學史的書寫與研究？ 游婕妤
12	國立成功大學校本部Google街景史 房子尊
16	見證政策轉變的國立成功大學校本部校區變遷 李皓雯
19	「故鄉、異鄉、歸鄉」：成大醫學院創院院長認同之旅的心理傳記探查 李貽峻
22	物中的校史密碼－以成大博物館藏物理系與成大電機系傳世電力教學文物研究為例 廖伯豪
30	把校史裝進地圖打包帶走 陳浥潔
36	學者與歷史：道教研究在成大的發軔 劉韋廷
42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系與臺灣史研究 王政中
46	本是同根生、校史沒有提：「成大」機械、航太兩系的人與事 曾令毅
52	筑波大學的歷史和檔案：建校150週年 Yukari Tanaka田中友香理
58	國立成功大學的校園規劃運作機制之發展歷程 蔡侑樺
64	校史數位化及其應用討論 李柏霖
67	校史的幻想：衣櫃 王立儂
70	學生運動與社會參與 孫嘉穗
73	野百合時代的西格瑪社員 劉欣儒
80	2022年10月～2022年12月校園大事記 編輯室
87	成大博物館校史與機構史研討會議程表

2022年冬季號

1971年9月《國立成功大學校刊》創刊

2008年4月改版更名《成大》

中華郵政臺南雜字第53號交寄

登記證登記為雜誌交寄

發行人 | 蘇慧貞
召集人 | 王育民
副召集人 | 蔡群立、王秀雲
總編輯 | 陳恒安
編輯委員 | 王健文、王筱雯、王逸琳、白明奇、陳一菁、
陳政宏、陳家煌、黃恩宇、黃尊禧、楊倍昌、
蔡群立、蕭世裕、簡聖芬（按姓名筆劃排列）

視覺顧問 | 顧盼
執行編輯 | 曹沛雯
特約編輯 | 谷文瑞
特約採訪編輯 | 江映青
封面題字 | 董陽孜
行政 | 教務處校刊編輯委員會
出版者 | 國立成功大學

地址 | 臺南市大學路1號
電話 | 06-2757575-50202 轉 36
傳真 | 06-2766413
網頁 | <http://magazine.web2.ncku.edu.tw>
印製 | 社團法人高雄市寶慶身心障礙福利協會
07-3877006 
美術編輯 | 天晴文化事業 06-2933266（代表號）

塵世是可能性的王國

歷史是殘缺不全的知識

Paul Veyne 〈人如何書寫歷史〉

你想為人間消除邪熱
解脫勞乏，你的言語是晦澀的
卻令我們清心明目
也斯 〈給苦瓜的頌詩〉

亞里斯多德宇宙模型裡，以地球為中心的「月下區」，是由風火土水四種元素互動所組成的塵世，充滿各種可能。塵世的繽紛歷史，便在此可能性中展開。憑藉變動世界中所留下的痕跡、證據、史料，人們重構歷史，但殘缺不全。全整「大歷史」的理想不可得時，我們該如何面對歷史，成大又該如何面對成大校史？

「讓過去變得更好」非指任意改寫過去，更非僅僅揀選「榮耀事蹟」來號召向心以強化認同。浪漫懷舊與緬懷光榮固然美好，但愛爾蘭劇作家蕭伯納卻也曾提醒：「快樂一輩子？沒人可以承受它！那將會是人間地獄。」若是如此，殘缺不全，甚至可能言語晦澀的歷史書寫，是否反而能成為我們朝向未來時的苦瓜，令我們清心明目！

2021年成大90周年校史，承繼了《成大八十·再訪青春》叢書體例，推出《南方歲時記》、《南方歌未央》、《藏形見光》與《無不有風》四冊校史專書。不僅在理論上反映歷史學界關注社會史、文化史、生活史與記憶研究的趨勢，在議題上更勇於反省大學始終尚少觸及的「不易面對的過去」(difficult past)、「負面遺產」(undesirable heritage)，甚至「危險的過去」(dangerous past)。譬如成大校史開始探索成大共產黨事件背後年輕學子的熱情想像，以及因爭議而中止的大學法人化與自治治理案件申請。

某次校史工作坊討論，眾人皆同意，以學校資源推動的校史書寫宜重「公共性」。但「公共性」是什麼？以歷史學來說，後現代許諾了多元之後，單一的歷史視角大概是不再受歡迎了。但是，「異質的，具有動態認同的我們」是否仍需要某種的「秩序」，以避免落入相對主義？當然，這個「秩序」必須是能夠尊重並接納獨特性的價值體系。以大學發展的歷史來說，這樣的價值會是什麼，是所謂的大學精神嗎？若是如此，那麼縮小尺度先回到成大自身，關注公共性的成大校史究竟提煉出來什麼樣的成大精神呢？80周年校史主編發現了永遠指向天際飛舞的「青春」之火，90周年校史主編則感受到「藏形」之間的風與光。青春與藏形似乎矛盾，但細究之下卻也不盡然。畢竟青春之火必須不斷透過再訪的行動才得以彰顯。而既然必須再訪，不也正說明了有些珍貴價值依舊隱藏在令人目盲的五色塵世間。

人人都可以是自己的歷史學家的時代，校史書寫團隊主動自我分工，揀選了較具公共性的議題。但是，校史相關活動與出版在最重要目的，更是期待所有成大人都能親自再訪大學歷史，並為自己的存在與過去的關係賦予自我意義。

成大277作為「校史專輯」，收錄了2022年11月「大學史與機構史研討會」專題演講、校史論文、校史共筆，以及校友座談的精要內容，為90周年校史書寫計畫畫下句點。但計畫句點並非歷史思索與書寫的終結。期待此專輯不僅能紀錄成大思索並典藏大學的足跡，更能伴隨所有成大人共同辨認值得珍視的傳統與成就，探索被意外失聲或被刻意禁聲的過去，並選擇適當媒介與勇敢當代社會多元閱讀者互動！

校史在於揭露

博物館做為一種方法

專題演講講者：國家教育研究院／林崇熙

資料整理與撰文：成大博物館／江映青

11月15日在國際會議廳舉辦的「校史與機構史研討會」，上午第二場演講者是國家教育研究院林崇熙院長。關於林院長的名字，一路出現在STS學會、通識教育、未來學院到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國家教育研究院，這些看似超跨領域卻又有所相通線索的地方，似乎也很好地解釋了今天的講題，博物館如何做為大學校史的方法？

首先林院長重新釐清「大學是個什麼樣的機構？」他先提出大學的四個目的：社會良心／眾說異議／優良學術／培育人才，其中特別強調，大學必須是社會的良心，並且容納異議的聲音在校園中安全地發聲，以海納百川的精神讓校內師生能夠看到、聽到不同立場；而我們普遍認知大學致力的學術研究，也應回應到「社會良心」的角色，以解決社會問題、協助應對社會風險，不僅只是增加論文發表數量而已；甚至、更應前瞻地挖掘潛在的問題，比如日本科學廳早在1970年代就已經在為高齡化社會做準備。因此，在林院長列出的四個「大學目的」，都和社會連結、具有「社會」性質，反而媒體最愛報導的「企業最愛」、「百大排名」都不在其中。

這幾年教育部大力推動USR計畫（大學社會責任），林院長也提到，許多時候難免只是為了爭取計畫經費，他期許真正的極致是大學內的每一個系所都能解決社會問題，而每一位老師的研究，都能做到USR，如此教學本身就已經是實踐大學社會責任的過程。

而好的校史/校史館，就是將一所大學為了上述四個目的的努力和成果呈現/揭露出來，包括做到什麼（what）、當時為何如此做（why）、及促成（尤其是突破）的歷程（how），而人時地（who, when, where）則是做為內容元素，也就因此，個人做為上



述歷程中的一部份，其實無須特別凸顯，尤其，校史不應該排除那些被校方視為「異議」、「難以管理的頭痛份子/社團」的內容。

「揭露」在於讓人看見「重要但是看不見」之處。書寫者不需要做批判，只需打開黑箱，讓人們走一遭歷史，了解事情經過。林院長提出三個層次 what-why-how，先是呈現重大事件或幽微的轉折，再則提出解釋，以1986年美國挑戰者號太空梭爆炸的事件為例，要解釋原因並非只是故障零件的名稱，而是組織（NASA）的文化，當時提出故障問題卻被忽略，而導致最後悲劇發生。最後一個層次是事情發展的模式和運作機制，也是到這個層次才能真正討論未來如何行動。

「揭露」不只是呈現，更需要解釋。林院長舉出幾個國內館舍展示銀錠和原住民族服飾的案例，如果只是陳列，沒有物件背後的歷史故事、脈絡的解釋，其實並無助於觀眾瞭解。至於與科學相關的展覽，往往只呈現「展示/知識本身就是真相」，而不談該知識是如何形成的「真相」，消除了討論科學發展中常見利益糾葛、政治考量、商業介入、時間性、地域性、文化性和社會運作過程的一切可能性。

回到大學校史。世界排名不是重要的事情，最重要的，是「我們自認什麼是優秀的大學？」林院長認為這是需要在校史當中一再思考的問題，同時也是為什麼他建議將博物館做為一種方法來書寫校史。基於本身在博物館服務多年的經驗，林院長先將博物館的「內蘊」舉列出以下五項：揭露、異質地誌、灰色地帶、交會區、公共領域。關於「異質地誌」，先以公墓區、遊樂園等在生活中存在，卻並非每天會去或經常接觸的場域為例，人們在其中通常能夠拋開日常束縛和習慣。博物館亦是如此，可以將不同的時空、領域、主題容納入同一個場域中

（例如科博館的大象骸骨和半導體），展現文化的多樣性，也不會讓人感覺不合理或突兀，這樣異質的特性，讓策展人能有意識地安排各種文化的交會。像是處理過去威權時代下遭到扭曲的史實，博物館透過將各方史料、觀點並陳，讓交會不只是提供發聲，也能做到揭露。

「文明的發展中，能夠促成改變的都是灰色地帶。」林院長以一張白、灰、黑色的同心圓說明，位於白色圓心的主流權力勢必鞏固自身的力量，害怕改變，而國立大學通常就代表著圓心中的典範、常規、正常等主流價值，而灰色地帶的社會爭議、科學爭議、異常、冒險常被避開，但突破、挑戰、創新也在其中；唯有藉由灰色地帶，才能逐漸改變黑色的怪力亂神、迷信、不合法、造成社會危險的觀念和事物。

如果套用在大學體系當中，林院長認為，最能夠代表「灰色地帶」的就是通識教育，儘管在學校中經常被忽略、缺乏經費，但「被忽略有個好處，就是沒有人會管你」，同時也會激發出更多創意的想法和做法，去爭取各方經費支持；另外，諸如服務學習、社團等，也都具有灰色地帶的性質，學校如果能夠善加把握，必定能夠促成突破和進步。放在博物館的領域來看，灰色地帶就是地方文化館作為代表了。

博物館的公共性近年來不斷地被強調和討論，林院長認為「公共性」並不只是單一特質，如何透過公共性經營展現博物館的力量，才是重點。「公開」只是其中的一部分，還有廣納性、需求性、關係性、行動性。現在的博物館必須廣納各方的力量進來，不再只是由內部的館員/研究員策展（或許也就獨佔了詮釋權和單一觀點），而以博物館的展覽經費規模，也不可能是每個人或單位都達得到，想要

廣納不同聲音，線上策展就是一種不錯的方式。臺史博目前已完成線上策展平台「時空旅行社」，每個人都可以進行策展，讓大家一起寫歷史；另外，設計針對身障、視障者等的各種輔具，以及方便讓偏鄉孩童能觀看的VR展覽，也是增加博物館的近用。「廣納」也包含了社會各種組成的移民，像是臺史博已經設有印尼、泰國等東南亞國家語言的語音導覽服務。如果是在大學博物館、校史館，有時候難有夠多的資源支持典藏，也可以藉由經營與其他館舍或收藏家的關係，借典藏品來進行策展。林院長舉台史博和臺南一中校史館合作的黑膠唱片展和台史博的戰後社會運動展為例，無論是在展品借展上的合作，或是邀不同觀點立場的民眾參與換展策展，都能讓展示的內容更豐富，當歷史和展示的詮釋權不再僅限於博物館內人員，多元立場的參與和呈現，避免特定意識型態偏頗，也讓博物館發揮更多力量。

在公共性當中，林院長表示「需求性」是最困難的，因為博物館很難瞭解觀眾真正的需求是什麼，如果能將傳統一般展示的「供給式」翻轉過來，先考慮觀眾/師生/校友的需求，再針對需求規劃展示，但當前的觀眾/師生/校友究竟需要什麼？林院長提出一種可能的方式：「面對當代議題與歷史對話」。以新竹科學園區即將徵收寶山鄉客家聚落的土地為例，對照臺灣自20世紀初興盛至70年代的糖業，日治時期亦徵收大片土地供給糖業株式會社，以及數年前新竹科學園區擴張的苗栗大埔事件，其實都有許多相同可參照之處。

博物館有其力量，但需要經營，沒有改變，就不會有力量。林院長說，現在讓大學生修滿128學分，以為吸收這麼多知識學生就會有能力/力量，其實無法證成是否真的如此，以往大家堅信不移的「知識就是力量」，更應該修改成「知識+行動=力量」，不只如此，還應該注意能量是否有運用在對的地方，是否有對應到需求，搭配適當的關係網絡，加上自身的行動，才能產生真正的力量。無論是大學內各校系培養學生，或是大學做為社會良心，都需要改變的力量，因此上述的做法亦是相通的。

最後，林院長對「博物館做為一種揭露校史的方法」給出總結的一些建議做法：

- 一、呈現大學做為社會良心。
- 二、呈現大學為了解決重大社會問題而進行的優良學術研究。不只是看產學合作計畫的金額數字。
- 三、呈現大學培養了優秀的社會人才，對社會卓有貢獻。上市企業的董事長不見得就是傑出校友。
- 四、揭露大學（系所）興衰盛亡的歷程機制。
- 五、揭露大學IR（校務研究）研究成果。例如畢業生出社會後的走向、就業模式等。
- 六、揭露大學重大事件/關鍵轉折/重大突破的歷程始末與影響。像是成大成立大學部不分系，過程中需要重重突破的困難等。
- 七、發揮博物館之為公共領域的特質，鼓勵師生校友進行校史共筆。此亦可促進校友對母校的向心力。校友不只是捐款，也可以捐記憶、觀點、故事、給學校的建言等，建議善用各種網路平台。
- 八、發揮博物館之為異質地誌的特質，就當前重要議題進行古今中外案例的對話。青年學生對未來的茫然、房價負擔重、低薪等，或許並不只是現下的社會問題，透過古今中外類似的事件並陳，可以有機會進行不同的對話。
- 九、發揮博物館之為灰色地帶的特質，鼓勵呈現相對於權力核心的異質觀點與突破性挑戰。

十、發揮博物館交會區的特質，設定某一議題，徵求各系所從該專業立場出發的觀點，以促進跨領域交會。由此而逐漸營造出大學博物館/校史館之為校園內的跨領域交會場域。如此也能凸顯各系所立場的侷限，有助於思考大學教育的問題。

十一、從校友訪談歸納分析出職涯發展成功模式，以回饋大學教學模式改進。

呼應先前所提到，知識必須加上行動，才能產生力量；博物館的內蘊特質（揭露、異質地誌等）必須發揮在公共性、廣納性、需求性等方面，也才能夠展現力量。不僅只是為了讓博物館/校史館成為大家喜歡來的地方，亦是為了成為大家能一起加入討論學校未來方向的場域，身在大學中的我們有哪些地方忽略了？壓抑了？我們應該做出什麼改變？林院長期許大學博物館/校史館能夠發揮巨大的力量，幫助大學真正成為社會的良心。

「符合當代」的校史與大學史 為什麼我們需要 的書寫與研究？

資料整理與撰文：成大歷史系/游婕妤
論文發表人：成大歷史系/陳恒安



校史或大學史一直以來都不是廣義歷史領域研究中的熱門主題，且多著重於作品的直接功能性與目標性，因此過往的校史書寫主題，大多圍繞在學校的組織結構、典章制度、大學師生與畢業校友，以及機構或人物相關的知識史與生活史。然而，許多在傳統校史範疇之外的「小人物」、校園環境中習以為常的空間配置與草木魚蟲，以及難以啟齒、正視的「陰暗過去」，卻是現今校史應當拓展的學術視野與專業倫理的實踐，也是一個可以思考、因應當代面臨的問題與需求的重要途徑。

今日，何謂校史？校史書寫的視野與意義

校史的書寫是一種將知識與行動結合的實踐方式，而校史是什麼？要選擇述說哪些主題？以及為什麼我們需要書寫校史？透過梳理這些問題，便可更進一步描繪出21世紀的現在，臺灣究竟需要什麼樣的大學？以及，今日，大學能知道什麼？大學應該做什麼？大學可以期望什麼？以此來回應當代更多面向的社會問題。

書寫校史，其中一個明顯的作用，便是可以透過人們對於學校回憶的累積，凝聚校內人士的向心力、認同與歸屬感。然而，當這個校園裡的人們在定義自己的校園生活圈、凝聚「認同」之時，卻也會因此產生「排他性」，而有內外之別，並衍生出「誰」可以掌握述說校史的話語權的討論。對於他校人士、社區居民等群體來說，一個學校的歷史書寫與研究又能帶來什麼樣的意義，則需要先了解學校與社會之間的互動關係。隨著時代的演變，學校系統建立的模式以及其在社會上的功能也會有所轉變。學校也是社會變遷過程中的重要場域之一，因此學校與社會之間有著共

同演化的互動關係，而「校史」所要互動的人群，也就顯然不僅限於學校裡的行政人員、老師、同學或畢業校友，而是也進入了公共的場域，和在社會的演進中共同發展的不同群體建立關係，如社區居民、市民等等，進行互動與溝通，以共同面對當代社會中所衍生出的各個不同層面的問題。

在全球化的發展下，「學校」除了具有培育人才的功能之外，亦有需要重視的社會責任，而若要能夠讓學校成為社會信任的機構，「歷史」便是一項重要的材料與基礎。學校若能面對過往的歷史，正視過往的所作所為，即是在向社會宣示這所學校具有反省並願意再次改正過錯的能力與特質，是與時漸進、樂於轉變，同時考慮可以讓社會大眾信任的機構，以及和社會中各個群體互動的機構。而在全球化、國際化的快速發展與變遷之下，個人與一個固定的群體或是固定的環境之間，也不如過往可以透過長時間地培養來建立情感連結，因此，校史的建立便是一項可以讓人們在快速地移動與變遷中，更快與校園有更深的互動、產生連結，以及尋找自我定位與認同的方式。

學校與企業的歷史責任

一般而言，校史作為「宣傳」學校特色與精神的使命從未被忽略，就如同企業為了永續經營發展，同樣需要透過建立品牌來宣傳其所擁有的特殊性。對企業而言，書寫歷史便能夠成為企業對內或對外溝通的重要方式，對內可以凝聚向心，對外則可以透過從以往歷史發展的軌跡中尋找並提煉出與眾不同的價值面向，以營造並宣傳永續品牌的特色，成為民眾得以快速掌握該企業與產品是否值得信賴的依據。讓過去不致成為單純的過去，而能夠成為企

業的人力資源或者行銷部門的重要資源，而得以使其永續發展。對學校而言，歷史書寫也有相同的意義與效果，對內可以凝聚校園向心力與情感認同，若學校勇於面對過往的「陰暗歷史」，對外則可以展現出批判反省的責任感以及積極溝通、轉變的態度，以爭取社會大眾的信任。

當然，負面的歷史議題若處理不善，便可能引發巨大的「公關危機」。舉例來說，1986年的德國Benz汽車公司，在100周年時所出版的企業史書籍《戴姆勒賓士1933-1945：紀錄》，雖展現出主動面對二戰時期的勇氣，然而，Benz對於其在該時期中，強迫外籍勞工勞動的相關爭議與企業的作為卻只是寥寥幾句就匆匆帶過，此舉也因而成為人們抨擊之關鍵。原本Benz率先引領的歷史政治舉措，反而造成了一場公關災難，並多年來影響著公司的形象。這樣的現象同時也反映了當時人們所處的80年代，德國公眾對於歷史觀點的關注與興趣，然而Benz面對該議題時的作法卻不符合大眾的期待。不過，企業如何面對陰暗過去，依然有較為成功的例子與作法。例如成立於納粹時代的福斯汽車公司，在1998年國際訴訟開始後，進一步承認過往實施強制勞動的歷史，也願意為此負起法律與倫理責任，後來甚至將「企業面對陰暗過去」的作為視為該企業的「文化」內涵，以表示其並非只為了短暫的宣傳效果或虛與委蛇，而為長期的社會與歷史責任。雖然，勇於從歷史錯誤中學習的企業願意善盡歷史責任，但也並不代表該企業從此之後就不會再做出引發社會爭議的行為。

從上述的例子，可以發現，企業面對自身錯綜複雜的歷史，依照不同的操作方式，對外可能成為公關災難，但卻也可能成為展現企業歷史責任的契機。

由此可知，雖然面對陰暗過去固然有其風險，但歷史債務並不會因不理睬而不存在。所以，積極主動的面對，才是最好的策略，若是拖延、沉默便容易遭受指責，同時，隱瞞越久，後座力也會越大，不僅無法展現出負責的態度，形象的受損也會越來越嚴重，因此便更無法有效建立起與社會大眾溝通、和解的橋樑，也就更不可能在這樣的社會關係中取得大眾的信任。

從培養歷史的債感開始

因此，大學史的書寫，重點不應在於描述現今的組織結構，或堆砌知識的成果，而是應該展開新的書寫範疇，並透過回溯歷史的軌跡與思考、書寫的歷程，以便更清楚理解當代社會之所以如此建構、運作的各種條件，以及回應當代社會的需求並尋找當代的問題意識。





於是，「符合當代的校史」，不應只是緬懷過去的豐功偉業和偉大人物，凝聚校內人士的情感與認同，也須關注那些不光彩的陰暗過去，和過往常常忽略、不被重視的微小聲音，以及周遭的居民與社會大眾。亦即除了必須符合當代大學的需求、符合所有「大學人」的需求，也需符合當代社會的需求，並且同時要能夠通過當代歷史書寫理論與實踐經驗的檢驗。

然而，如何能夠讓校史的書寫引起各方更多的關注與討論？或許可以從培養歷史的「債感」開始。透過回溯過去的歷史經驗與發展軌跡，便可能讓人們有所認知並思索、感受那些不光彩的「陰暗過去」，進而萌生出責任感或虧欠感，並透過批判與反省，促使人們想透過某些行動來回應這種情感所產生的張力。而有了債感與責任感，也就或許能夠用更謹慎的態度與警醒的距離，來平衡史料與感情之間的拉扯，使歷史書寫不至於陷入資料堆砌或情感動員的困境，而能夠有機會對過往歷史進一步釐清、探究和賦予意義，並透過歷史意識的積極實踐以展望未來。

國立成功大學校本部 Google街景史

論文發表人：連克

資料整理與撰文：成大財經所\房子尊

從一流、頂尖到深耕

連克學長於2007年9月來到成大，就讀歷史學系，因為系級以畢業年算，剛好是100級，也就是民國100年（2011年）畢業，後又繼續就讀成大歷史學研究所，並於民國103年畢業，至今也已畢業8年。在學7年期間，正好經歷成大獲教育部「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和「邁向頂尖大學計畫」（即5年五百億）補助，對於校園的變化有深刻的印象，這是屬於連克學長這一代校友的成大記憶。

2018年，教育部提出「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接續期滿的「邁向頂尖大學計畫」，除追求卓越外，更重視大學的公共性，並強調大學的社會責任（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簡稱USR）。從2006年到2021年，這16年來，成大累積獲上述計畫補助金額已接近200億，且始終是受教育部補助第二高的綜合大學，僅次於臺灣大學。在此基礎上，回顧一流、頂尖到深耕的成大校園，校區與周遭的變化，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多年計畫補助的成果、大學教職員生的日常生活以及學校與周遭社區的關係。



一種新史料：Google街景資料

我們對於歷史的書寫，往往會因史料的性質，而產生若干差異，就如校史的書寫，我們會去查找學校檔案、相簿、刊物或出版品等，又如當代的研究，則需探訪當事人，或可蒐集到私人文書，並進行口述歷史。隨著科技的進步，傳統的照片等影像資料也不再專是特定場合（例如畢業典禮大合照、學士服照等）下的產物，資訊的載體也不再限於傳統的紙質或照片資料，聲音、圖像和影片的數位資料幾乎無處不在，「沒圖沒真相」幾乎成為無人不知的口號。

Google街景資料即是圖像資料的一種進化，最初的構想是「用360度環景來記錄這個真實世界」，美國Google公司於2006年起，執行Google街景計畫，並於隔年開放Google街景服務，提供水平方向360度及垂直方向180度的街道全景，至今已15週年，不只提供了網友們導覽上的便利，讓人們能到達自身無法前往之地，並留下歷史見證。臺灣自2008年起即引進Google街景車拍攝各地景象，首先推出臺北的城市街景，而後普及全臺各縣市。而成大周遭的街景，自2009年起即有完整蒐集，並在2012年還深入各大校區內拍攝，透過多時段的街景考察，留下這13年來人們記憶中的成大景象。

Google街景畢竟是很新的資料，跟歷史學比較沒有太大相關，但連克學長一直在思考，有沒有一種新的資料，對於歷史的撰寫或呈現能有以往沒見過的洞見。這種新史料的形式就是所謂數位人文學（Digital Humanities），很明確的是數位人文的發展的確改變我們研究的方式，那接下來的發展是什麼？早期的數位化，數位典藏一直在追求的是

「量」。像是地圖，中央研究院有GIS中心，會一直掃描地圖，地圖的存量就一直在增加，但「量」到一定程度後，我們就該追求「質」的提升，讓資料庫的功用不再是滿足於一般關鍵字檢索而已，而是與使用者有互動關係，建立人與人之間的網絡，比如說清代職官資料庫，點擊某個官員，就可以看到他的上司和下屬是誰和他的任期等，這樣就有一個網絡關係。因此，從數位典藏進入數位研究，就是「質」方面的提升。另一個例子是臺灣百年歷史地圖，這個系統是運用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地圖與遙測數位典藏計畫」所累積大量的地圖資料，結合Google地圖介面，所建立的全新服務。它的概念其實很簡單，是使用三角定位法，就可以把舊地圖套到現在的Google街景上，且可以調整圖層的透明度，不用註冊帳號就可以直接使用。所以連克學長相信，這種新的科技技術，對於我們對過去的了解是會有一定的改變的，因為它不再像傳統那樣是一直用書寫的方式去呈現歷史。

而Google街景的發展其實也不滿足於僅以地圖去呈現街景，現在最新的發展是「沉浸式街景」（Immersive View）模式，因應電腦視覺和人工智慧的進步，Google能將數十億的街景和空拍圖融合在一起，協助創建一個影像豐富的虛擬世界。全新的沉浸式街景模式，可以體驗當地社區、地標、餐廳的環境，透過畫面的真實感帶來身歷其境的體驗。簡而言之，就是經由各種資訊的累積，把整個城市直接復刻出來，隨著時間的延續，這也會呈現某種程度的歷史，也許未來我們讀歷史不再是讀書，而是去看地圖。過去坊間有個戲稱是，以前的地理課本是歷史，以前的歷史課本是神話，而我們現在其實是可以透過地理去了解過去的歷史的。連克學長

出社會以後，擔任公職人員最早的服務機構是在松山區公所，當時也需擔當粉專的小編，而在看附近的Google街景時，就發現說Google街景其實可以呈現松山區公所這十幾年來的發展，於是就在粉專舉辦有獎徵答，用五張Google街景圖，請網友們排年份的先後順序。松山區歷經鐵路地下化與捷運站的建設，和現今的樣貌已有所不同，而Google街景幫我們保留了這些記憶，去看Google街景即可看到還沒拆掉前的松山車站是什麼模樣。透過這樣的小互動，可以讓民眾知道區公所這十幾年來的景觀變化其實還滿大的，且Google街景很完整地保存了這些資料。和照片資料不一樣的是，這是透過一個系統，同樣的一個角度，而且是一種無意識的儲存。對歷史研究者的角度而言，如果看到的資料是一種有意識的儲存的話，就必須思考那個資料的性質與觀點是什麼，那無意識的資料儲存就被認為說能比較客觀地去解讀歷史，沒有對與錯，只是它資料的型態是這樣。而Google街景還有很多衍生的應用，有時能在一些新聞報導上看到，警察透過Google街景幫助老翁找到回家的路，甚至義大利的警察說，在Google街景看到通緝犯，後來就真的在該處抓到通緝犯。這些例子林林總總還有很多，而這都是新科技帶給我們的方便。

國立成功大學校本部概觀

戰後的成大原僅有成功校區，校本部在二十世紀逐步增購，至二十一世紀已有成功、光復、勝利、自強、建國、力行與敬業七大校區，2008年成大藝術中心以「提升本人文意象，凝聚校園記憶」為題，提出校園命名活動，當時藝術中心慎重起見，考慮諸多因素，尤其是考慮校友的懷舊情感，舉辦好幾波活動，包括命名活動、投票活動等，引起學生校友熱烈回應，活動進行中，多數人傾向不更動校區名稱，因為歷史傳統意義不容取代。活動結束後，藝術中心以「低限度改變、容易記憶」為原則，提案「勝利校區」、「成功校區」不更名，將「光復校區」改名「榕園校區」、「自強校區」更名「至善校區」、「建國校區」更名「成杏校區」，並且以學校附近的路名為主，將「敬業校區」改名「東豐校區」、「力行校區」改名「前鋒校區」，且新增東寧路宿舍區為東寧校區等。而後經過行政會議、校務會議討論，最後決議盡量維持校區名稱不變，僅將「建國校區」更名「成杏校區」，並新增東寧校區。

現今成大校區緊鄰臺南後火車站，交通方便，校址位在臺南市東區大學路1號，但校本部八大校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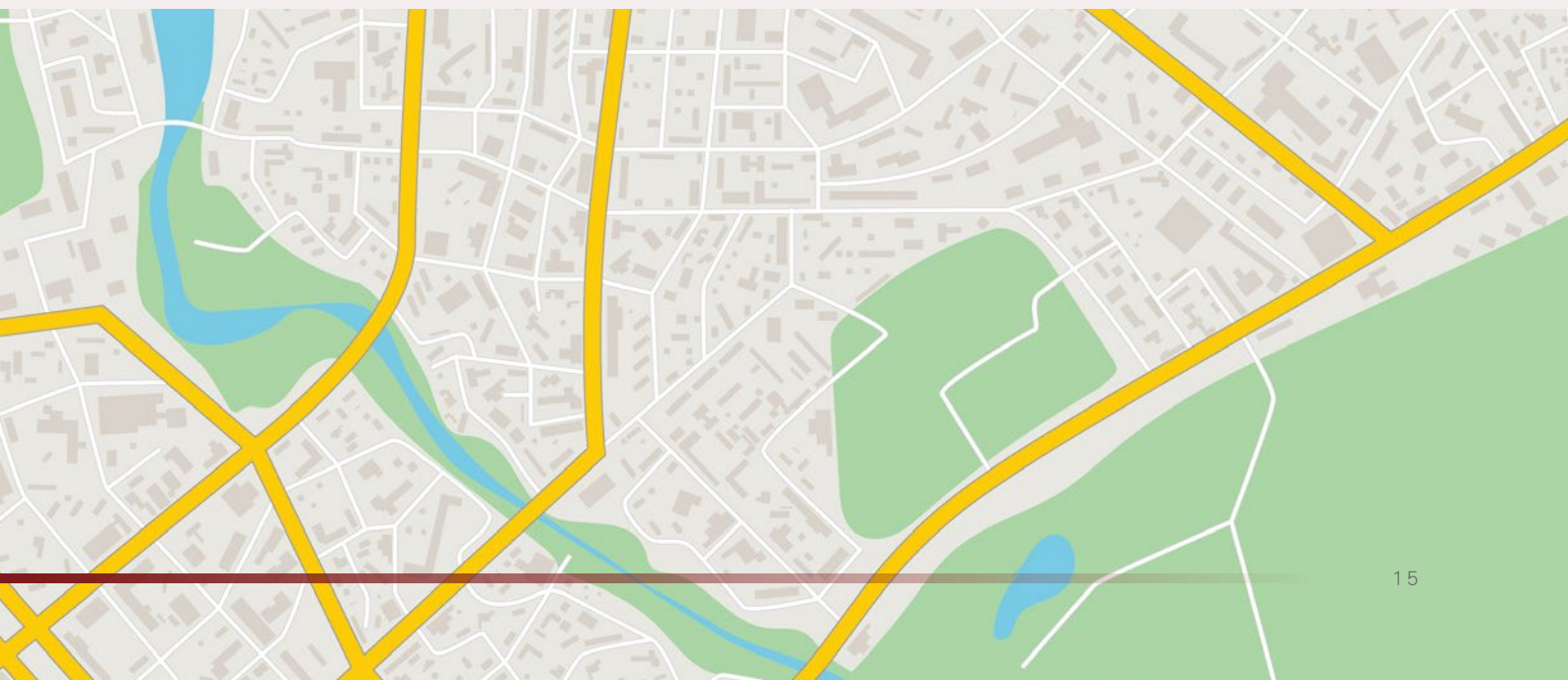
（成功、光復、勝利、自強、成杏、力行、敬業、東寧）以小東路為界，成杏、力行、敬業位在臺南市北區，其餘五個校區則位於臺南市東區。成大校本部周遭的八條道路（東豐路、小東路、大學路、東寧路、前鋒路、勝利路、長榮路、林森路），除了前鋒路臨鐵路用地、東豐路和林森路屬於公園道外，主要為住宅用地，少部分商業用地，但因為臺灣在使用分區上，實際情況往往是住商混合，且以成大為中心，早已形成一個商圈聚落，周遭的店家，基本上圍繞著學生族群的食衣住行，住戶也多有擔任包租公，提供學生校外住宿的情況。而由於商業的變遷快速，一條路上可能更替多間店家，Google街景的完整紀錄，一定程度上保留了更豐富的資料。

Google 街景資料的可能性

從Google街景資料觀察13年來成大校區內的變化，隨著各種經費的挹注，新增了若干大樓，如生物科技教學大樓、工學院大樓和綠色魔法學校等，空間的變化不僅反映成大學校的發展，也產生了不同世代學生，對求學生活空間場域的記憶落差，目前來說校區的變化不大，但隨著時間的發展，相關資料的保存也尤為重要。

在校區外的變化上，便利商店、星巴克等連鎖店變化不大，似還有增加的趨勢，如育樂街、勝利路口的老邱百貨行，在拆除重建後，現已成為7-11便利商店。大學路的眼鏡店密度很高，現今的肯德基也曾經是一家眼鏡店；而東寧路則是以服飾店最多，靠近東寧路的勝利校區後門是與光復校區門口齊名，許多學生相約出遊的集合地，也因為開路而變得更加方便。

當然，Google街景資料的時間點，從成大八十跨入九十，雖全面但並非是年年更新的完整資料，但從不連續年度的多年資料，也可看出若干的景物變化，呈現學校及其周遭動態發展的過程，使得我們對於這些過往的景色，不再只是若干片段的影像或是口述回憶，更可以透過Google街景系統，觀看水平方向360度及垂直方向180度的街道全景，且針對重要的景物，尚可以點進圖標，觀看用戶的評論與拍攝的照片，使得我們對成大在每個時段下的發展，有更深入的認識，相信隨著學校的發展，在往後的九十到一百，甚至一百年後，其重要性將會愈來愈重要。



見證政策轉變的

國立成功大學校本部校區變遷

論文發表人：慈濟醫院／蕭宇泰線上發表

資料整理與撰文：成大財經所／李皓雯

校地為毗鄰街區但被道路分隔者並不在少數，惟校地分隔數目如此之多、分割如此方正，成大可說是全臺唯一，值得深入研討。除了成功、勝利、光復之外的校區，究竟是各自在何時正式納入校地的，在不同史料中會見到不同的說法，而較晚命名的成杏、敬業、自強、東寧等校區則往往未被認真探究。講者試著爬梳成大校本部的流變，並探究校區逐步擴張與臺灣的工業、軍事及教育政策更迭之關聯性，同時試著討論校區的增加如何影響校園中核心建築物的重新分布。

講者有寫一篇文章來研究成大校區腹地因為政策變革的演變史。這篇文章在資料檢索上面存在一些研究限制，首先就是講者決定要投稿的時候，在臺南的時間所剩不多，所以一些需要在上班日才能去現場取得的資料，例如成大總務處土地契約的資料，或者是臺南地政局的紙本地籍資料，這些資料，這些部分在這篇文章是有所缺漏的。接下來是難以檢索的部分，成大校本部得以擴張基本上是靠周邊的居民遷走，但遷移的相關史料在國防部國軍史料以及兩蔣日記裡面應該是可以看到，但是這些資料基本上是不公開。最後是相關史料目前無法取得，例如4條通過校區的計畫道路，也就是大學、勝利、小東、長榮，他們的確切開通年份以及開通前後對成大的校園到底造成什麼樣的影響的相關資訊。另外就是臺南市陸委會第55到57次的會議紀錄。這一段期間會議記錄記載著力行、成杏、敬業、自強這4個校區從住宅區變更為文大用地的詳細過程，但是都發局的網站並沒有這段期間的會議記錄。接下來，來看一下校地地點取得過程中值得提出來討論的部分：

成功校區可以討論的是，1946年接收時，校地面積到底為何。目前有兩個版本，一個是1946年的總務類校地擴充計畫說明書裡面寫的是18.6751公頃，第二個版本是成大博物館的成大校園環境變遷歷程寫的是18.03176公頃，這個數字是跟現行完全一致。也可以看到王石安校長從1946年接收以後，就積極找各單位來請求撥用校地，包括找了後司令部遺產管理所，獲得合夥請假均同意，不過後來被孫立人將軍直接佔用。1949年王石安校長繼續請省政府主席來撥用相關的土地，校史記載陳主席是有批准建運動場及建築系館。但是最後為什麼沒有蓋成，在校史裡面完全沒有後續的記載，不過同時間要求省府撥款來徵收的部分是有成功，就是現在的勝利校區。這邊有一個值得討論的點，就是東寧宿舍區到底是何時納入成大校地呢？校史的正式說法是說1946年為教職員宿舍及東寧路宿舍，其他有許多文章也都是持這個說法。不過工學院是在特刊裡面寫道1950年成大增購了十七甲地，基本上勝利校區、勝利宿舍區及東寧宿舍區這3塊地加起來才約十七甲的範圍，所以這一個內容是比較支持1950年才購入的說法。另外在美哉勝利這一本書裡面也是寫說東寧校區是在1950年取得，作為宿舍區使用。哪一種說法比較值得採信呢？我認為可以從中研院的臺灣歷史地圖來看一下大概的範圍。可以看到現在的勝利路以東勝利校區的部分，以及東寧校區東寧宿舍區的部分都是算在後甲範圍。上述可知，序廳使用房屋為教職員宿舍及東寧路宿舍後面這一句話其實是有問題的，但可能是要再進一步挖掘第一手資料，才能確定到底東寧路宿舍區最早是在哪一年納入成大校地。

接下來看勝利校區跟東寧校區取得的過程。一開始的勝利校區與勝利宿舍區外觀與現在的勝利校區有所不同，另外東寧校區外觀也與現在不同。當時長榮路南段還沒有開闢，所以大學路的22巷的宿舍群其實跟東寧校區一起購入的，勝利校區購入的相關資訊與詳細情形在美哉勝利這本書寫得非常的清楚。值得注意的是1958年到1960年間省府有同意有一塊L型未登入國有地撥給成大作為學生宿舍用。這塊L型低窪國有地獲省府同意之後相關的公文送到行政院院長備查。

有關光復校區的建築及歷史，相關專書及專文都寫得非常詳細，不過從戰後到成大接手為止的歷史資料則相當匱乏。講者在查閱省政府及總統府資料庫以後發現，在1965年拍板遷移第八軍軍營，讓出土地給成大的正式時任總統蔣介石，在他定案那一年的3月有訪問第八軍軍營及後來變成建國校區的砲兵學校。然而由於第一手資料的不足，無法確認蔣介石在做此決策的原因背景，以及做決策的確切時間。另外此處有一小勘誤，蔣介石在1965年3月26日視察的行程，當天他視察了第八軍軍部，就是現在的光復校區，同時也視察了砲兵學校，就是現在的成杏校區。由於缺乏相關資料佐證，我們無法確定他是在視察前、視察中，還是視察後決定要把軍部移走的。1965年11月省政府的會議紀錄中有提到，國防部確定將第八軍搬移至旗山。

建國校區也就是後來的成杏校區。1945年美軍繪製的臺灣地圖中可以看到成杏校區部分是有一些類似日軍的建築。取得年份也有所出入，官網是寫1971年，南方歲時記則是寫1977年。會有這個差別應該

是1971年是政府核準的年份，1977年則是實際付清款項取得土地的年份。再來看到敬業和南自強。敬業校區的取得也有類似問題。有一說是1982年協商定案，另外是說1983年行政院核準定案，也有一個說法是1984年才付清款項購得。更複雜的是其中一塊是直接由陸軍青山總機營地賣給成大。然而另一塊是賣給省政府，原本作為國宅用地，後來才賣給成大的，所以兩者的時間不可能完全相同。1983年臺南市都委會通過了土地分區變更計畫，將現在的力行校區、成杏校區、敬業校區、自強校區從原本的住宅區劃為文大使用。當時的臺南市長是成大校友蘇南成，他在這個案子上出了不少力。然而如果不是營區移出市區已經成為趨勢，即使市長再有力可能也沒辦法。再來討論力行校區東半部，此處又分為臺南監理站與臺汽公司臺南保養廠兩塊，取得的時間也是眾說紛紜，有1983、1985、1987、1988共4種說法。接下來是北自強校區。北自強校區也有1990跟1991取得兩個說法。更特別的是校史官網中，一個網頁裡面就有兩種說法。最後是力行校區西半部。早在1979年就傳出陸軍804醫院要遷往北部，西力行校區就是原陸軍804醫院，取得的時間有各種說法，包括1998、1999、2000、2002等說法。講完上述例子，可以一起思考看看，到底哪個年份正式列入校史才妥當呢？是協商定案給成大當校區的年份、行政院核定的年份、開始付採購款的年份、還是把請購的錢完全付清的年份？有一些校區是還沒有撥用之前就給成大使用，那這個年份可以算嗎？還是要開始撥用的年份或是完整撥用完畢的年

份，或是在臺南市地政局產權變更的年份呢？另外，東寧校區東寧宿社區到目前為止校史官網完全沒有記錄到底它實際購入併入成大校區的時間為何。最後來探討成大校地擴張與政策轉變之間的關係。最早設校在日軍二聯隊的營區旁邊可能就不是一個巧合，而是有服務國防的性質。戰後，學校曾幾度有望取得北邊東邊的營區土地，但因為時代紛擾，史權不統一而一一落空。1965年蔣介石拍板將第八軍遷往郊區，或許是全臺灣營區郊區化的一個濫觴。1969年起的陸軍嘉禾案使得預八師砲訓中心都跟其他單位合併而遷移，因此可以空出空間讓成大使用。1980年代的國防自主與航太科技發展使得校方有名義可以取得自強校區，另外搭配臺南市長之校友的助攻，將周遭的土地劃為大學用地。

接著來看一下行政中心。行政中心最早是在理化實驗室，1934年以後搬進博物館。取得光復校區以後，1969年行政中心搬到大成館，因為大成館年久失修，1976年行政中心搬到現在的數學系館。1991年行政中心搬遷到雲平大樓至今，可以發現行政中心一直在成功和光復校區轉換，而且都是在東西軸線上平移。

圖書館最早也是在理化實驗室，不過在1931年就已經遷入圖書課，也就是現在的舊化學系館。1959年配合搬遷到舊總圖，也就是現在的未來館2001年搬遷至新的總圖書館至今，圖書館不同於行政中心在東西軸線上面移動，它是在校區的南北軸線上移動。

「故鄉、異鄉、歸鄉」 成大醫學院創院院長認同之旅 的心理傳記探查

論文發表人：成大國際傷口修復與再生中心\李貽峻

壹、前言¹

黃崑巖教授（1933-2012）係成功大學醫學院——戰後第一所創設於綜合大學中的現代醫學院——的肇建者，黃崑巖教授在壯年時代（49-66歲）所擔負的這件任務，開創了一所強調人文精神底蘊的醫學院，也在當時日本及台大之醫學傳統仍環伺的臺灣醫界，提出了嶄新的醫學教育理念。當年促成成大醫學中心成立的因素眾多，而黃崑巖教授的人格特質與深層的心理脈絡，對成大醫學中心創立與發展過程所提供的動能，則是一個沒有被探究過的議題。本文以黃崑巖教授為傳主，採用心理傳記學取徑，從成人自我認同的角度再現與詮釋與其外在成就的關聯，並呼應其「成為良醫之前，先作成功的人」的關懷。而敘事詮釋主要聚焦於其1963年赴美留學至1999年自成大退休之間，在大量的文字影音及訪談資料中，選取了他在時間軸中的空間移動，作為反映其形塑心理認同場域，以「故鄉」、「異鄉」、「歸鄉」的轉換，交疊出一個立體的內心世界。

¹ 本文摘錄改寫自研討會發表，受限篇幅故刪減大量史料之引用。



貳、心理傳記取徑

心理傳記學旨在探索每個人是如何獨特的，或說人是如何逐漸變成與任何參照群體都不相同的獨特份子。心理傳記學家認為研究人類的獨特性極有價值，因為獨特性看似常態分布中的例外偏誤，卻只有這樣才能進入更深層次來理解個體，而不至於被群體性的概念抹殺了瞭解個體的可能。這樣的研究取徑仰賴高度的解釋能力，而解釋強調也要與所有得到的證據相一致，推理也要合乎邏輯與人們的常識性知識。

本文以人生週期之後半生作為傳記焦點，由作者協同兩位諮商心理師及一位社工師，共同蒐集整理黃崑巖教授的生命事件，閱讀其出版的15本書籍（包含其自傳與成大醫學中心回憶錄）、1982-2004年間超過4000封公私書函、109部演講錄影或與其相關的訪談紀實影片，並與同代的人進行交談，藉以審視他極富創造性的工作。透過觀察他的主觀知覺、發覺與研究問題意識的呼應、探究其生命中的重複模式與具有內在張力的片段，然後產生對於其獨特生命史的解釋力。

參、「鄉」的立體三部曲

一、故鄉，在何方？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一日，黃崑巖生於臺灣新竹。臺灣是他理所當然的故鄉，但十二年的日文教育，令他一生都覺得自己中國文字的基礎並不紮實，日文是他直到晚年的家庭母語、童年回憶中的身分認同。戰後其國族認同自己是中國人，但國民政府後社會令人失望不安，時局紛擾，若要是能安身立命、找到存在的價值的事情，就是有優秀傑出的表現了，而競爭及追求卓越的信念，從就讀日本公學校起，就早早內化到年幼的心靈。這幼年所相信的信念、做出決定、及選擇的方向，成為一生努力實現的動力，如阿德勒理論所言，而這獨特的實現過程形成他一生獨特的「生活風格」。

形成黃崑巖生命中故鄉認同與一生生活風格的，是

中臺日之間的生活經驗與張力，一九六三年，已接受了十八年中國式教育的黃崑巖赴美留學，復於十九年後的一九八二年，又返回了故鄉建設成大醫學中心，但這個故鄉依舊是個「張力場」，只是如今的張力，從中日轉換為臺美。「一九八二年決定從美國回臺灣時，我擔心的事不少，其中一項，就是怕回來沒幾年，我的英文會逐漸退步。多年來在臺灣每遇想不起一個英文字，恐懼感就湧上心頭，似乎擔心的事已經成真了……」²「擔心英文退步」是一個令人訝異有趣又饒富深意的擔憂，這意味前半輩子在美國的努力與生存的成果受到損耗，因語言退步而流失掉在美國所內化的優勢文化，是令人擔心的。被臺灣的語言同化，正遠離了他所努力建立的成功認同。

二、異鄉，不在遠方！

他生長於二戰前後期、資源並不充足的臺灣，到美國後學習、生活、工作，接受美國文化的養成與洗鍊，歷經許多嘗試與經驗，美國是他找到自我認同的地方，也真正回應與實踐了他想作一個老師的渴望。在美國他經歷了自我潛能的發揮，至終養成自我認同，並也使他孕育出將富含人文氣息的醫學教育的理念。這些都不是故鄉臺灣在二戰前的日本殖民政權，與戰後接收臺灣的國民政府的社會環境，所能給予的養份。

十二年後（1994），黃崑巖表示自己與夫人對臺灣的社會越來越幻滅，且覺得自己像是異類：「正直和誠實地工作，在臺灣是非常孤單的。我相信我有很多創造力，但過去幾年中，我覺得我的功能走到了一個死胡同。這種感覺很恐怖，而正是這種感覺讓我十幾年前離開喬大來到這裡。此刻我需要找到一個緊急出口。」³那時的黃崑巖剛剛在成大的校長遴選中落敗，他自省此刻的心境彷彿與十二年前從異鄉美國回到故鄉臺灣時所帶的心情一樣，身在故鄉，卻依舊是個異鄉人。與其說他不接納自己的故鄉，毋寧說是反映了他內心對於「故鄉」與「異鄉」，有了更多層次的不同體會。

三、歸鄉，竟是異想

黃崑巖在1982年返國，肩負新臺幣七十億肇建成大醫學院責任的受邀歸鄉之路，對四十九歲正值壯年的黃崑巖是充滿誘惑與多年抱負得嘗的壯遊。然而，初期的黑名單問題，與後來一直困擾他的美國國籍，不斷衝撞著這位理想主義者對於故鄉的想像。事實上從黃崑巖的書籍或言論中，看見地理上的故鄉一直沒有成為他心裡的故鄉，當他帶著美式作風、富涵西方教養的理念、及對美感的堅持落腳臺南，並顯現在各個建設及管理的細節時，或許他也正一步步如人飲水地見識到了歸鄉的意義。

他曾親赴美國歐洲日本參訪著名大學醫學院，觀摩建築設計；到德國挑選磁磚，慎重其事的要求磁磚的品質；教室的對齊線、樓梯等高、柏油路的路緣石的整齊，設置如同美國軍醫大學的升旗台，以及規劃成杏聽、設置藝術品等，是臺灣當時水準所不及卻是他的基本的標準。「做事追求完美，是我的嗜好。……堅持完美只是良心的表現。」⁴

完美主義的他，自我要求嚴謹，承受的壓力及挫折感自然不少。在臺灣也經歷了很多難以認同的事情；日常生活裡臺灣的環境還有許多不及格、不夠修養的人事物，與美國的價值差距甚遠。1982.09.21踏上東渡歸鄉的征途，廿七年後的2009.11.17他再次西返歸鄉。2012.02.20辭世前，終究何處是他想望魂歸之原鄉？⁵

肆、生命旅者的風景

黃崑巖在他名符其實的故鄉裡，醞釀著唯有向異鄉前進，才有可能實踐內心深處的召喚。但他並不曉得自己所前去的異鄉，後來竟成了故鄉。更在他意料之外的，是1982年受邀貢獻鄉梓的衣錦還鄉，卻是人生中第二次踏上異鄉：在故鄉中成為了異鄉人。

若以「鄉」來作為生命認同的隱喻，那麼在「故鄉、異鄉、歸鄉」的視角下，其受邀返臺主持成醫，非僅是線性時間軸之下不同的地理位置，更是在其心理

位置上的交疊及衝突。黃教授在其名言” become a man”（成為一個人）的追尋中，展現了生動與複雜的心理脈絡，使成大醫學院的設立，不只是高等教育中的行政作為，更與肇建執事者之生命形成了有機且互為主體的關係，是一條踏上認同整合與平衡之路。

本文尚無暇處理黃崑巖明顯的理想主義、完美主義、利他主義、……等等重要的人格表徵，亦沒有探究其在身體極速惡化的最後二、三年間，他究竟如何看待自己。但黃崑巖在過世前五年所出版的回憶錄中，最後曾以「人一生的光應該像哪一群人照射才最有意義呢？」⁶的自問，在試圖統合自己人生的得失，並且似乎不喻自明地，滿意著自己成（為）了人，也成（全）了人。⁷

四十年後，人們仍在成醫，也在學習成人。

2 黃崑巖，《我不一樣的人生：黃崑巖自傳》，頁62。

3 1994.05.26 黃崑巖寫信給一位來成大實習的美國年輕醫師 Joan LaRovere。

4 黃崑巖，《黃崑巖回憶錄：成大醫學中心創建始末》，頁89。

5 本研究未深入觸及1999-2009年間黃崑巖在臺灣的工作，因此無法直接推論其2009年因病返美，必然是一種心理意義上的歸鄉，故本段落暫以問號懸置。事實上，據其女兒描述黃崑巖返美是非常難捨的決定，啟程前一天還在已經因搬家打包而清空的淡水自宅，一一致電給他的故舊友人與同事。Susie Huang，〈Our dad, Kun-Yen Huang〉，李經維編，《黃崑巖教授追思紀念文集》（臺南，成功大學醫學院，2012）

6 黃崑巖，《黃崑巖回憶錄：成大醫學中心創建始末》，頁250。

7 2012.03.29在黃崑巖院長追思會中，賴其萬教授提到在黃崑巖生命的最後幾天，黃師母在電話中說：「他使我有了一個多采多姿的美好人生。」賴教授亦感言：「黃教授，您可知道，您燦爛的一生點亮了多少人的生命，多少人因為認識了你，而有了不一樣的人生！」賴其萬，〈遠瞻近窺黃教授〉，李經維編，《黃崑巖教授追思紀念文集》（臺南，成功大學醫學院，2012）。

物中的校史密碼

論文發表人：成大歷史系 廖伯豪



以成大博物館藏物理系 與成大電機系傳世 電力教學文物研究為例

前言

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成大」)以培育理工專業人才起家，前身為臺灣總督府臺南高等工業學校(以下簡稱「臺南高工」)，歷經了省立臺南高級工業學校(以下簡稱「省立高工」)、臺灣省立工學院等(以下簡稱「工學院」)時期，深藏於各系所內的早期教學儀器設備因隨著科學技術與知識的快速演進而面臨時代汰換，致使古老的教學儀器及其背後的科學知識也因世代潮流的斷層而逐漸被後人淡忘，成為少數資深校友的情感記憶。

成功大學博物館(以下簡稱「成博」)於106-107年針對校內系所進行初次文物普查，¹透過成大電機系與物理系傳世臺南高工時期至美援時期的教學儀器文物的整理，並藉由口述訪談、財產帳冊等資料，得以釐清校內文物各時期財產號的變遷過程，除了提供未來鑑識校內文物年代判定基準外，更能透過教學儀器的轉移、購入廠牌的紀錄中，反映日治至戰後初期臺灣科學教育與工業技術之鉅變，見證成大因應面對不同時代潮流變遷下的教學傳承。

關鍵詞：

臺南高等工業學校、臺灣省立工學院、美援、發電機

壹、成大博物館暨電機系史館藏教學儀器特點

綜觀成博館藏物理系與電機系史館藏教學文物種類，包含大型機械、基本器材、測量儀表、教學模型、實驗設備、實驗耗材、繪圖文具、校史文獻等項，種類繁多。產地包含日本、美國、德國等地，亦有國產儀器者。依照本校發展之歷程，其年代橫跨自日治時期臺南高等工業學校(1931-1945年)，依序經歷臺灣省立工學院(1946-1956)、省立成功大學時期(1956-1971)、國立成功大學時期(1971-迄今)。其中，省立工學院至省立成功大學時期(1953年-1962年)間曾歷經美援(U.S. Aid)政策，以下針對其原屬脈絡各別分述：

一、成大博物館藏物理系教學儀器文物

成博典藏教學儀器文物原屬本校物理系之教學儀器，回溯成大物理系之始源，其前身係位於臺灣總督府臺南高等工業學校之理化學實驗室【圖1】，尚未有獨立科系，該空間主要作為教授學生第一學年基礎物理學及基礎化學學實驗課程。戰後省立工學院時期改為文理學院共同科教室，提供普通物理及實驗課程教學之用。至民國42年(1953)美援正式開始，民國45年(1956)物理系正式創系，適逢臺灣省立工學院改制為省立成功大學時期。美國普渡大學顧問團的物理教育顧問雷輔立教授，將新進儀器及

使用方法，以英語對助教進教育訓練，再透過助教國語協助教導學生。至民國70年(1981年)增設博士班，同年教育部推行「基礎科學改進計畫」，美援時期文物至此均已淘汰。物理系之教學儀器原置於舊系館之普通物理學實驗室，後於2009年移撥至成博典藏，依其功能主要為教學模型、基本器材、測量儀表、度量設備、電源設備、實驗室設備、實驗樣本、工具書等。

二、成大電機系史館藏教學儀器文物

成大電機工程學系前身係為臺灣總督府臺南高等工業學校電氣工學科【圖2】，為日本南進政策時，提供臺灣島內、滿州及日本內地公民營機構之專業人

1 作者現為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研究助理。

2 本文為筆者執行成功大學博物館辦理「106-107年國立成功大學博物館暨電機工程學系典藏教學儀器類文物普查建檔及調查研究計畫」之調研成果，感謝計畫主持人前館長陳政宏教授與館內同仁鼎力協助，同時感謝物理系吳清水教授、電機系退休教授孫育義先生、電機系校友吳榮明先生在調查過程中接受訪談，並提供物理學及電力學的技術專業諮詢，特此致謝。



圖1 | 總督府臺南高等工業學校理化學實驗室平面圖(1931-1945年)。引自國立成功大學，《南方歲時記：成大八十年編年記事圖錄》(臺南：成大校史編纂小組，2011)，頁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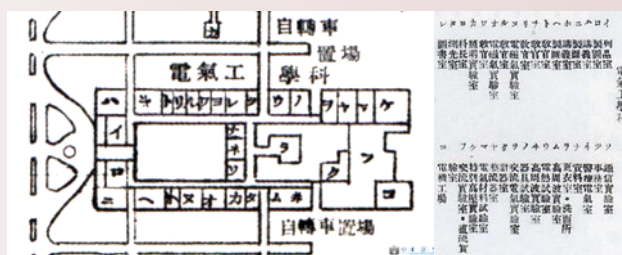


圖2 | 總督府臺南高等工業學校電氣工學科館配置平面圖(1931-1945年)。引自國立成功大學，《南方歲時記：成大八十年編年記事圖錄》，頁27。

才，跨及電氣、通信、機電、礦業等產業需求，³後於昭和18年(1943年)分設成電力工學部及通信工學部。戰後改制為電機工程系，初期延續日治時期的教學內容及空間設備，所用參考書皆於日治時期留下來的。直至1953年美援時期陸續引入西方最新的高科技知識及英文原版書籍，並添加新實驗儀器與設備。電子 circuit(電晶體)發展逐漸取代真空管技術，電子計算機與通訊科技，電腦、積體電路與電子微波成為研究顯學。⁴爾後電機系於1997年搬遷至自強校區新系館，2007年成立系史館，原舊系館現為資訊系館。電機系典藏教學設備儀器依其功能大型及中型機械、基本器材、測量儀表、實驗室設備、文具類、教學模型等教學器具。此外，另收藏日治時期電氣工學科畢業論文一批。

貳、物之有理—從兩系典藏發電機所共構電力科技發展史

透過成博典藏物理系及電機系藏教學儀器的形制脈絡及功能，恰好串聯起19世紀至近代的電力科技發

展歷程。所見成博館藏原物理系〈渦電流發生器〉【圖3】，該儀器係1831年法拉第(Michael Faraday，1791-1867)所發明【圖4】，並從中發現「電磁感應定律」，當磁鐵固定時，使導線線圈快速通過磁鐵，即能產生電流，反之亦然，故又稱「法拉第圓盤」(Faraday's disc)，為世界上第一部發電機鼻祖。然而其產生出的電流相當微弱，爾後的發電機以此原理為基礎，將原先的馬蹄形用久磁鐵結構改變成能產生巨大磁場的電磁鐵，用多股導線繞制的線圈結構代替銅圓盤，大幅增加電流的輸出功率，提升發電機的實用性。相同案例亦見於東京國立科學博物館亦館藏同款同廠牌之發電機模型【圖5】，生產年份約1920年，⁵可作為其參考年代。

若物理系藏渦電流發生器作為電磁發電機的起源，愛迪生發電機則是電力普及化的重要革命，所見電機系藏〈愛迪生-霍普金森式直流發電機〉(以下簡稱「愛迪生發電機」)【圖6】原座落於成功校區舊電機系館直流電實驗室，根據其場軛結構上的「臺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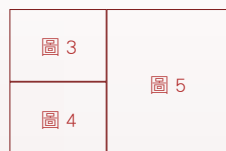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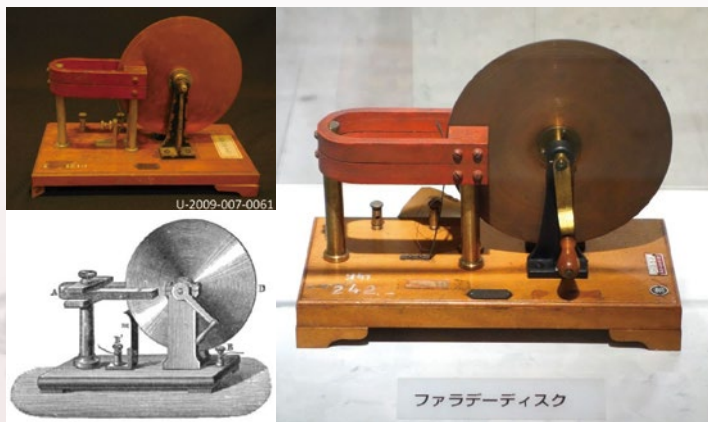


圖 3 | 臺南高工時期，渦電流發生器，日本島津製作所製，臺南：成大博物館，典藏編號：U-2009-007-0061。

圖 4 | 1884 年，法拉第圓盤圖，圖引自 mile Alglave & J. Boulard (1884), fig124。

圖 5 | 1920 年，法拉第圓盤，日本島津製作所製，東京：國立科學博物館藏。

3 迄今成大電機系藏臺南高工時期1935-1943電氣工學科學生分發殖民地及日本內地之機關之實習報告，詳見陳政宏、廖伯豪，《106-107年國立成功大學博物館暨電機工程學系典藏教學儀器類文物普查建檔及調查研究結案報告(正文)》(臺南：國立成功大學博物館，2018)，頁111-112。

4 國立成功大學電機工程學系，《國立成功大學電機系史》(臺南：國立成功大學電機工程學系，2004年)，頁137。

5 參考「東京國立科學博物館」網頁：http://db.kahaku.go.jp/webmuseum/collect/large_image.do?data_id=3301642&...。(點閱日期2017年9月19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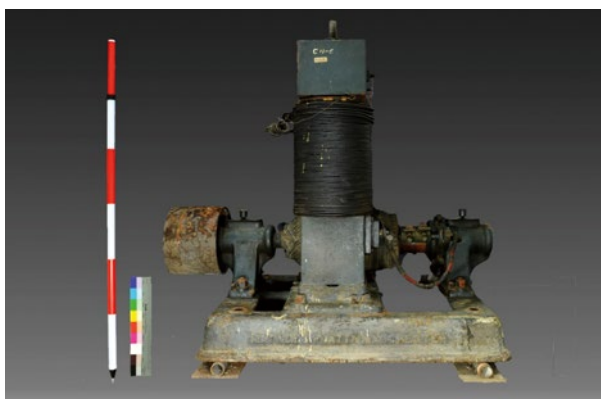


圖 6 | 高工時期，愛迪生 - 霍普金森式直流發電機，成大電機系藏，筆者拍攝。

電力株式會社寄贈」銘板推測，應是昭和8年(1933)臺灣電力株式會社社長松木幹一郎蒞臨臺南高等工業學校時贈予電氣工學科(電機系前身)。⁶其歷經總督府臺南高等工業學校、臺灣省立工學院、臺灣省立成功大學等階段，後於1997年自強校區電機系新系館落成後，轉移至新系館B2地下庫房內，儲放至今。⁷

該部發電機係源於美國愛迪生於1879年的專利，又稱愛迪生發電機(Edison Dynamo)，為美國首次架設區域民生用電(電燈)電網之電源機種，該機械係透過鍋爐燃煤使蒸氣機運作，藉由蒸汽機以皮帶傳動發電機產生電力，係由熱能轉換成動能進而產生電能的科學原理。

愛迪生發電機的問世，造就十九世紀末東亞地區的電氣能源革命及民生電燈的普及。⁸如1878年3月25日日本的工部大學校(即今東京大學工學部)點亮日本第一盞電弧燈，該日亦成為日本電氣紀念日的由來。⁹至1887年日本第一家電力公司「東京電燈會社(Tokyo Electric Lighting)」(今東京電力)開始對大眾送電，¹⁰即採用愛迪生發電機供電予日本郵船會社、東京郵便局等地，並豎立石碑為紀念，足見日本官方對於愛迪生發電機背後所象徵現代化文明賦予重要的意義。

回顧臺灣於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期的電業發展概況，所見光緒12年(1886)劉銘傳擬於基隆至安平架設陸路電報線，其中陸路電報線合同內所開列清單中，電局所需物件中即有「西門機器」¹¹一項，不

排除係指發電機或電報機設備。光緒13年(1887)劉更邀江浙仕紳集資五萬兩裝置小型電機，燃煤發電，凡臺北城內各衙署，機器局及西門新起諸街均有電燈，夜晚點燈時儼如入晝。¹²光緒20年(1894)甲午戰爭後，臺灣被割讓予日本帝國，從1895年日軍參謀本部所刊印的《臺灣誌》中，記載當時日軍進駐臺北城時，所見城內仍持續使用部分燃煤式的直流電氣設備。¹³

是故，電機系藏愛迪生發電機成為象徵民生用電起源的古董機械，由臺灣電力株式會社將發電機贈予本校電氣工學科，便一直作為直流發電原理之教學器械。顯示臺灣電力株式會社對於電氣工學科之重視，並著重電力器械人才的培育，爾後歷屆皆有學生赴各地變電所就業實習，促進臺灣總督府推動臺灣現代工業化的政策。

6 石萬壽，《國立成功大學校史稿-建校六十周年紀念》(臺南：國立成功大學，1991)，頁12。

7 陳政宏、廖伯豪，《106-107年國立成功大學博物館暨電機工程學系典藏教學儀器類文物普查建檔及調查研究結果報告(正文)》，頁69-70。

8 另有朝鮮國透過考察晚清中國及明治時期日本國，認識世界電力的技術及應用，1883年朝鮮李朝高宗派遣使節團赴美國Edison company洽談建造路燈系統事宜，並引進愛迪生發電機直流發電系統，於1887年在景福宮的乾清宮點亮「韓國第一盞電燈」。詳見Moon-Hyon Nam, "Early History of Korean Electric Light and Power Development," IEEE: Newark, NJ, USA, 2007, pp.192-200.

9 引自日本「電氣事業連合會」網頁：<http://www.fepc.or.jp/enterprise/rekishi/meiji/> (點閱日期2017年12月)

10 日本電氣協會、關東電氣協會，〈日本初の配電線による電灯供給-第2電燈局〉，《電氣ゆかりの地を訪ねて vol.6》，2009年，頁1。

11 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沿途電線應需各項清單(附件)〉，《明清臺灣檔案彙編》(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09)，第5輯，94冊，頁205。

12 臺灣電業五十年史編纂委員會，〈臺灣電業五十年史初稿〉，《臺電勵進月刊》，1952年6卷6期，頁63。

13 日本參謀本部編，《臺灣誌》(臺北：成文出版社，1895)，頁51-52。譯文參考自莊永明，《臺北老街》(臺北：時報出版，2012)，頁171。

參、物之有序－兩系儀器財產編碼之時代特徵

成大各系所留下的教學儀器，不僅只是那些提供師生學習並精進專業的好幫手，同時也是學校的資產，因此每一臺儀器上被一再塗改覆寫的財產編碼，皆透露著其被分門別類，世代管理的序列。

一、日治時期(臺南高等工業學校時期，1931-1945)

透過比對兩系的儀器銘板以及「臺灣省立接點委員會卡片」之舊編碼註記【圖7】，可知此一時期編碼常見編碼銘板「高工/BXXX/No.X」，或以書寫方式進行編號，其中書寫編碼所見電氣工學科(電機系)儀器使用紅色顏料，辨識度較高並可與「臺灣省立接點委員會卡片」上編號相對應【圖8】；普通理化學實驗室(物理系)儀器則以白字書寫，容易與工學院後期編碼混淆，除常見B字頭編碼外，另見有C字頭編碼，皆以橫線註銷【圖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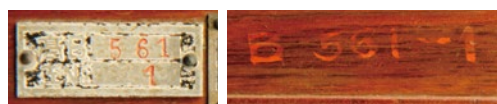


圖 7 | 電機系藏惠斯登電橋上之臺南高工時期銘板及紅字編碼皆為「B561-1」，筆者拍攝。



圖 8 | 電機系藏鎢絲燈泡組，所見臺灣省立工學院接電委員會卡片暨臺南高工紅字編碼皆為「B1363」，筆者拍攝。



圖 9 | 物理系舊藏可變電阻器之臺南高工時期白字編碼「C104-4」之記號，臺南：成大博物館，館藏編號：U-2009-007-0003。

二、戰後工學院前期(1946-1952)

工學院初期編碼皆見於兩系儀器中，參照民國41年《臺灣省立工學院電機系財產保管清冊》，所見其財產編碼格式為「XXX·XXX·X」【圖10】，可作為此款編碼參考下限年代。



圖 10 | 電機系藏惠斯登電橋(普查編號：106-0218)上之「XXX·XXX·X」白字編碼形式可對應1952年前工學院初期財產清冊編碼，財產清冊為電機系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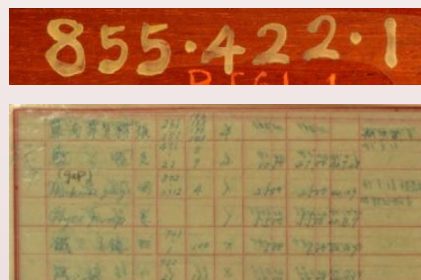




圖 11 | 電機系藏惠斯登電橋 (普查編號：106-0218) 上之白字編碼形式可對應 1953 年後工學院後期至省立成功大學 (進入美援時期) 財產清冊編碼，財產清冊由電機系提供。



圖 12 | 成博館藏物理系〈可變電阻器〉(典藏編號：U-2009-007-0003) 上之白字編碼形式可對應 1953 年後工學院後期至省立成功大學 (進入美援時期) 財產清冊編碼，清冊由成大電機系提供。

三、戰後工學院後期至省立成功大學(1953-1962)

此時為本校進入美援時期的關鍵時刻，大量的儀器透過美元資金進入校園，故校內自日治時期至購買之新式儀器等均全面賦予新式財產編號，所見採用「C.A BXXX-X」或「BXXX-X」，其中電機系偶見有「C.A.EE BXXX-X」之編碼。解構其編碼邏輯，「BXXX-X」意指「儀器字碼-序號」，儀器字碼即代表一種特定儀器，如電橋之字碼為「B251」【圖 11】、電阻器字碼為「B4」【圖 12】，於全校同款儀器進行統一序號編列，故從物理系及電機系藏同類儀器中皆可見相同的儀器字碼。另有部分美援儀器及機械亦貼有美援標誌貼紙【圖 13】，可輔助判定其具體購入時段。



圖 13 | 美援時期儀器中所見美援標誌貼紙及銘板，筆者自攝。

肆、物之有源－兩系教學儀器所見廠牌結構

觀察兩系所典藏之教學儀器之品牌，亦可看到不同時期儀器的廠牌來源，所見日治時期主要引進日本國產儀器，基本電學器材以島津、橫河、柳本為主要供應商【表1】，其中株式會社島津製作所於1932年正式取得臺灣總督府授予計量器販賣許可，並設店於臺北州臺北市本町一丁目四十三番地¹⁴。大型電動機械以日系廠牌為主，另有少數德製(恩斯特 徠茨、Hartmann & Bran)及美製(LEEDS & NORTHRUP)等教學器材【表2】，係透過島津製作所代理或美國廠牌之駐日據點(如L. J. HEALING & CO. LTD)¹⁵引進。

戰後進入美援時期，大量引進CENCO(中央科學公司)、WELCH(威爾奇)等美國著名大廠所生產之教學儀器。其它教學儀器及耗材方面，物理系常見有Fisher Scientific(費雪科學公司)、GE(通用電氣公司)、Weston Electrical Instrument(威斯頓電氣儀表公司)【表3】，電機系則大量使用LEEDS & NORTHRUP之電學儀器儀表【表4】。值得一提的是，透過儀器的編碼序列及舊財產清冊所開列之儀器品項中，可以發現此一時期仍會購買日系儀器，顯示在教學儀器設備的採購上，並非因為戰後的民族情結拒絕購買日貨，應是因應購買成本、品牌儀器質量或教學需求等因素進行考量購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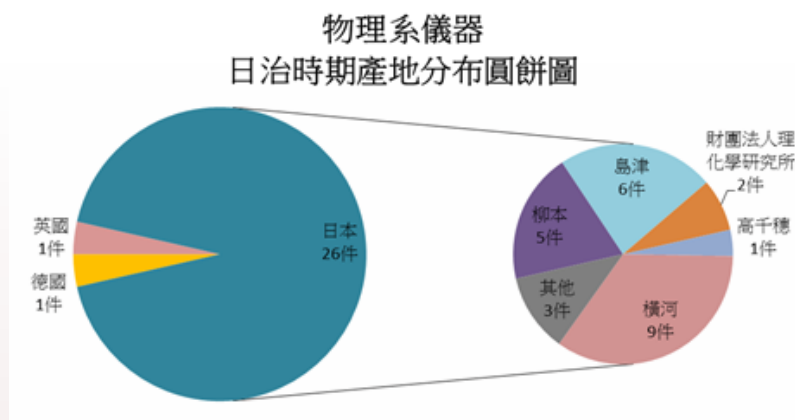


表 1 | 物理系儀器日治時期產地分布圖，筆者製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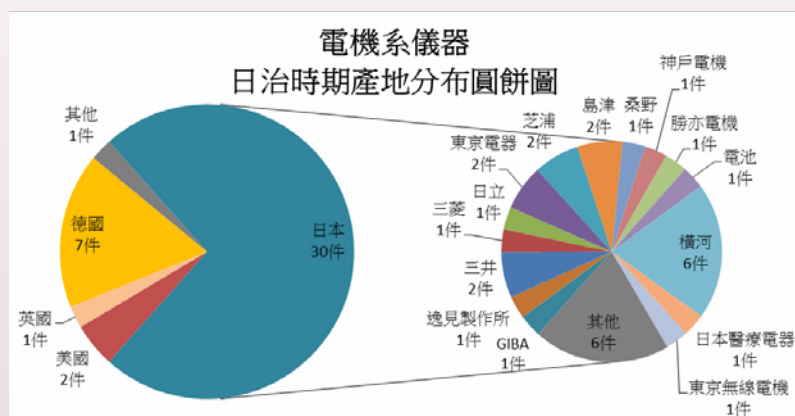


表 2 | 電機系儀器日治時期產地分布圖，筆者製作。

14 詳見「計量器販賣營業特許」(1932-07-15)，〈昭和7年7月臺灣總督府報第1573期〉，《臺灣總督府(官)報》，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71031573a007。

15 參考電機系藏帶有臺南高工編號「B561-1」之美國LEEDS & NORTHRUP CO.製〈惠絲登電橋〉(普查編號：106-0218)見有「L. J. HEALING & CO. LTD./ENGINEERS & CONTRATORS./TOKIO, YOKOHAMA, OSAKA, DAIREN, /LONDON & NEW YORK」銘板，可知該件儀器係由L. J. HEALING & CO. LTD代理，該公司於日本東京、大阪等地皆設有據點，故本儀器是1932年透過該公司間接購買。詳見陳政宏、廖伯豪，《106-107年國立成功大學博物館暨電機工程學系典藏教學儀器類文物普查建檔及調查研究結案報告(下冊)》，頁200-2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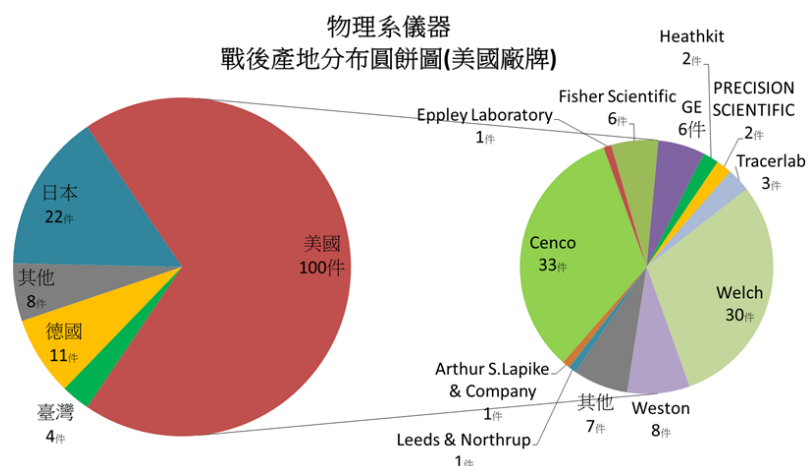


表 3 | 物理系戰後美系儀器廠牌比例圖，筆者製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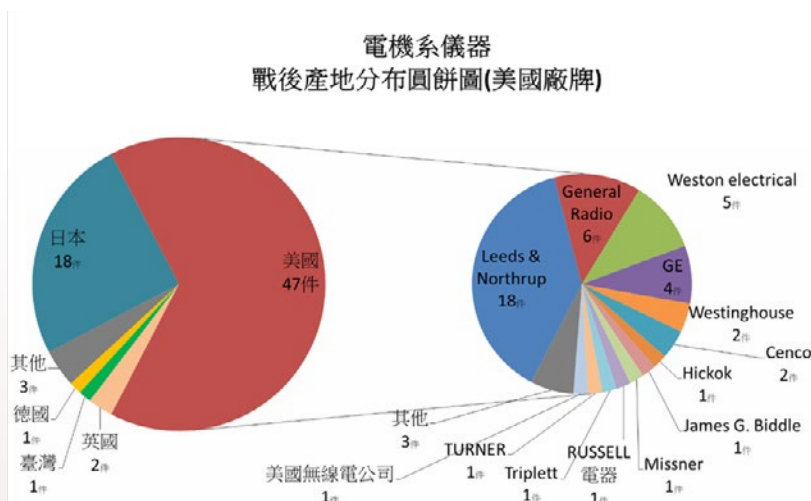


表 4 | 電機系戰後美系儀器廠牌比例圖，筆者製作。

伍、結論

成博典藏物理系及成大電機系史室藏教學儀器文物具體呈現成大自臺南高等工業學校時期以來對人才的培育，即是從學理的養成到實務的訓練，從物理系的法拉第圓盤到電機系的愛迪生發電機，其背後串連起的是電力技術史的發展歷程。儀器上的廠牌內容及編碼序列，亦見證日治時期的教學設備採購的多種途徑。其表面重疊形式各異的財產編號，顯示日治時期的教學儀器歷經新政權的財產接收後仍

持續作為教學使用，而標有美援標誌的新購器材則反映了新科技與新式科學教育的引進。透過歷屆帳冊與學生的實習報告，吾人除了瞭解物件本身因外在環境變遷而不斷轉換的生命史外，更可以從這些歷經科技演進淘汰的儀器中，看到學生從中進行自科學理論的建立、實務經驗的積累乃至科研創新的回饋間的激盪碰撞，充分展現教學、科研用具類文物本身的文化資產價值特性。

把校史裝進地圖

打包帶走

論文發表人：二十而立工作隊\陳浥潔、許哲兢

可不可以單點一份校史？

在二十而立工作隊成立以前，我和許多人一樣，沒有興趣也不打算翻開校史來看看，畢竟成大迎來百年已經可以用倒數的了，歷史越是悠久的學校，校史通常越厚重，自然是令人卻步，無法「熱銷」！這讓我想起一件事。

我經常在一間專賣各式創意套餐的店用餐，套餐好吃，服務也親切。不過，某次瀏覽菜單時，我發現竟然多了「單點區」，而且用粗紅線圍起來看上去多了幾分特別，但細看之後才察覺是店家把每個套餐的主食又設定成可以單點。為何如此？原來是老闆娘一直收到客人的建議，於是打破自己的堅持，開設單點區讓不想要太多飲食負擔的客人多點輕鬆的選擇。如此一來客人上門可以單點主食，也可以選擇來份雙主食。

那麼校史是否也能如此，擺脫「很重」、「很無聊」的刻板印象，成為一種輕鬆的選擇？若翻開八、九十週年的校史套書，可以看到編輯團隊似乎有這樣的企圖，把校史依照不同主題拆成數本，大



家可以先（只）挑選有興趣的主題來看，每本都不厚，確實降低了「閱讀負擔」，也讓我覺得過去那種「不看校史是0，看了就得是1」的厚重感消失了。如果校史套書可以單點成一本書閱讀，能不能單點成一張地圖帶走？

兩年前我與系上同學成立了二十而立工作隊，致力於探索校園中的白色恐怖歷史，而在工作隊轉譯白恐校史的行動中，發現八十週年以前的校史，鮮少提及曾發生在校園內的白色恐怖事件，可能與當時的社會氛圍有關，但這樣的書寫確實忽略了學校也曾經走過一段風雨飄緲、人人自危的靜默年代。直到八十週年校史出版，校內師生涉入國家暴力的經過才真正現身，在九十週年校史亦增加篇幅。然而，隨著政治檔案、口述歷史、研究論文的相繼問世，白恐校史的書寫或許還有一些得以延伸的部分，例如涉案師生在課外的互動關係及彼此間的人際網絡，又或是他們為何被扯進這場白色風暴，被扯進之前與之後發生了什麼事。

消失的助教們

工作隊首先探索的是發生在1950年代工學院（今成功大學）內的「吳聲達案」。二戰後，脫離日本統治後的臺灣迎來新的主人—國民政府，有人滿心期待美好的祖國到來，有人卻還沒從身分轉換的認同當中理出頭緒，但在日後他們都有個共同的經驗，那就是一連串貪汙腐敗、通貨膨脹及各種社會亂象帶來的極度失望與憤怒。儘管如此，人們依舊渴望了解對岸祖國的一切，此時來到臺灣的外省籍教師於是成為新知識的傳遞者，帶來有關祖國的動態，深深吸引著本省的青年，例如工學院內的吳聲達、黃祖權及杜誠這些喜愛話劇的老師，便成為左翼話劇的傳播者，深受學生們的喜愛。

1947年，工學院院長王石安為了校內師資而向浙江大學招聘教師，當時就讀該校物理系的吳聲達便因此來到臺灣擔任共同科物理助教。吳聲達來臺後於1949年2月加入地下組織，負責領導及推動工學院的群眾活動，而愛好唱歌與話劇的他，於是在校內組成歌謠會帶領學生唱歌，後又在話劇研究會中結識擔任指導老師的建築系助教杜誠，兩人結識一段時間而漸漸熟識後，吳聲達便於1949年10月吸收杜誠。杜誠加入組織後負責與校內教授聯絡、增加私人感情，並從中尋找適合加入組織的人，此時杜誠注意到同樣愛好演戲、擔任建築系助教的黃祖權，於是吳聲達要杜誠想辦法接近並與黃祖權談話，以便了解其背景。

1950年4月，黃祖權經吳聲達吸收入黨，成為預備（候補）黨員，同時組織內開始傳出5、6月對岸解放軍會來解放臺灣的消息，為了接應解放，組織底下的成員開始依照上級命令進行相關調查，例如黃祖權就曾去調查學校附近營房的分布情形。此後三位助教經常聚在一起讀書、唱歌，受到許多學生的喜愛，但隨之而來的是情治單位的注意。不久，三位助教第一次被帶至臺南市警察局審訊一天，才被保釋出去，不過事情並未因此結束。1950年7月憲兵便直接進入宿舍先逮捕了吳聲達，再陸續逮捕了黃祖權、杜誠等相關師生，送往嘉義監獄。而後，吳聲達及黃祖權在判決確定後被送至綠島新生訓導處，於1954年因涉入再叛亂案，兩人分別被判死刑及延長感訓；杜誠也因軍人監獄再叛亂案而遭槍決。

上述的介紹乃依著時間脈絡說明，整個案件發生於1950年代的工學院校園內，其實不只吳聲達、黃祖權及杜誠，當年的白色巨輪還捲入了同校的圖書館

館長王幼石、建築系助教劉煜以及機械系學生楊俊隆（可參考九十週年校史—南方歌未央）。過去的時代不容許人們靠近，因此將近五十年的時間這段歷史是由國家「保管」，直到現今的普世價值才使我們有充分理解的可能與正當性，因此校史終於可以光明正大談論白恐。雖然1950年至今已超過七十年，成大流動著的是自由的空氣，但是我們願意再靠近一點，從校園空間的角度切入，便可以發現白恐其實離我們並不遙遠。

地圖作為一種方法（容器）

如果有興趣翻閱八、九十週年校史的人或許有機會接觸到吳聲達等助教們的故事，但有沒有更親切、輕鬆的方式？

在綠島新生訓島處擔任攝影同時也是政治受難者的陳孟和先生曾說：「要重建被抹滅的歷史，要先把空間建置起來。有了空間，故事才能填進去權勢，歷史才能離真相近一點點。」國家人權博物館建置的不義遺址資料庫，清楚地指認出白色恐怖時期用來刑求、監禁、審判、偵訊或槍決埋葬的「不義遺址」，這樣的指認固然有其意義，基礎建構出大眾普遍對於不義遺址在狹義上的認知與想像，卻也容易使得大眾在理解白色恐怖歷史時，輕易地將焦點投射於這些重大意義的地方，對於每個案件的起點與終點也形成越趨一致的理解版本——他們就是在這裡被逮捕、在那裡被槍決。

然而，關於白色恐怖認識，目光不能只停留在這些具有重大意義的地方。事實上，在涉案師生被逮捕前，與他們有更深連結的其實是日常中的校園空間，例如：黃祖權是在學校「操場（今圖書總館）」散步時由吳聲達吸收；由黃祖權指導的話劇《欽差大臣》與《萬世師表》是在「大禮堂（今格

致堂）」排戲與演出；三位助教第一次被情治單位偵訊是先在「校長會議室（今成大博物館內）」才被帶至臺南市警察局；杜誠與黃祖權所調查的旭町營房正位在現在的「光復校區」；還有位於現今工科系館與資訊系館兩館後方之間空地的「建築工程館（已拆除）」則是他們經常出入的系館；以及單身助教們會一起唱歌、聚會、秘密討論的「教職員宿舍（今大新園附近一帶）」，這些空間是當時師生們的日常，至今依舊是我們的日常。那麼，對於這些空間的理解，能否作為過去指認的「不義地點」中進一步延伸和多加著墨的部分。

我們工作隊於是選擇地圖（圖一）作為盛裝這段白恐校史的載體，並且指認與標示出校園中與白恐案件相關的點位，賦予它們在案件中的定位。如此選擇一來是因為地圖的創作空間很大，從版面配置、美術設計再到文字圖片，都可以依照案件性質打造不同的樣貌；二來是希望透過點位與點位的串接，把這段案件中的空間、人物與故事說明白。另外藉由時間軸、人物關係圖、點位故事與人物敘述的交織，呈現出全知又細膩的視角。時間上，大至整個案件的脈絡，小至各個空間與人物之間的關係；空間上，大至俯瞰所有地點的相對位置，小至一個建築空間，皆可呈現於地圖中，讓案件的始末不會淪為兩點一線的想像。正因為地圖具有的視角不僅侷限在大尺度的時間觀，於是可以填補校史中缺漏的細節，並且以更親切的方式貼近大眾。只有當我們看得夠清楚時，才越能看見這段歷史與學校有多麼密不可分的關係。

外帶一份「吳聲達案」

九十週年的成大校史在內容、編排乃至於美學上都有所突破與創新，但校史的價值以及欲傳達的訊息終究需要透過人的閱讀來彰顯與接收，因此，「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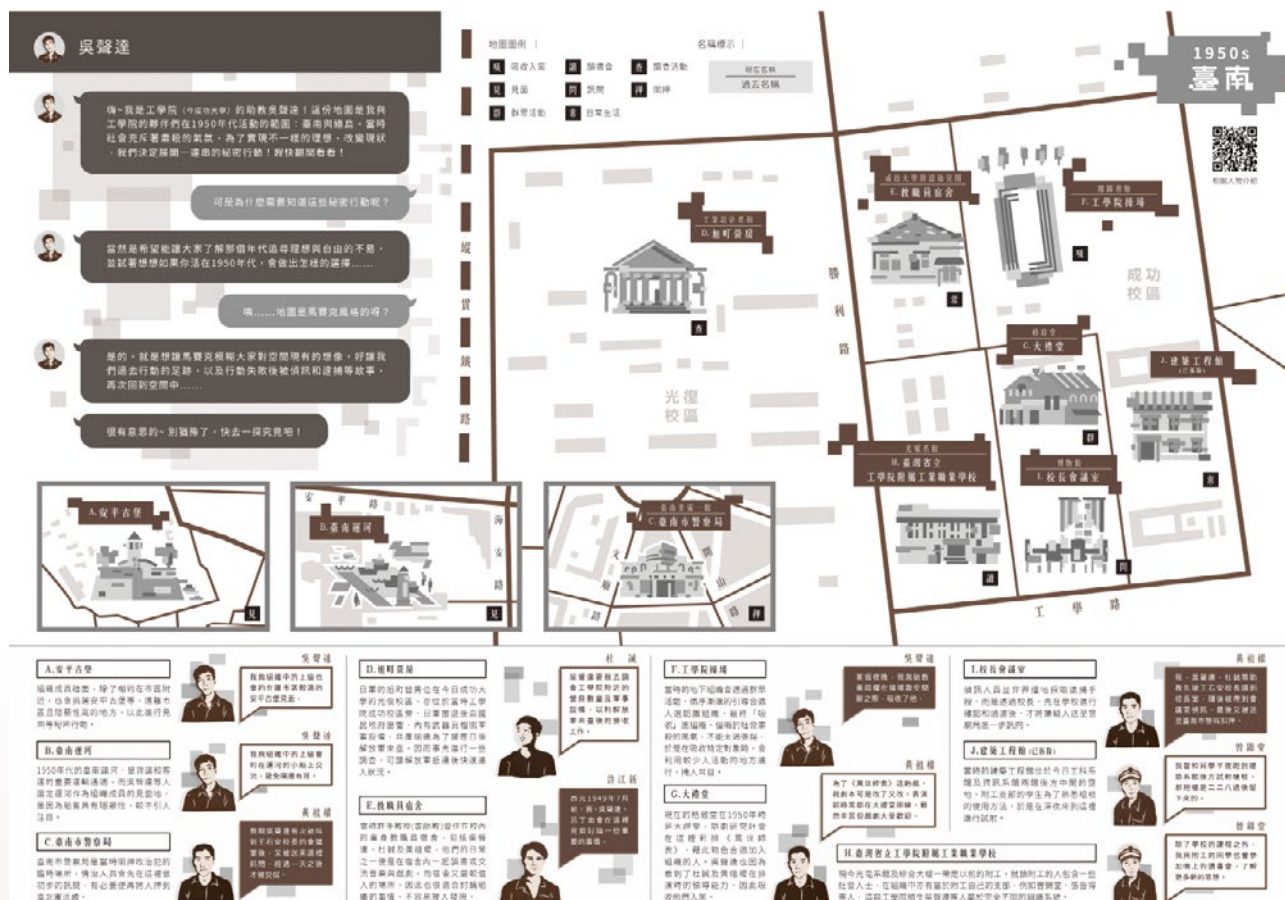


圖1 | 以工學院吳聲達案為主題的〈不懂事的代價—1950年代成大白恐人權地圖〉。

誰看？」、「誰會看？」是很關鍵的問題，因為這牽涉到校史的定位與想像，但這不是三兩下便有答案的。不過，如何在自身因記錄歷史而必然具有的「史書性質」與能吸引讀者閱讀的「趣味性」之間抓到平衡確實是書寫校史的課題。

正如前述所說，校史的厚重感總是令人避之唯恐不及，那一張紙、兩個面的地圖會不會比較吸引人？工作隊開發出吳聲達案的白恐地圖後，曾在校內舉辦一場結合講座的走讀活動（圖二），參與者除校

內學生之外，亦有不少高中老師、校友及校外人士報名參與。每個人外帶一份「吳聲達案」走在成大的校園中、聽著七十年前發生在成大的故事，有了地圖便容易與過去產生連結，大家好奇地拿起地圖與眼前的建物空間比對，進而詢問起學校的過往與變遷。

參與者透過親身走入校園，用理解「一個老師或學生的校園生活」的心態，去看那些被貼上政治犯標籤的師生們，以及投射在空間中的故事，進而了



圖 2 | 校史走讀當天照片。

解他們在獲得政治犯這個身份之前，是一位愛唱歌演戲的老師、是一位充滿活力的學生，是有血有肉的人。他們雖然死於那個年代，但曾經生活在我們現在的校園裡。我想，能先有這樣的認識，才能客觀地理解這段困難的校史，進而產生一些自身的回饋，為這座校園的歷史記憶工程注入多元的想像。

現今的大學被期許甚至是自詡成為重視「自由」、「自主」的機構，一來具有批判的力道，二來有自我反思的能量，能接受社會上難容忍的實驗性行動，能包容主流以外和來自邊緣的聲音，是個複數組成的場域。而校史作為映照大學的鏡子，也應當如實反映和內化這些特質，不應該只是單純帶著懷舊濾鏡、典藏過去，亦須誠實且勇敢地面對學校的「負面遺產」（undesirable heritage）。

外帶校史可以是新的可能

從當代學生的角度出發，校史不只作為過往先人的追憶，也讓學生了解校園各個層面生成的脈絡，以及思考學校未來的走向。為此，如何面向不盡相同的過去而生，是校史書寫者得不斷反覆思考的課題。工作隊去年開發了吳聲達案的白恐地圖；今年製作的地圖則將目光轉移到工學院附工（今成大附工）學生張皆得身上（圖三）。由學生為主體展開的校史轉譯行動是新的嘗試，也希望能提供新的路徑和思維，讓校史能被帶著走、以多樣的形貌親近大眾，又能適當地回應校史書寫基於自身限制或立場無法顧及之處，進而打開公共記憶對話和討論的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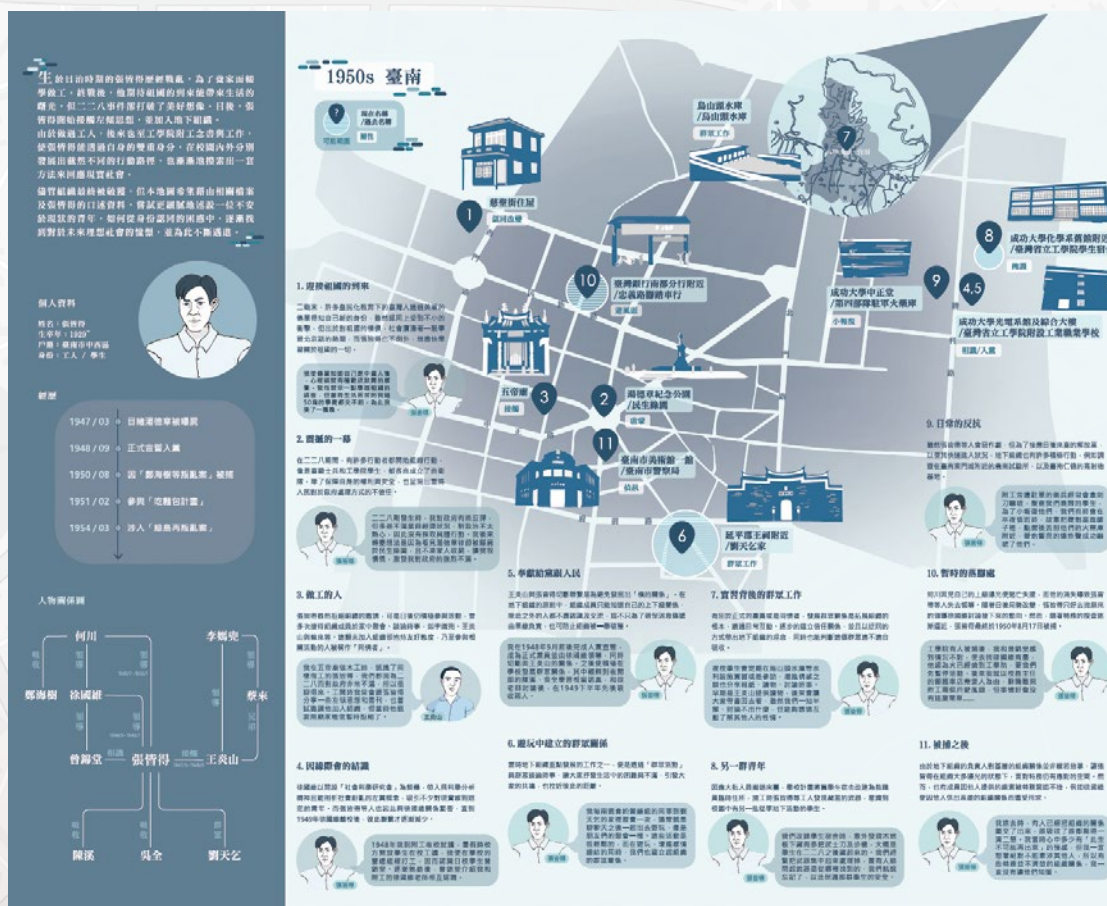


圖3 | 以工學院附學生張哲得為主角的〈一張工人學生的鬥爭：1950年代成大白恐人權地圖〉。

校史主編陳恒安老師曾說，如果大家繼續咒罵校史無聊，它也一定會如大家所意，繼續無聊下去。我相信0到1之間可以有很多可能，從成大與社會共演化的過程，可以切出許多精彩的剖面，延伸成一本書、一張地圖、一部紀錄片，或是任何其他，絕對不無聊。說到這裡，你想好要點什麼了嗎？如果還猶豫不決，不妨聽聽我的推薦，先外帶一張吳聲達案慢慢品嚐。

※本文部分改寫自許哲菡、陳滄潔〈成大校園白恐轉譯行動—以吳聲達案為例〉

道教研究在成大的發軔 學者與歷史

論文發表人：東海大學社會學系劉韋廷

一、故事的開始

大學的主體是老師與學生，一門學科的建立，需要時間積累，在歷史研究領域，宗教史(history of religion)較為冷門，特別在戒嚴時期的臺灣高教，更是鮮少人研究。作為以理工為主的成大，卻是臺灣研究道教史之重鎮，在宗教研究尚未被教育部承認，成大歷史系率先開設宗教史以及田野調查的課程，創辦研究刊物，是臺灣高教史的一大創舉，筆者認為臺灣在解嚴前(1987年)，已有不少專家在宗教學術領域耕耘。歷史學者林富士(1960-2021)整理從1945年到2000年的臺灣道教研究書目，指出《道教學探索》不定期刊出有關國外道教研究者的簡歷、著作目錄、作品簡介，甚至重要論文的翻譯，對於不熟悉歐美及日本學界者頗有參考價值。目前臺灣道教學界形成第一、第二世代交替的學術譜系，乃至第三代的學術生力軍，其成果分散在中文、歷史、宗教等人文領域，近年集中在宗教學門居多，表現世代傳承。2022年，道教學者李豐楙獲選中央研究院院士，回顧道教研究四十年，指出道教史建構是國內外學者共同關注議題，例如教派、組織可作為道教史框架，李豐楙認為《道教學探索》收錄中譯西方道教學論以及，歷史系所碩論語相關習作，是早期道教研究發展的史學路線。但歷史學界投入者不多，道教史框架仍有空缺。本文根據丁煌教授訪談，主編《道教學探索》等主題，回憶開創道教研究艱辛，提攜後進，簡述這段道教研究在成大的故事。



丁煌教授在1970年，接受歷史學家傅樂成（1922-1984）推薦至擔任成大歷史系助教，開始在成大三十多年的研究生涯，歷任講師、副教授、教授。起初在外系教授中國通史（1973-1981），期間1975年以〈唐高祖太宗對符瑞的運用及其對道教的態度〉榮獲國科會獎助，是當時人文領域少數得獎者，1986年開設「道教史」，堪稱臺灣最早道教學術課程；其次在1988年獲得臺南市道教會資助創辦《道教學探索》，發行至1997年，共十期，收錄兩百多篇論文，皆為丁煌精心挑選、仔細審閱之佳作，奠定臺灣道教早期研究基礎。

二、道教研究在府城

丁煌教授是中國文化學院史學系第二屆畢業生，1964年入學，1968年畢業。就學期間深受傅樂成教授、楊家駱教授、黎東方教授等人的治學影響，尤其是傅樂成鼓勵丁煌教授從事道教研究，指導其學士論文，以八仙傳說為主題研究。

有幾位老師對我日後治學有很大的影響，首先是傅樂成老師（1922-1984），他是傅斯年先生（1896-1950）的姪子，也是隋唐史專家。第二位是對史料很精通的楊家駱老師（1912-1991），我修楊老師的目錄學、史學史課程。第三位是黎東方老師（1907-1998），黎老師治學跨越古今中外，外語能力相當好，他可以用英文寫詩，也是法國巴黎大學博士，教育部部聘的第一號教授，黎老師從法國回來之後在清華大學任教，教授證書001號就是他。

我的第一篇論文〈八仙傳說源流考實〉，分析八個不同時代、不同身份的人為什麼湊在一起，怎麼樣慢慢形成的，這就是我學士論文處理的主題，由傅樂成老師指導。傅先生是蠻同意我做這方面的研究，有的老師就不是很喜歡。當時宋史由宋晞先生（1920-2007）教授。上古史的老師在課堂上講每一句話的來源，解釋每句話有不同的說法。上古史的趙鐵寒（1908-1976）老師是師大的老教授。

我在大學時就對道教有興趣，很有意思的是，如果老師很喜歡你，覺得你很不错，絕對不讓你去考研究所，他希望你留下來當助教。或者是哪個學校有前途，他推薦你去那邊當助教，從基層幹起。因為如果沒有接受助教這一階段的訓練，就不會有成長。所以像傅斯年推薦傅樂成老師去當台大歷史助教，或是黃俊傑教授（1975-1980任台大講師）、高明士教授也當過台大助教（1968-1982任台大助教至副教授）。當時我是成大助教，一定要有這樣的經歷才有可能升到教授。所以早先有些門檻是合理的，因為你當助教知道一個大學老師的責任，教學、研究、服務，必須眼睛看著老師們如何處理這些事情。

待丁煌教授大學畢業之後，服完兵役，先到臺北市強恕中學任教，後來受傅樂成的推薦，至成大擔任歷史系助教一職，並且辦理史學講座，包含中央研究院院士錢穆、姚從吾等人來校演講，在當時甚為轟動。他在擔任助教期間不授課。

1970年傅樂成老師要我到成大來。當時成大要設歷史系就找了一些大師來上課，如傅樂成、錢穆、姚從吾（1894-1970，中央研究院院士）等人。我那时候助教不開課，助教負責協助系務，處理系務，系主任不在就代理系主任去開會。在成大，我當助教的時間是三年，不是四年，因為我在中學的那一年也算進去，教書的資歷沒有中斷，1970-73年擔任助教，之後升講師，在外系教八年（1973-1981）的中國通史。我的〈唐高祖太宗對符瑞的運用及其對道教的態度〉榮獲國科會獎助，是第一個人文領域獲得獎助的。在這之前國科會只給理工科、醫科獎助，不給文科，當時我得了這個獎助，成大的同仁很吃驚，終於文科有人獲獎了。

丁煌教授在大學時深受傅樂成啟發，專治隋唐史，發現唐代皇室李家原是信奉佛教，後來轉向崇尚道教，箇中原因值得探討，有其政治因素考量。丁煌教授更進一步指出宗教研究的核心是宗教史，唯有基礎穩固才能向上向下發展，從不同領域研究宗教的諸多面向。丁煌教授舉例國外宗教研究興盛，大學院校將宗教列入必修科目，臺灣只有少數幾間學校有此課程，提供國內高教借鏡。

宗教研究的核心是宗教史，基礎穩固後才能進行上下的發展。歷史又有橫的關係，如宗教地理學、宗教心理學等。如果研究其他的領域，可能在著作的量來講會很多，但是研究道教就比較困難，為什麼？因為你很多東西都要初學，比如說宗教心理學的東西，宗教與醫學的關係，道教裡面不是有很多看到異象的紀錄，到底這個異象是精神作用還是真的有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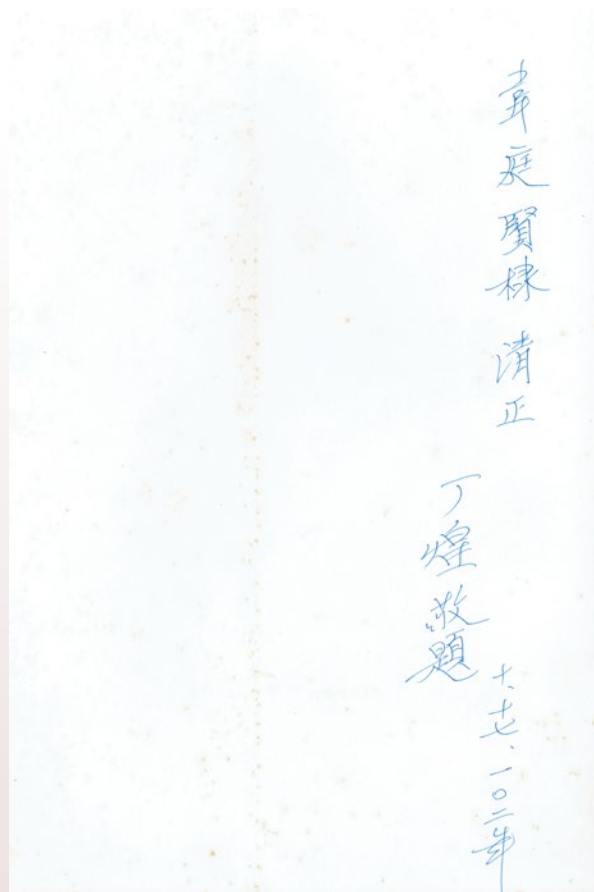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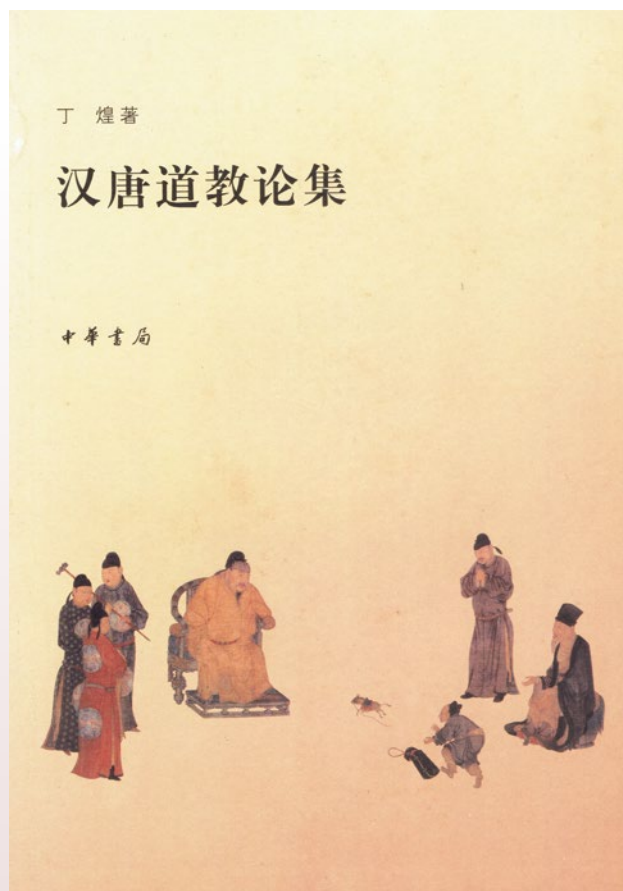
丁煌教授在1975年發表道教論文，尚未開設道教課程。直到升等副教授之後，在1986年開設中國道教史，其後開設華南地區道教提供歷史系學生選修。此時臺灣處於戒嚴，宗教學系尚未成立，在國立大學開設宗教課程屬破天荒的創舉，丁煌教授到日本、韓國進行學術訪問，購置教學、研究所需書籍。爾後，他前往中國大陸訪問，關心宗教學術發展，建立學術友誼，參與《道教手冊》(*Daoism handbook*)對於當代中國道教研究的撰寫。

那時候還沒有開道教課程，自己也不敢開，因為問題太多還沒有處理。後來因為國外的宗教研究比我們早兩百年以上，不得不去接觸他們的文章，歐洲以法國為代表，亞洲則是以日本為代表，後來我就到日本。因為日本學者常到臺灣來做研究，進行田野調查，順便也要拜訪同行。由於我收集很多道教的資料，當時要買一套道藏是多困難的事情，很多大學圖書館都沒有道藏。我咬著牙買一套道藏，讀起來真是傷腦筋，像是天文學、命理學、金屬化學、非金屬化學、煉丹、醫藥等，什麼都有。

大概是當副教授的第二年開道教課程，約1984年（按：應為1986年）。在那之後我除了道教史以外，也開過區域的道教研究，像華南地區道教的發展，開過這個課。還有很全力的在增加自己宗教學的知識，也開過宗教學。我也關心大陸對宗教的研究，大陸那時候比較封閉，後來經過我鼓吹、鼓勵，甚至於親自跑去那邊，就慢慢改進。譬如說川大是個重鎮，四川大學卿希泰（1928-2017），卿所長是蠻好的一個人，但他是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早期信徒。接收川大他是重要的要角之一，因為那時候

研究宗教，大陸都歸在第一所。什麼是第一所呢？指的是哲學，馬克思主義。那時我特別關心對道教研究的幾位，比如說姜生（1964-）、張欽（1966-）、潘顯一（1951-）等人，他們都是我口試的，或者說論文是給我審查的。我去那邊客座兩次，雲南大學也有過兩次客座。當時的學生後來都變成大陸的重要學者，例如中國社科院的姜守誠（1975-），浙大的孔令宏（1969-）。

從丁煌教授在成大歷史研究所的道教發展史課綱，內容分為1）道教的前史；2）東漢的道派及相關經典；3）漢晉政局與道教；4）南北朝的道教發展；5）隨唐五代的道教制度；6）宋元的道派與經典；7）道教與民間宗教的交融與分化；8）明代道教的發展；9）道教近代的演化與衰微。如此通史般的學術課程包含制度史、思想史的專題在其中，旁及政治史與當代文化發展，相當豐富，可惜目前成大已經沒有這方面課程，對於道教文化豐富的府城，期待校方接續前輩成果。



丁煌教授 2019 年於北京中華書局出版《漢唐道教論集》、丁教授親筆簽名。
資料來源：筆者提供

三、產學合作的先驅

丁煌教授在成大任職期間，除了授課，戮力最多即是創辦《道教學探索》，由臺南市道教會募資贊助，後來獲得教育部資助成立道教研究室，是丁煌教授引以為傲的成果，可與台大相媲美，這是成大大在人文方面較早的產學合作。

我記得臺南道教會，以前各縣市都有道教會，臺南道教會是比較古老的。那個郭總幹事，也就是郭瑞雲來看我，希望這個《道教學探索》要努力做下去。我不喜歡跟人家募款，但經費是一個問題。等到後來有一點成果以後，教育部指定了兩個算是國家級的研究室，由教育部資助。一個是在台大的，另外一個就是成大大道教研究室。那時候科技顧問是黃俊傑（1991-1995教育部兼任顧問），黃俊傑大力支持，買影印機，電腦啦，後來我退休都移交給系裡，算系裡面的財產。那時候影印機很貴阿。影印紙好像要買多少就多少。

丁教授訪談提及成大歷史系當年接受教育部補助成立「道教研究室」，堪稱當時國內數一數二的道教學術研究機構，在國立大學單位設立。再加上丁煌教授與臺南市道教會合作，尤其是郭瑞雲總幹事在背後出力甚多。包括向外募集資金鼓勵學子研讀道教文化，撰寫論文，發行學報，可謂一大創舉，是產學合作的絕佳範例。《道教學探索》自1988年12月創刊，在1989年12月、1990年12月、1991年10月、1991年12月、1992年12月、1993年12月、1994年12月、1995年12月、1997年9月出刊，以年刊為主，發行十期，收錄兩百餘篇文章，內容有原創論文、外國譯文、古典譯文以及調查記錄等，不乏歐美、日本等學者論文。主編審閱譯稿修改刊登，引進外國學者觀點，從中獲知海外道教研究。

郭瑞雲回憶1981年拜訪丁煌教授，論及發展道教學術研究，提升道教地位方案。這想法與1977年成立的臺南市道教會亟欲想和國內高等學府合作的目標一致，藉高水準學術研究，誘導國內道教界努力學習道學，提升教內人才素質的培育夢想。郭先生與道教界人士相議，蒙歷屆理事長高度信任，得以順利推動各項措施，為道教研究注入一股新的力量；換言之，《道教學探索》創設的遠程目標是在想建立臺灣成為「道教研究中心」，與國內外道教研究中心交流。郭瑞雲提到丁煌教授研究室，空間雖小，裡面卻典藏許多搜集的道典文獻，丁煌教授將這些原始資料與傳統文獻進行整理、編目考訂、注釋、撰寫提要等工作，指導學生撰寫論文，批改文字，為學刊的出版做準備工作，幾無片刻休息。

《道教學探索》在宗教類刊物的特殊地位，關鍵在「開創性」，透過配合學院專業課程，鼓勵學生投稿，學刊作者群以學生為大宗，少數學者次之。其次，丁煌教授與負責資金募集的郭總幹事兩人對臺灣道教研究有深切期許與注重研究人才的培養，這些成果展現在十期的學報內容，將學生培養成學者是一條漫長的路，他們有些人已是學界要角。再者，《道教學探索》收稿多元，比如轉載當時重要道教界新聞供讀者翻閱，如劉枝萬教授（1923-2018）報紙專文，高雄道德院創辦「修真道學院」招生簡章等，增加學報內容知識性。當時道教學院師資陣容堅強，如黃典權教授（1927-1992）、丁煌教授、丸山宏教授、何培夫教授（1954-2022）等人，課程包含經典、科儀、神學、五術面向，看出學者的精細策劃。

四、回首來時路

臺灣解嚴超過三十年，宗教研究在戒嚴與解嚴的過渡期納入國家正規教育體制，一路走來，歷經無數艱辛困難。同樣地，道教研究也是如此，丁煌教授在1986年於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開設「道教史」課程，礙於課程學分數的限制，丁煌教授將長年開設的「史學導論」與「中國史部目錄學」停開，設定為大學三、四年級選修課程，讓已受過初步史學訓練，有知識基礎的同學選讀，這在當時的大學校課程堪稱少見，持續到2013年才結束。發行《道教學探索》即是見證這段時間的歷史。丁煌教授訪談提到認為念歷史系的學生，受就業市場人力供需的失衡影響，不免對前途感到茫然，他強調指引學生及早尋出一條較適合的道路以及未來努力的目標，非常重要，教師不能替學生決定方向，只能觀察學生的性向、專長和具備的條件，督促學生使其增強自信心。有鑑於此，丁煌教授決定募集獎學金和籌辦刊物讓優秀的學生們，讓他們能夠得到鼓勵並精進研究。

本文初探道教研究在成大的發展，追溯丁煌教授在求學歷程受到師長的關愛與提攜，當丁教授為人師表，亦將這份心意傳遞給學生。筆者認為《道教學探索》是丁煌教授與郭瑞雲總幹事的嘔心力血之作，是道教研究在成大的具體展現，作為臺灣四十年來的道教研究發展，成大的貢獻極具重要。在書寫成大學術發展史，道教研究曾經在八零乃至九零年代發光發熱，不僅是學者創造了歷史，更有一群人見證道教學術如何在國立大學生根，透過課程的建置、學報的發行以及會議的舉辦，如同丁煌教授在1993年〈道教史教研工作的回顧兼陳關於唐史教學的幾點淺見〉所言：「因為學術研究的成果，要經歷漫長艱辛的耕耘，方能致之，後繼人才的培育，也要付出極高的代價和苦心。」希望在不久將來，成大能夠繼續開設道教相關課程，傳承前輩學者的精神，豐富成大人的文化內涵。



丁煌教授主題演講〈道教研究的展望〉
「成大、輔大道教研究生雅敘學術研討會」（成大歷史系振芝講堂）。
2014.08.26



筆者訪問丁煌教授合影（成大歷史文物館）。
2017.01.10
（從左至右：吳瑞明碩士、丁煌教授、劉韋廷博士）

國立成功大學

歷史系與臺灣史研究

論文發表人：成大不分系／王政中

進入成大光復校區，走過成功湖畔，很難不被周遭的建築物所吸引。首先映入眼簾的是小西門城樓，原先位於現今西門路上，是清代臺灣(臺南)府城的八座城門之一，戰後因圓環開闢而面臨拆除的命運，最後在當時校長羅雲平的爭取下拆遷至現址保存；位於成功湖旁的是歷史系館，原為日本殖民統治時期「臺灣步兵第二聯隊」本部的辦公處，戰後則成為國軍營區，在成大收購光復校區後成為文學院的共用空間，後規劃為歷史系單獨使用。巧合的是，成大歷史系的成立與小西門的拆遷都發生在1969年，似乎暗示著成大歷史系要以周遭事物作為發展的基礎，也就是臺灣史。

在解嚴以前，臺灣史因為政治因素，在研究上都是隱而不現，其隱身之處，通常是在中國史的脈絡或是鄉土研究之中。在1990年代以前，不少歷史系學生都不曾修過臺灣史課程，但成大歷史是其中的例外，透過系所發展的回顧，我們能進一步理解成大歷史系是如何與臺灣史研究研究結下不解之緣。

壹、成大歷史系的創立與臺灣史師資課程

國立成功大學的前身是臺南高等工業學校，建立於1943年，是日治時期總督府配合殖民地的政策，培育理工實務人才而建立。1945年，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中華民國政府成立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對臺灣進行接收，臺南高等工業學校是由留學德國的王石安博士抵臺與原校校長甲斐三郎洽談接管事宜，在正式被任命為校長後，統籌臺南工業專科學校的接收行動，並積極從大陸找尋學者來臺任職。這也意外促成訓導長張駿五的妻子—原先任教於東北大學歷史系的吳振芝一同來臺，她不但是當時省立工學院內少數非理工背景的教職員，也成為創校以來第一位歷史老師。來到省立工學院後，吳振芝主要負責中國通史、西洋通史以及中國近代史等科目，早期因為師資缺乏的緣故，全校的歷史科教學都由吳



振芝一手包辦。1956年，臺灣省立工學院改制為臺灣省立成功大學，共同科暫停設置，改擴充為文理學院，吳振芝的受聘單位也轉為新成立的中文系，但授課科目維持不變。

隨著臺海局勢的穩定與經濟發展的成長，為了提高國民知識水平，政府開始施行九年國民義務教育，為了彌補國民中學師資的數量，教育部開始將非師範體系的公立大學納入師資培訓的來源，因此需要公立大學開設與國民中學科目相關的科系。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成大歷史系於1969年正式成立。當時的校長羅雲平特地聘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吳緝華研究員擔任系主任。不過由於是以借調的形式到成大任職，因此吳緝華每周有兩天要回史語所進行研究，加上授課與系務，可說是十分忙碌。而成大歷史系在創立初期，也面臨到不少的困境，例如經費的短缺、教師不足、課程負擔較重等問題，也讓系所尚未有明確的發展方向。

在吳緝華被新加坡南洋大學聘任後，由吳振芝暫代歷史系主任，吳振芝雖然是外省籍，且長年耕耘中國近代史，但她對臺灣懷有深厚的感情，並且願意學習臺語及接受本地文化。她來臺多年了解成大位處臺南的地理優勢，除了成立地方文史調查的「史蹟勘考小組」，並利用假日開始進考察工作之外，在師資上則以聘請李冕世與石萬壽對於開展臺灣史研究最為重要，兩位老師雖然在專業領域與教學上以中國史為主，但他們都願意犧牲課餘時間和假期帶領學生閱讀文獻和實地考察，對於史蹟勘考與參與的學生貢獻良多。

吳振芝雖然沒有直接提出成大歷史以臺灣史為發展走向，但她認為這是時勢引領的結果，這樣的說法符合1970年代的臺灣政治環境。當時中華民國面臨到退出聯合國的危機以及緊接而來的保釣運動，一連串的政治事件不但動搖中華民國對外宣稱代表一

個中國的正當性，同時也刺激知識分子重新反思臺灣代表的意義。與此同時，學術界也陸續開展多項與臺灣有關的研究計畫，包含中央研究院和美國合作的濁大計畫、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的中國現代化區域研究等，甚至部分大專院校的歷史系也陸續開設臺灣史課程，例如淡江文理學院（現淡江大學）的臺灣史課程是以講座的形式邀請專家學者授課。

1973年，臺大歷史系陳捷先教授被借調至成大擔任系主任，他的到來替成大歷史系在教學及研究上奠定良好的基礎，其中最重要的是制訂「臺灣研究」計畫。陳捷先認為臺南的文化歷史悠久，成大歷史系需要積極與公家機關合作，並透過文物資料收集、田野調查和召開學術會議等活動，成為臺灣南部的臺灣研究中心，以彰顯其特色與地位。在陳捷先的主導下，成大歷史系先後聘請蔡茂松、梁華璜及黃典權等人任教，分別開設韓國史、日本史與臺灣省志，讓歷史系的課程更為多元，並發展出自身的特色，也讓成大成為較早開設臺灣史課程的歷史系。

特別需要提的是黃典權在歷史系開設的課程——「臺灣省志」，雖然課程名稱有其時代脈絡，卻也同時是歷史系唯一課程名稱與內容直接與臺灣史相關的課程。黃典權鼓勵學生閱讀當時剛編纂完成的臺灣文獻叢刊，並充分利用臺南的史蹟、遺址、碑文及各種文物，讓學生在閱讀文獻史料之外，能同時進入田野進行對照與考證。學生們除了能接觸豐富的授課內容，在參與過程中也都能給予相當程度的回饋，並且發表相關成果。

雖然由陳捷先所奠定的「臺灣研究」計畫與研究風氣不因他返回臺大而中斷，但師資的聘任開始出現停滯的狀態。戰後的臺灣史研究雖然曾有短暫興盛期，但在二二八事件與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後，轉以蒐集整理史料和編纂地方志為主，研究成果則因為

政治環境的影響，多集中於清代臺灣史與武裝抗日。即使臺灣史研究風氣到了1970年代開始有所轉變，但性質上仍是附屬於中國史之下的地方史，不但研究生撰寫相關論文的數量十分稀少，畢業後要依靠臺灣史來獲得教職或研究職缺也十分困難。成大歷史系也一直要等到1980年後，才陸續聘任林瑞明和何培夫兩位系友返校任教。

隨著蔣經國在1987年解除戒嚴，大學內的學術自由才逐漸落實，學校對於教師的聘任以及課程的規劃也逐漸鬆綁。1990年代，本土化浪潮隨著政治環境開始風起雲湧，臺灣史成為歷史學界的熱門研究主題，各校的歷史系陸續開設臺灣史課程。1994年，成大歷史系「臺灣省志」的課程名稱正式變更為「臺灣史」，與中國通史和世界通史並列為大一生的必修課之一；同時，成大歷史研究所在梁華璜、石萬壽及林瑞明的引領下，不少研究生也選擇投入臺灣史領域，其範圍從清代跨越到戰後，正式宣告成大歷史系的臺灣史研究邁入新的階段。

貳、府城出發，放眼國際

一、史蹟勘考與地方文史研究

上一節提到由吳振芝等人所發起的史蹟勘考，讓學生可以走出教室進入田野，是成大歷史系臺灣史研究的一大特色，與臺南歷史文化有密不可分的關連，不過早在日本統治時期，日本人就開始在臺南地區進行鄉土研究。根據學者的研究，前嶋信次、國分直一等日本籍中學教師因為對於臺南歷史的興趣而展開調查與研究，同時也與臺南當地的文史研究社群，例如石暘錐、莊松林等人進行合作，雙方得以相互交流學習。這群臺南人在戰後不但成為臺南縣市文獻委員會的主要成員，並且透過《臺南文化》與《南瀛文獻》為場域，持續進行臺南的文史研究。有意思的是，日後任教於成大歷史系的黃典權在1951年也進入臺南市文獻會服務，後來執掌

《臺南文化》的編務並發表多篇文章。可以推測黃典權與臺南地方研究社群有密切的交流，讓他能將相關的研究經驗帶進成大歷史系。

「史蹟勘考」的源頭是從歷史系彭小甫教授倡議重視地方文物研究做為起頭，後續由吳振芝請益當時在臺南市文獻會服務的黃典權，並請系上李冕世老師負責輔導學生進行勘考工作。雖然史蹟勘考主要目的是脫離書本，但基礎的臺灣史知識仍是不可或缺，李冕世在出發前就召集參與的學生說明如何閱讀方志、地方文獻以及古地圖，讓學生對於臺灣史和臺南的歷史發展有更深入的理解。在石萬壽加入之後，史蹟勘查小組內部進行更細緻的分組作業，分別是負責整理刊行史料的資料組、負責採訪攝影等現地調查工作的採訪組、以及負責拓碑和保存文物的典藏組，並且在資料圖書整理和測量部分聘請專業人士協助，讓史蹟勘考的學術性質逐步提升，更獲得當時臺灣省文獻會的肯定。

在陳捷先到任後，他所推行的「臺灣研究」計畫持續支持史蹟勘考活動，特別是爭取到與哈佛大學燕京學社（以下簡稱哈燕社）的經費合作，讓史蹟勘考的運作可以無後顧之憂。同時為了讓系上教師與學生的學術成果有可以呈現的空間，並推廣成大歷史系的名聲，陳捷先運用發行《臺大歷史學報》的經驗，進一步促成《成大歷史學報》和《史蹟勘考》的出版。雖然《史蹟勘考》只發行九期就因為補助經費短缺而中止出刊，但大部分的文章都是歷史系學生參與勘考的成果，加上臺灣省志課程的配合與練習，讓《史蹟勘考》得到海內外學者的一致讚許。

隨著《史蹟勘考》的發行以及哈燕社的經費支持，勘考小組的足跡也逐漸走出臺南縣市，在嘉義、高雄、屏東甚至是澎湖的鄉鎮村落，都能看到成大歷史系的師生進行口述訪談、田野調查或是拓碑的身

影，也因此蒐集了不少文物與拓碑影本。為了讓文物都能妥善的保存，歷史系暫時佈置出一個文物研究室的展示與保存空間，後續隨著文學院圖書館的搬遷，文物才陸續搬移至歷史文物館的現址，並且定期舉辦展覽活動，在歷史系的經營與校方的支持下，歷史文物館成為許多外賓必訪的景點之一，例如故宮院長蔣復璁、英國科學史學者李約瑟等都曾至文物館拜訪。

二、國內外的學術交流合作

成大歷史系在創立初期因為系務繁忙，加上系上師資人員較少，並無太多機會與外界進行交流合作的活動。直到陳捷先接任主任後實行臺灣研究計畫，認為歷史系需要積極與公家機關合作，並且召開學術會議來進行交流，才逐漸將歷史系的交流大門對外敞開。

陳捷先任內最為人所樂道的，就是搭起成大歷史系與哈燕社的合作橋樑，過往哈燕社僅有給予臺灣大學和中央研究院研究補助，陳捷先運用先前在臺大時的合作經驗，並且四處奔走才達成最後的合作協議。哈燕社不僅支持史蹟勘考活動與出版，同時也透過審核來補助系上教師的研究計畫，這對於當時臺灣的大學教職員而言是一筆不小的助益。在1972到1984年的補助期間，通過審查的計畫有一半以上都是與臺灣研究相關，可以看出哈燕社對於成大歷史系進行臺灣史以及臺南地方研究的支持。除了哈燕社以外，成大歷史系當時尚有與西德法蘭克福大學、日本筑波大學交流來往，但實際上的合作都不如哈燕社來的長久且穩固。

在國內的部分，作為立足臺南的大學，成大與臺南市政府一直保持密切的合作關係，最早由臺南市長張麗堂與歷史系簽訂研究合約，主要內容為協助市政府研究地方歷史、保存地方文物、勘查維護地方古蹟以及進行採訪紀錄。接著與臺南市社會教育館

簽訂地方文物勘考研究合作協議書，並且至大南門城碑林進行拓印工作。同時也協助市政府辦理多場展覽以及研討會，其中為期兩天的「臺灣史料學術與臺灣地區文物維護研討會」，更被稱讚歷來為最為成功的臺灣史學術研討會。除了地方政府機關，國立臺灣博物館以及故宮也都和成大歷史系有密切的合作交流計畫，主要的重點是放在歷史文物的考察與維護，故宮方面也曾派員至成大進行拓碑技術的指導。

參、結語

作為以理工立校的學院，成功大學從前身臺南高等工業學校以來培育出許多活躍於工程的實務型人才，但也因為耀眼的成就，掩蓋了成大作為綜合性大學的事實。位處於臺南，是成大先天上的優勢，坐擁臺南四百年的歷史文化，成大歷史系的誕生與成長過程都能予以善用，進而開創獨樹一格的臺灣省志課程以及史蹟勘考活動，並且得到國內外學術機構的支持與合作，成為成大發展臺灣史研究的最大的特色，讓成大在臺灣史研究熱潮興起之前便累積一定的研究成果，給予後續學生們不小的助益。但位處臺南卻也是成大歷史系的隱憂，1990年代以前的交通網絡與資訊不如現今發達，一方面較不易獲取北部豐富的學術資源，另一方面除了期刊的發行之外，成大歷史系的臺灣史研究成果都較少受到學術界的關注。

隨著臺灣史成為大一新生的必修課程，相關選修課程也足以撐起單一研究領域，成大歷史系的臺灣史研究成果已經是有目共睹，所培育出的研究人才也遍佈全臺的大專院校，這股研究能量同時也注入成大的校史編纂以及全校性通識課程一踏溯臺南之中。當我們看到現在的榮景時，仍需回首前輩們在系所創立初期的辛勤耕耘，又如何政治環境的壓力下努力尋找出路，才會更加珍惜我們今日的成果。

本是同根生、校史沒有提： 「成大」機械、航太兩系的人與事

論文發表人：國家鐵道博物館\曾令毅

一、探究成為「航空搖籃」的過程

提起國立成功大學，第一印象大概是一所歷史悠久且以理工科系著名的大學。不過，成大雖有許多知名的科系，但在眾多理工學科被列為全國第一志願的，其中之一大概就屬航太系了。那麼，究竟為何像航太系屬於先端科技的科系，會出現在成大？查閱以往成大編纂的校史，其實並沒有詳細交代這段歷史，只有在機械系系史網頁中記載：

「1972年機械系大學部在原有的甲、乙兩班之外，增設航空組一班。1976年第一屆航空組畢業後，同年航空組獨立為航空工程學系，獨立招收新生，尚在學之航空組學生則仍維持機械工程學系航空工程組學生之學籍，至1979年全數畢業」。由此可知，成大航太系最早源自於該校機械系的航空組，其後才獨立發展成航空工程學系，一直到現在的航太系。

那麼，機械系設立航空組的時間為何是在1972年？本篇小文將試圖藉由多元史料的重層建構，除以校史為中心，也透過航空技術與人物等議題為導向，釐清並說明「成大」為何能成為近代臺灣航空工程學門重鎮的累積過程與主要原因。

二、臺版《風起》出現的背景與主角：葉啟聰的故事

要探究「成大」成為「航空搖籃」的源起，就必須從其前身臺灣總督府臺南高等工業學校的設立談起。1931年「高工」因日本殖民地經營的產業需求與工業化政策背景之下而設立。該校設立的年代，乃是1930年代日本軍國主義



色彩開始日趨濃厚的時代。因此，該校設立的時代背景，也反映在學校的核心價值「工業報國」，特別是當時航空科學屬於最先端的科技之一。可想而知，「高工」在往後日本「航空國策」，甚至是航空相關產業在臺灣本地的推展，應會被寄予某種程度的厚望。

該校成立後，先後設立機械工學科、電氣工學科、電氣化學科、應用化學科，以及1944年增設的土木科、建築科。其中，因機械工學的學理與屬性之關係，其學科內容多與飛行原理相通，故學科基礎可延伸應用於飛機之製造，可說是「高工」所有科系之中，與航空科學最密切相關的科系。1933年，學校為因應「準戰時體制」的到來，乃依「臺南高等工業學校國防工業研究會會則」規定，促使該年後航空科學成為重點研究項目，同時規定「航空機」成為機械工學科第三學年的修習科目，開啟了臺灣學校教育中的航空工程課程。

值得一提的是該校的航空相關課程，除了機械工學科的專業課程教育外，最著名的就是1937年以機械工學科學生為主的滑翔機社團，之後則是發展出結合臺南州下各中等學校滑翔機社團，或召集有興趣的青年及學生於1938年組成，以推廣航空知識與技術養成為主的「臺南州國防義會航空團」。而航空團發展的基礎，可以說均源自於學校本身的航空相關專業課程，以及滑翔機社團所累積出來的養分。

「高工」的航空專業課程，以及培養預備飛行員為主的滑翔機社團與擴大訓練的「航空團」，都讓該校學生在研發製造飛行器與實際進行飛行操作方面，兩者得以相互學習及應證，一定程度促使學生的航空工程專業快速進步，並逐漸出現具體成果，畢業後他們不乏前往陸海軍，或是三菱、川崎、川西等知名大型飛機製造公司任職。不過，他們大多沒有機會主導一整架飛機的設計研發與製造，只有葉啟聰是目前可見唯一一位日本時代就設計出飛機，並以個人身分留名於日本航空界的「高工」畢業生。

葉啟聰（1920-1977），生於新竹市表町，1935年新竹州立中學畢業，1936年考入「高工」機械工學科，後加入學校的「國防研究會」，進行航空相關技術訓練。1937年進入「滑翔機部」，1938年成為臺南州國防義會航空團的創始會員，同時被蒞臨參與航空團成立會的大阪福田輕飛行機株式會社相中而延攬入社。

1938年葉啟聰畢業後隨即進入大阪福田輕飛行機株式會社，擔任工場長前田健的助手。1939年前田與福田拆夥，使得福田失去了重要的技術支柱，因此身為前田工場長一手栽培出來的葉啟聰，不到20歲就被賦予一肩扛起會社的技術重任。於是，該年葉啟聰陞任福田輕飛行機株式會社製作部部長。隔年旋即就接到航空局的試作命令，希望能設計並製造

出一架附有馬達動力的滑翔機（motor glider），也就是現在俗稱的「輕航機」。該型機於1941年8月完成試作過程，並命名為「光式二型」，最大飛行距離約500公里。根據當時的報導，該型機還被當時軍方寄予厚望，準備仿效德蘇兩國的「空中列車」的運輸方式，透過飛機拖曳動力滑翔機，作為對敵發動空降奇襲作戰的利器。該型機可說是葉啟聰一戰成名之作，也因此讓年僅21歲的葉啟聰留名於日本的航空界，作品也被收錄在當年的日本飛行機年鑑。

1945年日本戰敗，美軍GHQ隨即禁止日本進行航空器相關的研發工作，但葉啟聰仍秉持對航空的熱愛，將東京的自宅庭院闢建成「飛機工廠」，持續進行滑翔機的研發與製作。他對滑翔機研發的熱情與技術，使得1956年戰後第五屆國際滑翔機大會舉辦時，受到日本航空協會之邀請，不僅擔任隨行修護技師和參賽選手搭配一同赴法國參賽，連參賽的滑翔機也是委託他利用新型材料所製作。該屆大會日本選手小田勇獲得銀牌的佳績，也是日本首次在該項國際大賽獲得獎牌。

葉啟聰自15歲就進入「高工」機械工學科就讀，並陸續接觸到航空專業知識，1969年雖因故放棄航空事業自日本返臺，但長達34年的人生有大半時間都在研發與製造滑翔機及輕航機。他所具備的國際級技術無疑是受到「高工」航空專業養成的養分而來，個人努力加上機運，使其得以在日本甚至國際航空界發光發熱。

三、延續、斷裂與再生：戰後「成大」機械工程系與亞洲航空公司

1945年8月日本戰敗，該年12月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命畢業自德國達姆斯太工科大学航空工程系的王石安博士接收該校，1946年2月王石安受聘為校長，並開始接管校務。1946年10月學校升格為「臺灣省立工學院」後，王石安續任為首任院長，並陸續延攬羅雲平（土木／鐵路）、倪超（土木／鐵路）、李定文（數學）、李立聰（化學）、李詩長（化學）、葉東滋（航空）、江鴻（土木）、張駿五（電機）、錢自誠（航空）、秦大鈞（航空）、王平、王善政（化學）、馮維仁（德文）、朱尊彝（國文）、陶聲洋（機械）等留德學者前來學校任教。王石安校長在任的時期(1946-1952)，該校可說是留德派的「大本營」。

其中，包含院長王石安在內，由院長延聘進入機械工程系的葉東滋（系主任兼教務長、代理院長），以及秦大均（第二任院長）、錢自誠、張象賢（義大利航空學博士）。另外，還有1955年受聘來校兼任，擁有麻省理工學院航空工程碩士，曾任職波音飛機公司的王助，這些均是戰後初期機械工程系內航空工程專業的主要師資，其陣容與專業程度可謂當時全臺最為齊備堅強。因此，1947年該校「擴充計畫」還載明：「除原有六學系外，依照順序先後，必須添設造船、航空，次為採礦、冶金，最後則為造兵及紡織」。由此，說明了戰後該校持續發展航空工程專業的態勢。

另根據學校簡介顯示，可以發現1951年以前機械工程系原本分成的機械動力、機械製造、航空等三組。但1951年只剩下機械動力、機械製造兩組，原本的航空組不僅沒有獨立設系，還消失不見。究其原因，除了1950年代初期因政府播遷來臺之故，使得航空技術人才供過於求，導致學校難以按照原先計畫，獨立設置航空系，甚至在1951年還將機械工程系的航空組撤銷。而在外部大環境因素之外，從1951年起校內因院長王石安涉入的「桃色糾紛」所引發出的教職員人事紛爭與派系鬥爭，似乎也可解釋航空組被取消的內部原因。這個事件即是1951年轟動一時的王石安「誘騙姦污」女講師朱振雲投湖自殺案。

從事件發生之後，學校一部分教師登報發表聯名公開信可知，王石安案已造成學校方面產生人事與派系紛爭。1952年1月王石安雖因當時刑法第二二八條規定此案為告訴乃論，除死者外需直系親屬方得提告，但因兩岸分治之故，使得王石安最終獲不起訴處份，逃過牢獄之災，並辭去臺灣省立工學院院長一職。

1952年王石安去職後，院長一職由德國阿亨工業大學航空工程博士出身的秦大鈞教授接任，原本的代理院長葉東滋接任院長的希望宣告落空，且其與王石安的關係一向密切，被歸為同派，故不容於校內另一派教職員所接受，且屢遭其杯葛，處境艱難可想而知。於是1953年7月8日，校方舉行第卅九次行政會議之前，另一派就發動校方停聘葉東滋等人的

提案，並以多數決形成決議，此事件在校內引發頗大的人事糾紛，最後還是經由中國國民黨第四知識青年黨部分別勸導調處，才得以及時善後。由此說明，葉東滋確實可能受到王石安案的牽連，遭到其他同事杯葛並導致學校停聘而去職。

1952年至1953年間，王石安、葉東滋等教授相繼去職，錢自誠又因故早在1951年以前就已離校，學校的航空工程專業師資就僅剩張象賢與院長秦大鈞，但張象賢已轉教汽車設計、機械設計，而院長綜理院務、公務繁忙，自然不太可能繼續教授相關課程。因此，在師資缺乏的情況之下，航空組不僅被機械工程系取消，甚至在往後長達十年的期間，都是由外聘師資的王助兼任該校航空專業課程（1955-1965），迄至1966年6月機械工程系決定規劃重設航空組以前，基本上都還是維持這樣的模式。

1953年7月，葉東滋離開省立工學院，隔年即因其航空工程專才，被延攬進入亞洲航空公司擔任訓練組專任講師。葉東滋在亞航服務十八年間，總共負責公司內共二十九班的專業課程，訓練公司學員共1,623人。而且他的學生除了本國人，還因為1954年「亞航」開辦國際外勤訓練班，協助韓國、沖繩（美軍佔領期）、寮國、越南、泰國等東南亞各國代訓為數眾多的航空人才。此外，葉東滋還不忘拉拔昔日省立工學院的學生，前來亞洲航空實習，甚至進一步協助對航空工程有興趣的畢業生進入公司就職。

1972年6月，葉東滋自亞航退休，但他並不是真正退休，而是將其累積了十數年的先進航空工程專業與飛機維修技術，重新貢獻給當初將他「掃地出門」的成大。當時臺灣的民航事業急速發展，因此葉東滋受聘返回成大的最主要目的，就是協助機械工程系重新籌設航空組，並於同年8月藉由其人脈將亞航的設備捐贈給成大，以作為航空組籌設的基礎，並以此規劃四年後能夠獨立設系。從1947年省立工學院時代就規劃在機械工程系設立航空組，經過1950年代初期大環境變動，以及校內人事紛爭與派系鬥爭，歷經25年星霜才重新恢復航空組的設立，終於在1976年實現獨立設置航空工程系，這也算是葉東滋及當年航空工程專業的教授們，另類的一種「王子復仇」吧？

四、這些人與事為何會被校史遺忘？

1931年「高工」的設立，源自臺灣本身產業的轉型與發展需求，而被賦予提供高等工業技術人才養成的厚望。同時，隨著日本在東亞地區軍事力量的逐漸擴張，產業與技術的發展往往需配合國防政策的走向，連帶也會影響教育機構的人才培育方針。「高工」以機械工程科的課程為基礎，藉由學理、實作，結合滑翔機社團等活動而發展出的航空專業課程，就是高等工業教育配合時局變動與國家需求發展的一個實例。不僅培養產業需求的機械工程通才，也通過基礎學理之間的共通性與關聯性，進一步培養了航空工程的專才。讓臺灣學生也能夠通過航空專業課程的訓練，成為獨當一面的航空工程師，甚至獨立設計飛機，在歷史留名。

戰後，「高工」的航空專門課程，並沒有隨著政權的轉換而消失，反而仍因國防軍事需求，在師資、設備與規模，都朝向更專業與獨立的規劃及發展。只是，原本規劃朝的走向發展，卻因為外部需求，以及內部派系鬥爭與人事紛爭，導致專門師資出走，連帶也阻斷了日本時代以來學校在航空工程方面的發展進程與延續。致使往後臺灣高等教育的航空專門人才培養停滯了將近十八年，才於1972年重新在成大機械工程系下設立航空組，並在1976年獨立設系，成為現今臺灣大學航太工程學系的翹楚。因此，成大航空工程系成立的受阻，某種程度可以說連帶也影響，或者說反映了戰後臺灣航空工程人才養成的停滯。

校史除了把學校當成舞臺，不同時代來去的師生是主角外，師生下了臺，離開了學校，在外面的人生精彩、所學有所發揮，最後回過頭來影響學校，甚至是更大的整體社會，他們的故事應該也相當重要，不應被忽略。他們可能不一定是傑出的個人，也可能是一個群體，或是一個看起來不被世俗定義為「成功」的人，甚至是政治受難者、權勢壓迫或派系鬥爭下的犧牲者。



換言之，離開學校這個舞臺後，他們還是有可能帶著舞臺曾經給他們的經驗與養分，將學校的精神與風格，一路發揚傳承，甚至影響到後輩。這應該也是校史，應該紀錄或闡述的一個重要部分吧？不論是看起來光明的正面，抑或是看起來晦暗、不被注意或重視，相對於光明的另一面。唯有坦率地面對自己真實的過去，才能真實地認識到自己，也許才能找到繼續邁進的方向與價值。個人生命史如此看待，相信更大範圍的歷史，應該也是如此。

筑波大学の歴史とアーカイブズ—創基150年の年に—

筑波大學的歷史和檔案 建校150週年

專題演講者：筑波大學人文社會研究科 Yukari Tanaka 田中友香理

我是筑波大學人文社會學系助教田中，本人在大學從事的是日本近代史相關教育及研究，專攻近代史中明治時期的思想史及史料學。另一方面，本人身為筑波大學校史整合架構的一員，也是編纂筑波大學50年史的編纂員。

今年正逢筑波大學的「始祖」師範學院設立150周年，而明年則將迎來筑波大學本身開辦的50周年。因此，今天想跟各位報告筑波大學是一所怎麼樣的學府？其史料又是被保存於如何的場所？其校史又是如何進行編纂？

壹、日本的大學與筑波大學的歷史

一、師範學校～東京師範學校

（一）學制

筑波大學有著好幾位「祖先」。首先，筑波大學的始祖是設立於1872年（明治）的師範學校。要說到這所學校之所以會設立，不得不提及於同年所制定，有關近代日本首次體系性的教育法令—學制。其主旨為「人們需立其身，治其產，昌其業，以此生遂」，因此「學校」



圖右為演講者田中友香理。

的需求於焉產生。總言之，明治5年這一年是福沢諭吉的《學問之勸》初篇被刊登的年份，而他在隔年亦成立了「明六社」，該組織核心成員之一的中村正直，則是在明治3年，以「西國立誌編」的形式出版了塞謬爾·斯邁爾斯Self Help的日譯版，他們帶來了建構於知性世界的文明開化，其等於此時的著作所顯示的學問觀均具備相當之「實用性」。其後，明六社成員之一的箕作麟祥，則是學制起草的人物之一。因此，我們可以說此學制是對全日本的年輕學子傳遞了學問不僅代表著希望，同時亦能成為立身顯達的工具般，令人慷慨激昂的訊息。

於是乎義務教育獲得了重視。當時，作為義務教育的小學被規劃為每600個人設立一所。而日本當時有3000萬人，故以設立五萬所學校為目標。至此，產生了小學教師即戰力的需求，而師範學校便是以培育小學教師的搖籃開始出發。

（二）師範學校（明治5年～明治6年）

師範學校為全額公費的公立學校，教師由名為史考特的美國人一人包辦。其後，在美國習得教育學的伊沢修二及高峰秀夫擔任校長及教師。因此，一般認為初期的師範學院採用的是美式風格的師範教育。

（三）東京師範學校（明治6年～明治19年）

接著，由於在大阪、宮城增設了師範學校，甚至連在東京也增設了女子師範學校之故，師範學校於1873年（明治6年）七月被改稱為「東京師範學校」。但在1877年所發生的西南戰爭導致財政困難，公立師範學校僅限東京師範學校及東京女子師範學校兩所。

二、高等學校～東京高等師範學校

（一）師範學校令

東京師範學校於1886年（明治19年）成為高等師範學校，此乃根據第一任文部大臣森有禮親自起草的師範學校令而成。師範學校可分為培養小學教師的一般師範學校及培養師範學校、國中教師的高等師範學校這兩種類型。

如上所述，東京師範學校改組為東京高等師範學校。師範學校令中規定，學生在畢業後須成為教師的義務，並補助其就學中的學資。還有其他如：帝國大學令、中學校令、小學校令等。高等師範學校與帝國大學因此之故成為唯一以公費進行營運的高等教育機關。

（二）高等師範學校

相對於帝國大學中所提及的「國家大學須以教授國家所須之學術技藝，並致力於探究其蘊奧為目的。」師範學校在學校令中只被認為「培育成為教師所須之場域。」由此可見，政府所賦予兩者各自扮演角色的差異，也由此般差異為起始點，高等師範學校內部次第出現不同的聲音希望昇格為大學。換言之，即是昇格為不單僅只是教育，且進行研究的機構。這部分我們稍後會再論述。

這張照片是師範學校令原稿，現今被當作是「御署名原本」，珍藏於國立公文書館內。所謂「御署名原本」意為由天皇親自蓋印「御名御璽」，也就是由天皇裁定可公布頒發文件的原稿。明治19年伴隨著公文式的內閣制度，公文制度有了變動，現定法律敕令須由天皇的裁決（上諭）加以頒布。

然後，在明治19年5月18日，明治天皇行幸更是加深學校與國家之間的連結。明治天皇親自造訪高等師範學院，並參觀了學生的軍事體操及宿舍的情況，甚至在當天賜予了敕語，即為「本日親臨此校，目睹諸事皆宜、業務優良之際，朕甚感嘉冕，並期許諸位在教官等的勉勵之下，百尺竿頭。」同時也記載到天皇陛下對即將成為教師的學子們提及：須具備「順良」、「信愛」、「威重」等氣質。並導入模仿軍隊的體育教育。姑且不論其善惡，此舉等於確立了「師範人設」的畢業生形象。

坊間普遍認為這種打出與帝國大學大相逕庭差異性的舉措與於1896年（明治29年）至1920年間歇性擔任校長的嘉納治五郎的意志實踐有關。而師範教育的理念也持續成為大學昇格路上的絆腳石。另一方面，學校本身則吸收了現在的東京藝術大學的東京音樂學校及國立科學博物館的東京教育博物館，膨脹成為更大的組織。

（三）東京高等師範學校

明治30年（1897年）的師範教育令制訂高等師範學校負責培育中學、師範學校、高等女子學校的教師。由於增設中學的需求強烈，二年後便訂定了新的中學校令，也承認地方依據市町村設立單一中學，於是產生了更多中學教師的即戰力需求，明治35年廣島高等師範學校因此開設，而高等師範學校則更名為東京高等師範學校。同一時間，帝國大學與高等師範學校校友因中學候選資格一事產生了激烈的對立其中，教科書疑獄事件，這樁針對教科書所引發的收買事件更是引發了高等師範學校出身的校長更迭的情況。

三、東京文理科大學

（一）大學令（1919年大正8年）

截止此時，嘉納治五郎希望在昇格為大學的同時，東京高等師範學校乃須發揮其獨特性，並堅持追求其為師範教育領域的精神於校內產生了兩種相反的意見...前者的思想可說在原敬內閣頒布大學令修正時達到了最高潮。

（二）大學昇格運動與東京高等師範學校

此時，第一次世界大戰所引發的民主主義與民族自決的嶄新思想潮流席捲了全日本，日本政府因此設置臨時教育會議，並企圖透過此類的答辯擴充高等教育，同時特別期盼藉由增設大學以達到「人格陶冶及國家思想涵養」的目的。

公立專門學校及私立學校也因此得以昇格。慶應義塾及早稻田大學便是在此時成為大學。而由於東京高等師範學校的嘉納校長並未特別積極，因此並未搭上這波大學昇格的風潮。而此時學生們展開行動，他們於隔年12月3日召開要求昇格大會。其後，於嘉納退任後新任校長三宅米吉及畢業生同學會茗溪會共同展開了昇格運動。

（三）東京文理科大學

好不容易在1929年（昭和4年）制定了文理科大學官制，東京文理科大學以作為高等師範學校的主修科昇格為大學。其後高師與文理科大同時鼎立，高師並未從此消失。文理科大並藉由例如在史學科國史學的第一講座安排文化史（松本彥次郎）、第二講座安排思想史（村岡

典嗣)為代表,企圖展現出與東京帝國大學的不同。

四、東京教育大學

(一)教育基本法、學校教育法1947年(昭和22年)

二戰敗後,文部省於昭和20年9月發表「新日本律訂教育方針」並倡導「文化國家建設」。依據GHQ(盟軍總司令)徹底落實教育改革政策,發表了教育刷新委員會以及教育基本法綱要,並於昭和22年制訂了教育基本法及學校教育法。

(二)東京教育大學1949年(昭和24年)

於此,高等師範學校及專門學校均改為四年制大學,高等師範學校與東京文理科大合併,東京體育專門學校則與農業教育專門學校合併。東京教育大學踏出嶄新的一步,其建校理念為「培育具有高度學識與宏大視野的優秀教育人才」(東京教育大學學訓)。

五、筑波大學

(一)移轉問題(成為筑波研究學園都市)

(二)筑波大學

轉型後的東京教育大學約莫10年,校內外便開始出現搬離東京的移轉計畫。校內的部分雖有聲浪要求設置新學部與學生會館,但在極度人口過密的東京此舉甚為困難。於此同時,政府首都圈整備委員會於1963年揭示了筑波研究學園都市計畫,於同年亦在校內成立了大學移轉問題特別委員會。只不過在1965年7月

左右,受到文學部與教授會的反對,因此展開激烈的反對運動。此時也正巧迎來日本學生運動的鼎盛期。

著名的全學共闘會議(全共闘)占領東京大學安田講堂事件,便是發生在其4年之後。由於國家主導整個筑波移轉導致學生運動也匯集於此,但在1973年9月29日國內大學設置法的部分修法取得法律動力,筑波大學得以於10月1日開學。世人在歌頌這所大學的「創校理念」及「開放性的大學」之「國際性」與「學術性」的同時,另一方面因曾經歷激烈的反對運動之故,「負責任的管理體制」也一併被註記在內。

但曾為東京教育大學理念之一的培育「教育者」則並未獲得傳承。這裡也得以窺見東京教育大學與筑波大學之間極為困難的關係。

參、日本大學史之編纂

一、～三、戰前之大學史編纂與檔案匯總管理

近代大學的大學史相關編纂始於戰前1932年「東京帝國大學50年史」這部學史是由大久保利謙等人於服部宇之吉的麾下編纂而成。戰後50年後,東大著手進行「百年史」的編纂,這部學史可說是創建出迄今為止國立大學年史的典型。換言之東大史由於具備通史編、資料編、局部史的三部架構故共有10卷,是相當厚重的文史,而京都大學、九州大學、東北大亦承襲了此形式。

而上述所列舉的這些年史編纂史日後均以文書館的形式被留存於校內,而把為了編纂大學年史所收集而來的資料視作為核心史料之舉,可說是日本大學文書館之一大特徵。

肆、文書館與「50年史」的編纂

一、筑波大學文書館之設置～二、「筑波大學50年史」編纂

相較於前述，筑波大學至今幾乎未曾編纂過年史。要說其原因，是由於缺乏史料所致。其實筑波大學雖說有圖書館，但沒有博物館、美術館及文書館，故無法收集保存相關原始史料。

因此，筑波大學是先從設置文書館檔案彙整開始，至此才開始從大學的非現用文書之中收集歷史性的重要史料。而在此前提下著手展開的「50年史」編纂，可說是與其他國立大學的順序完全顛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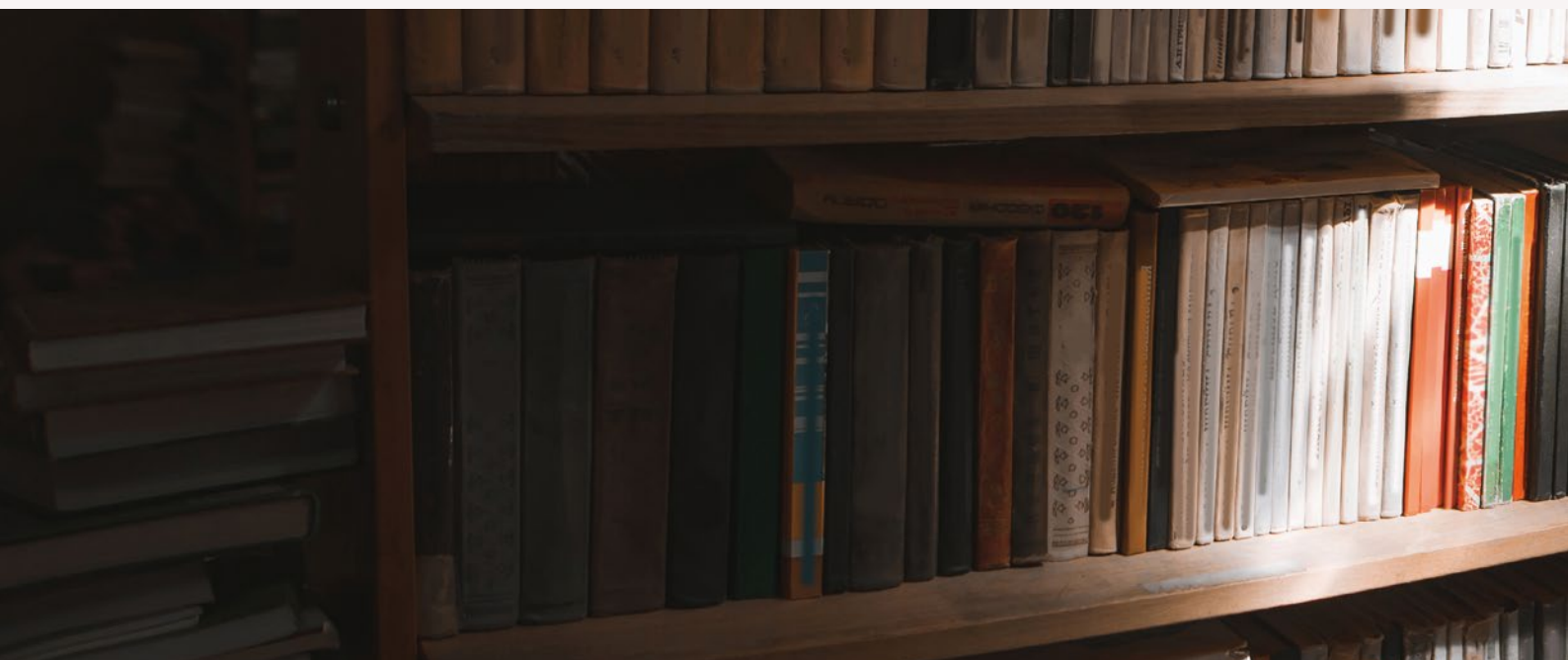
為了要論述這情況的優點，我必須先談談筑波大學文書館是個怎麼樣的機構。此機構指的是依據2011年所制定的公文書管理法中規定之「國立公文書館等」的指定史料保存機關。由於筑波大開館遠晚於其他大學的同樣機構，而其主要用意單單只是滿足公文書管理法的制定。所謂公文書管理法乃是行政機關與法人之文書管理相關統一法律，其規定行政

文書與法人文書之中歷史性重要文書必須移管至「國立公文書館等」，而被指名為「國立公文書館等」的目前全日本共有16處。

其分別是保存宮內廳行政文書的宮內公文書館、保存外務省行政文書的外交史料館，除此之外的省廳均交由國立公文書館移館。而身為獨立行政法人之一的國立大學法人之中的12所大學則被指定為「國立公文書館等」。負責保存各大學的文書。

而其中針對筑波文書館有下列幾項特殊要求：①「承接歷史公文書之移管」②收集、整理並保存筑波大學相關資料③調查研究並加以教育、④提供學生、職員及其他大眾一般使用，透過上述幾項應運而生的便是=》⑤協助本校管理營運之順遂及史料學相關學系之發展。

其中的①與②相關部分，筑波大學本體如前述所述，於1978年3月29日創立者當時便是由文部省大學校長的通知中明述將繼承前大學的相關文書，而筑波大學所繼承的這些文書作為釐清筑波大學歷史的



層面來看乃為至關重要的史料，故移管至筑波大學文書館。而其結果便是匯集完成了筑波大學前身學校與其之間的基礎史料。

另外要提到筑波大學文書館的特色，便是支援史料相關調查研究以及教育。文書館作為校內教育研究組織，其所屬教職員全員均為日本近代史的教師。因此，可透過保存之史料教導學習日本近代史的學生，並且也有傳授編制檔案目錄及檔案修復方法。我們並不偏重於檔案管理學，而是持續朝日本近代史及大學史貼近。

雖說近來日本有相當重視檔案管理學及資訊學之傾向，若此學問乃致力於釐清如文書內容架構的整體面貌，那我可以這麼說：「本館在持續深究之餘，仍持續致力於解析文書所寫的內容。」因此，文書館作為年史編纂的母體，可說對雙方均受益良多，好比是前後車輪般互相互補的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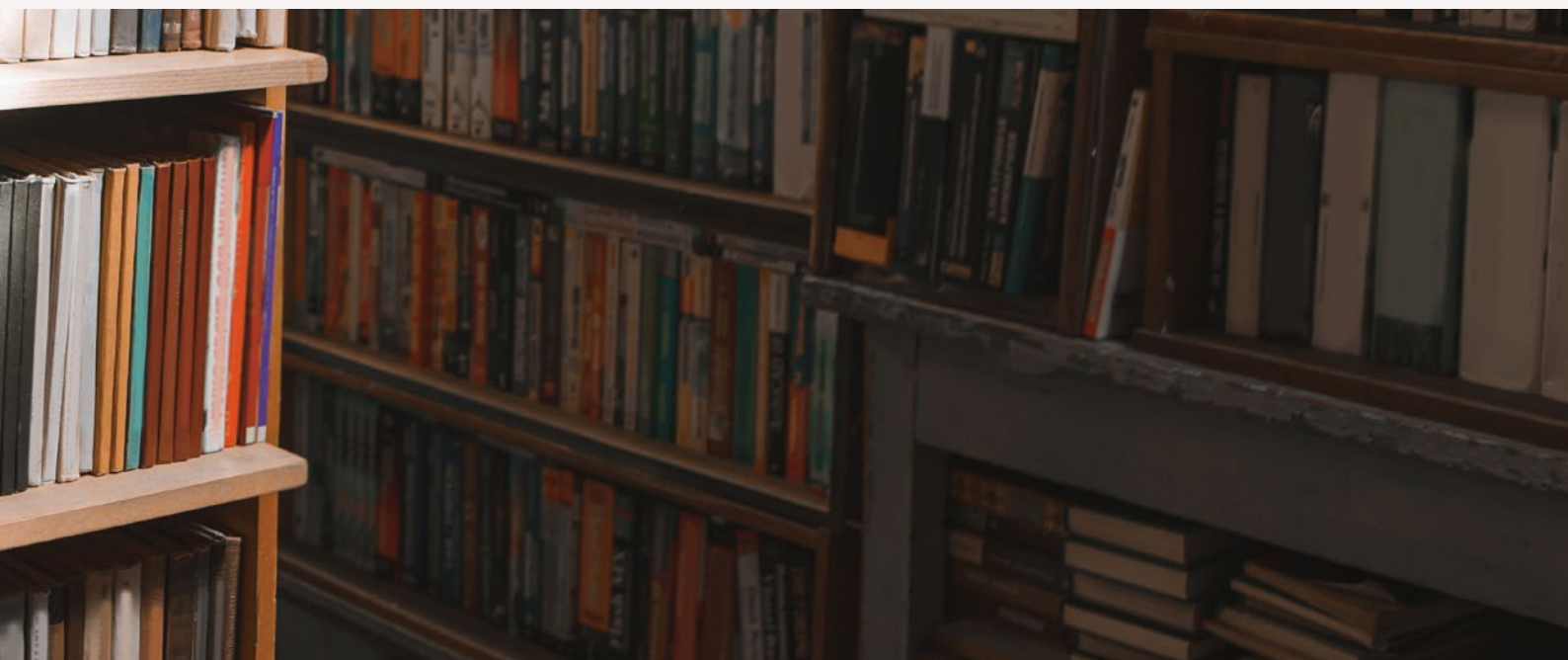
「50年史」的編纂體制，是將編纂室設於文書館，由館長兼任編纂室長，館員兼任編纂室員，由此可

清楚所見如上述般的關係。

接著最後，我想針對這樣的體制在面臨「50年史」的編纂之時，其所抱持之理念與目的，以及其所相關之課題跟各位論述。「50年史」最大的目的，我認為仍是以透過筑波大學自師範學校以來的歷史性地位，加以進行歷史性的評價。

截止目前為止，由於筑波大學受限於相關史料以及移轉紛爭等敏感問題，故無法編纂大學史，但適逢設立50年之際，身為新概念大學的筑波大學究竟抵達到了哪裡？抑或是往後退了多少，我認為都應該使用相關史料加以論述，並進行評價。

而這不僅僅只是將目光放至過往的事象。筑波大學自前任校長起便揭櫫「*imagine the future*」的口號，而創造「*future*」這個口號，其究竟抱持著怎樣的理念，是否適合作為因吸收諸多大學及學校而成立的筑波大學呢？若不總結過去，勢必無法描繪未來。本人僅希望「50年史」能為大學的走向及應有的樣態略盡一己棉薄之力。



國立成功大學的 校園規劃運作機制 之發展歷程

論文發表人：成大博物館\蔡侑樺

校園建築是校史書寫中，不太會被遺漏之對象。因建築物有相對較長的生命週期，為非常具象的形體，也是全校師生倘佯其中的空間，而且因建築物有一定之造價，較容易在歷史檔案中找到建築物之興建與修繕記錄，成為較容易書寫的校史題材。

但影響校園建築配置與建築風格形貌的運作機制為何，在絕大多數的大學中，應該皆有一套校園規劃運作機制，來決定各個建築計劃，國立成功大學（成大）亦不例外。只是校園規劃運作機制亦是經過演變，才逐漸變成今日之樣貌。其演變歷程，相對較少被觸及。以成大來說，根據現行〈國立成功大學永續校園規劃及運用委員會設置辦法〉，目前的運作機制似乎奠定於1996年，因現行設置辦法第一次通過於1996年。

不過經文獻回顧後，可知成大的校園規劃運作機制建立時間更早於1996年。本文將透過歷史檔案回顧，耙梳這段校園規劃機制之發展歷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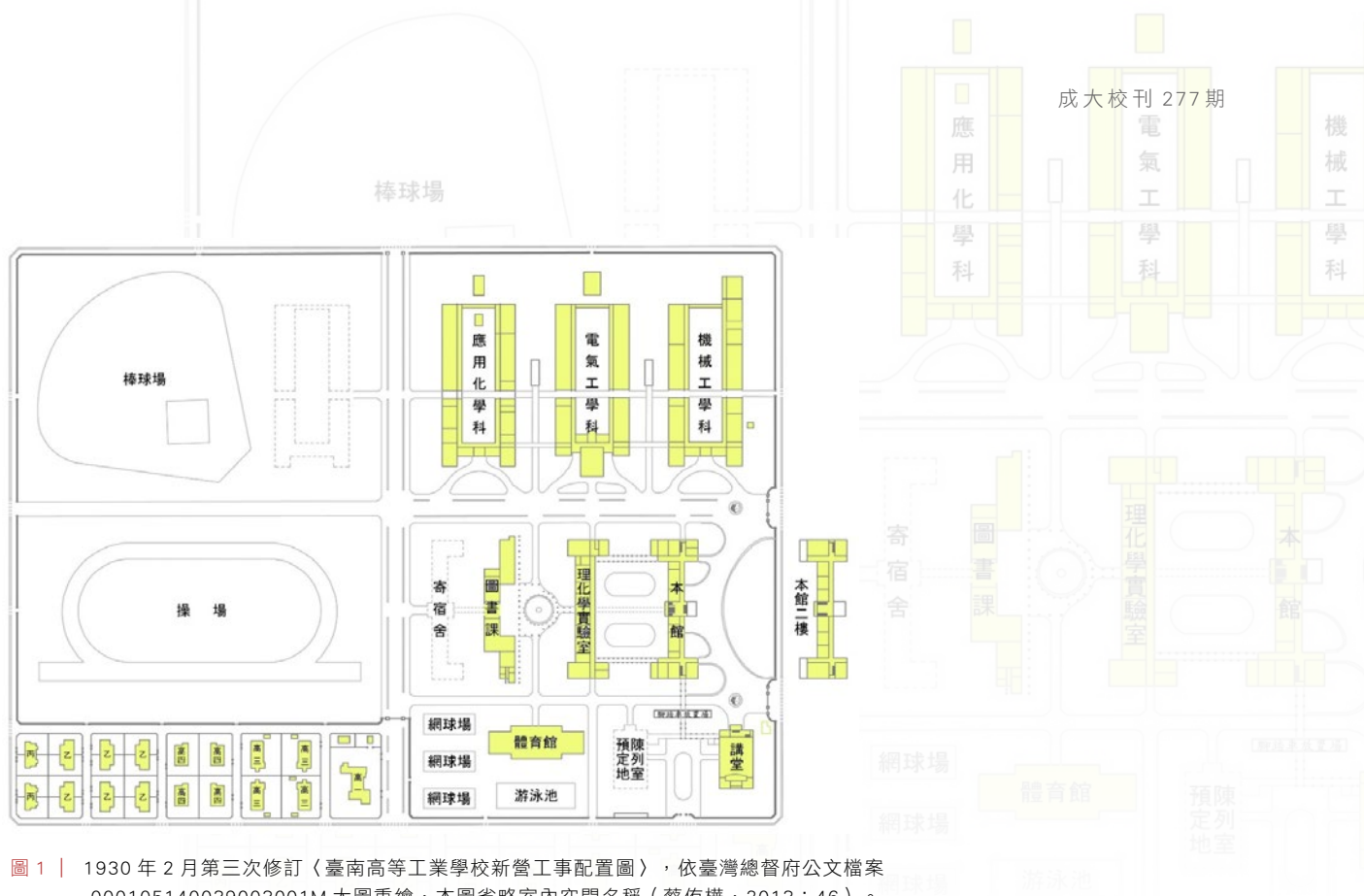


圖 1 | 1930 年 2 月第三次修訂〈臺南高等工業學校新營工事配置圖〉，依臺灣總督府公文檔案 000105140039003001M 大圖重繪，本圖省略室內空間名稱（蔡侑樺，2013：46）。

一、早期的校園規劃（1930-1980 年）

成大前身臺灣總督府臺南高等工業學校於1931年開校，但建校相關規劃，勢必早於開校時間。在臺灣總督府公文檔案中，即可見到一張1930年完成的校區規劃圖。後續之校舍建築，大致就在該規劃圖的架構下陸續興建，唯建築物的樣貌仍會依實際需求進行調整。

目前所知，日治時期的校園規劃與建設基本上均由臺灣總督府營繕課主導。但根據蔡侑樺（2013：42-50）推測，總督府營繕課必然會參考臺南高等工業學校教師的意見進行規劃設計或修正，因後來完成的各科科館建築樣貌，顯然與圖1所見之1930年2月完成的規劃圖有一定差異。最初被聘任的機械工學科、電氣工學科、應用化學科三位科長，1930年曾被派遣至國外進行考察，至1931年1月才返國。

戰後，成大前身於1946年改制為臺灣省立工學院，並於1956年改制為臺灣省立成功大學。1950年取得今勝利及東寧校區之多數土地，同年因韓戰爆發，在美國的教育援助計畫下，使成大獲得美援經費援

助，以及與美國普渡大學合作之機會。由於東寧校區距離原有校區（今成功校區）較遠，且一時之間仍有佃耕農問題而無法使用校地，美援時期的建設發展校地，便以今勝利校區為主。

目前尚無法掌握當時的校園規劃運作機制為何？不過根據美國普渡大學留存的文獻，可知普渡大學顧問宋乃聖（P. E. Soneson）於1957年9月抵達成大之後，經常與建築工程學系及土木工程學系的建築師與工程師碰面，商討校園規劃問題，並向成大提出「應定出長期的發展規劃，尤其是文理學院（今成大成功校區中心區）及南部校區（今成大勝利校區）之規劃。」之建議。¹從中可知，當時成大建築工程等相關科系教師，顯然已被賦予校園規劃任務。

1 Shreve & Freel, 《The Cooperative Project between Purdue University and Cheng Kung University To Aid Engineering Education on Taiwan Comprehensive Report for years 1952-1959》（West Lafayette: Purdue University, 1959），頁135。

不過一直到1980年之前，校園規劃被討論的議題或範疇可能較為有限，而且可能為校長交辦之任務型工作。如1966年成大取得今光復校區當時，羅雲平校長曾在1月的校務會議及7月行政會議中留下兩條與校園規劃有關之記錄：

「擴充校地實現後，全盤調整教學及行政區域，並新闢綜合運動場。諸位先生熱心教學，使學生品德及課業均能普遍進步，校務獲匡助之處亦多，雲平深為感佩，……（1966年1月校務會議校長報告）。」²

「最近擬邀集本校各單位主管及有關人員進入光復營區查看該營區建築物配置情形，俾作未來調整校區時參考。（1966年7月行政會議校長結論）。」³

根據上述文獻，尚看不出成大校內有一個相對常態性的組織，協助校長處理校園規劃問題。

但至遲到1980年，成大校內已有一個「校園規劃小組」之任務型組織，協助校長、總務長監管校園空間發展。依當年10月行政會議上總務長報告：

「各單位環境整修改變時應先與校區規劃小組聯繫，以免影響全校整體環境。」⁴

又根據成大建築學系兩度擔任系主任（1972.8-1974.1，1982.8-1984.7）的吳讓治教授2020年口述，他自倪超校長（1971-1978）時期，已開始參與校園規劃，並在1980年代夏漢民校長（1980-1988）任內接下醫學院與附設醫院之規劃工作。常態化且具組織性之校園規劃運作單位，應在1980年以前已出現雛型。

二、校園規劃及運用委員會的出現（1981-2004年）

成大「校園規劃運用委員會」這個名稱及組織，正式出現在1987年6月的行政會議上，⁵並於該次會議通過組織章程，使「校園規劃運用委員會」附屬於行政會議之下，但在行政會議通過組織章程之前，相關規劃運作在1980年代亦已展開。

當時成大除如火如荼的進行醫學院與附設醫院之規劃工作之外，1983年又獲得今敬業校區與自強校區之多數土地。除此之外，因1977年完成後火車站，並於其後完成今大學路西段開闢，校區與周邊之交通關係，有了結構性的改變。為處理校區間的連接問題，以及校區與周遭環境的關係，在1984年8月召開的行政會議上，已可見到「校區規劃委員會」一名詞，其中一項功能，為「規劃全校美化工程」。⁶

2 〈第二四五次行政會議記錄〉，《臺灣省立成功大學校刊》，第123期，1966年2月，第二版。

3 〈第二五一次行政會議記錄〉，《臺灣省立成功大學校刊》，第126期，1966年7月，第六版。

4 〈國立成功大學第七十八次行政會議記錄〉，《國立成功大學行政會議記錄》，第78-113次，1990年9月，頁4。

5 〈國立成功大學第一〇一次行政會議記錄〉，《國立成功大學行政會議記錄》，第78-113次，1990年9月，頁242。

6 〈國立成功大學第八十九次行政會議記錄〉，《國立成功大學行政會議記錄》，第78-113次，1990年9月，頁102。

表1：1985年行政會議記錄所見與校區規劃委員會有關工作事項

時間	議案及決議
6月	因應大學路西段開闢、大學紀念校門拆遷問題，總務處提案決議：遷移地址.....應請教專家意見，提出進一步研究意見後，提下次會議討論決定。 ⁷
8月	關於大學紀念校門拆遷問題，總務處提案決議：「請校區規劃委員會及翁所長金山與有關單位溝通協調，研判其可行性。」 ⁸
11月	校區規劃委員會進行本校校區發展規劃報告。 ⁹

- 7 〈國立成功大學第九十二次行政會議記錄〉，《國立成功大學行政會議記錄》，第78-113次，1990年9月，頁142-143。
- 8 〈國立成功大學第九十三次行政會議記錄〉，《國立成功大學行政會議記錄》，第78-113次，1990年9月，頁147-148。
- 9 〈國立成功大學第九十四次行政會議記錄〉，《國立成功大學行政會議記錄》，第78-113次，1990年9月，頁152-153。
- 10 〈七十五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議記錄〉，《國立成功大學校刊》，第133、134期，1987年，頁17、18。

隔年的行政會議相關記錄，可見到「校區規劃委員會」更具體的運作內容，整理如表1所示。從中可見，此時期主要負責校園規劃者為建築學系翁金山教授，自1984年8月起，翁金山開始接任建築學系主任一職，直到1990年7月止。由翁金山所參與的校園規劃工作，包括規劃尺度相對較小的之今登錄歷史建築「原成功大學校門」的拆遷檢討，也包含尺度較大的校區發展規劃。今光復校區臨大學路西段之整體樣貌，即奠定在此時期的規劃。

「校區規劃委員會」在1987年進一步被法制化，先是在當年的校務會議上，通過在行政會議下設立「校區規劃委員會」。當時提出的理由，主欲落實《大學法》中教授治校精神，俾使讓更多的教授願意參與校務工作。¹⁰1987年4月召開的行政會議中，已提出「校區規劃委員會」組織章程，但6月最後通過的名稱，被改為「校園規劃運用委員會」，其任務，包含以下6點：

- 1.校園內校舍建築物之配置位置、樣式、樓層、色調等之規劃。
- 2.校區內道路系統規劃（包括停車空間）。
- 3.校區內水電系統規劃（包括變電站、大型蓄水設備等）。
- 4.汙水處理與下水道系統規劃。
- 5.校園發展長期規劃（包括校區間道路之地下化）。
- 6.其他有關校園環境、景觀規劃事項。¹¹

同章程中，也提及委員會之下可視工作需要另設專案小組，進行專案研究。這個專案小組，在1995年9月「校園規劃工作小組」的第一次會議記錄中，已被稱為工作小組。不過該次會議的討論事項包括由總務長提出的工作小組編制表，並議定之後每兩周

召開一次工作會議，同時討論希望聘請專任助理，協助工作小組各項工作。從中顯示工作小組運作，1995年時應在起步階段。又根據相關會議記錄，可得知1993-1996年期間擔任成大建築學系系主任的徐明福教授，在1995年的工作小組中已扮演規劃政策研議之重要角色。¹²

為讓整個規劃運作更制度化，於1996年10月完成〈校園規劃及運用委員會設置辦法〉制定，並於1997年1月的行政會議上追認通過該設置辦法。依此設置辦法，正式將專案小組名稱改為工作小組，為校園規劃及運用委員會之下得設置之附屬單位。而校園規劃及運用委員會的職責，基本上繼承1987年訂定之6點任務，但將第5點「校園發展長期規劃」略加修正成為「協助審議校園發展計畫」，並挪移至第1點，從而強調該上位規劃任務在校園規劃及運用委員會中之重要性。¹³

三、現行校園規劃及運用委員會之運作機制（2005年-）

1996年制定的〈校園規劃及運用委員會設置辦法〉，到2005年又有較大的變動。現行法規雖名為〈永續校園規劃及運用委員會設置辦法〉，最近一次修訂在2021年。不過其架構基本上就奠定於2005

年奠定的法規基礎上，只是在2013年將「永續」二字納入校園規劃命題。

2005年版本與1996年版本的最大差異，乃將原本委員會的第1點任務「協助審議校園發展計畫」改寫為「審定各校區整體發展計畫與校園規劃設計準則」，可隨之設置專案小組研擬方案。一方面也將原委員會其他任務，整合為「協助審議各項對校園整體發展與景觀有影響之軟硬體建設案」，應設置工作小組研議之。同時在法規中明訂工作小組專長，包含（1）土地使用、（2）景觀與生態綠化、歷史與古蹟、（3）環保與環工、交通、機電、資訊、（4）經營管理與制度、行政管理、（5）建築營建（計畫、設計、施工）、建築結構、土木與大地。因2013年將「永續」二字納入校園規劃命題，同年修訂的法規中，再增加一項工作小組成員專長，為其他與推動永續校園相關議題。¹⁴

2005年修改法規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辦理校園規劃之上位計畫，即欲制定控制各校區發展的主要計畫。因工作事項繁雜且盤大，需調查的項目，小至各校區車輛運作、校園現有建築形式、空間權屬等，大至校園生態環境系統等等。因此將這種臨時性的「專案小組」組織，再次納入法規。自2003年起接任成大規劃與設計學院院長的徐明福教授於成大校園規劃運作中，持續扮演重要腳色，由他所主持的「專案小組」，累計自2005年起至2015年止，共完成以下具體工作：

1.2005-2007年，校本部校園規劃第一階段，基礎資料蒐集

2.2007-2009年，校本部校園規劃第二階段，提出主要計畫

11 〈本校校園規劃運用委員會組織規程〉，《國立成功大學校刊》，第133、134期，1987年，頁12、15。

12 〈國立成功大學校園規劃工作小組第一次會議記錄〉、〈國立成功大學校園規劃工作小組第二次會議記錄〉，1995年9月。

13 〈國立成功大學第一三一次行政會議記錄〉，《國立成功大學校刊》，第181期，1997年5月，頁80-81。

14 〈國立成功大學校園規劃及運用委員會設置辦法〉，《國立成功大學行政會議紀錄》，第150-159次，2008年，頁35。

3.2012年，校本部校園規劃第三階段，研議校園規劃總目標，局部修正主要計畫。

4.2013年，安南、斗六校區規劃

5.2015年，校本部校園規劃，老建築修繕準則、植物資源保育推動方案、校本部交通運輸系統檢討改善

其中經歷2005-2009年期間完成的調查規劃工作，至今仍影響目前成大的校園發展，列舉如下：

1.制定校園規劃目標

(1)綠色與生態的永續校園

(2)節能、少廢、再生的環保校園

(3)演進與記憶並存的文化校園

(4)崩解與重塑的動態都市校園

2.提出生活環境博物館的概念，將全校文化資產、生態環境視為生活環境博物館的一部分。

3.提出各學院、系、所空間分配標準，藉以管控學校有限的土地與建築資源，同時可在一定的標準下，分配調度學校的土地與建築資源。

4.提出校園與都市共生之理想，喊出高牆倒下來，建築向後轉，無車校園之想像，且逐步落實於新建建築之規劃設計中，包含資訊工程學系、資源工程學系、材料系、生科學院、理學院等新建工程，均依循此理想而建造。

5.建立開放空間計畫，包括依循生態綠網概念，定義並強化校園綠軸線。

6.劃定全校性公共空間之中軸線，南自勝利校區之蘇雪林故居，穿越延伸至成功校區博物館直到最北端的總圖書館。

除了專案小組作出的相關貢獻之外，工作小組歷年來也協助審議控制校園景觀，包括在2016年研擬校園列管老建築名單，獲得永續校園規劃及運用委員會通過，藉以呼應文化校園之規劃目標，以及生活環境博物館之校園規劃概念。

四、結語

藉由本文爬梳回顧成大歷年校園規劃運作機制，可查知成大建築學系教師，基於其學術專業，長時間以來一直協助成大辦理校園規劃工作。

而早期的校園規劃機制應該都是任務型編制，因應建築任務需求，由校長指派專業教師組織其他教師共同運作。1987年起始在行政會議下設立校園規劃及運用委員會，將運作機制法制化。爾後隨著各種規劃任務需求，以及社會發展趨勢對於文化資產保存及永續議題的重視，使校園規劃及運用委員會在1996年成為獨立的幕僚組織，再經過2005年因應校園規劃中上位計劃或總計劃的需求，發展成為今日成功大學永續校園規劃及運用委員會之運作機制。

參考資料：

蔡侑樺，徐明福，《1930年至1945年間臺灣總督府臺南高等工業學校的校園建築》，臺南市：成功大學校友聯絡中心，2013。

Shreve & Freel，《The Cooperative Project between Purdue University and Cheng Kung University To Aid Engineering Education on Taiwan Comprehensive Report for years 1952-1959》，West Lafayette：Purdue University，1959。

成大校刊，行政會議、校務會議記錄等。

校史數位化及其應用討論

論文發表人：成大博物館 李柏霖

本校博物館自 2007 年開展以來，至今已屆滿15年，期間我們透過籌辦各項校史展示，持續積累校史資料，如：「美援時期普渡大學、成功大學合作計畫特展（2009年）」、「成功的基礎：成大的臺南高等工業學校時期（2010年）」、「航空先驅（王助教授）（2010年）」、「成功大學校園環境變遷歷程（2012年）」、「臺灣工程教育史系列展（2016-2022年）」等與校史有關的展覽。

而這些校史資料因展示而被數位化之後，絕大多數被存放在博物館的公用或研究員的個人硬碟之中，並以展示主題作歸檔存置。除公文書檔案屬本校文書組典藏，其餘文物及史料大多皆回歸到個人或是原保管單位。致使這些辛苦蒐集及詮釋的史料，缺乏一整合性可供搜尋、續寫的可能，亦導致「開放性」及「永續性」都相當不足。

為擴大參與本校校史書寫，同時讓本館蒐研成果，得以在館內、外被分享、傳遞，因此提出「校史資料平臺建置與運用計畫」，促使更多人可接觸本校校史資料，並以不同視角、觀點來參與校史研究，從而加深本校校史建構的深度與廣度。

未來使用者能透過此介面建置，鍵入關鍵字或主題進行檢索，獲得一定數量之校史資料。並將內容依資料性質，作不同程度之開放，如限制館內、校內人員調閱，或完全開放等。且利用此資料庫，建置數位展示平臺，除計畫將既已展示過的本館企畫展覽再次以數位化方式於平臺上展示之外，也預期透過此資料庫平臺，定期向大眾呈現校史資料蒐集、書寫成果。



該計畫於2020年下旬在校方的支持下，由本館開始著手規劃「校史資料平臺建置與運用計畫」的籌備工作，在館內研究及行政人員協助下，並參考各大館舍及文典系統案例及欄位設計，於2021年底完成初步建置工作且公開上線。

接著就讓我來整理並簡單介紹一下，博物館這個資料庫的基本架構與幾個重點。

基本架構與重點

【年代的分野】

談到校史首先一定會提到的，便是我們到底是如何界定各個時期。本資料庫主要是以校名與西元年份進行簡易的分段，除了直覺易懂以外，更可做為本校對應不同時期與國家政策、時代潮流改變時，最直接的依據。

【物件的類型】

本資料庫做為提供一般大眾皆能使用之線上瀏覽平臺，內容雖多以書籍掃描影像為主，但其中仍不乏具有實體資訊之本館藏品。而這類物件的呈現也應是需與掃描資料做出區隔的。

所以資料類型跟主題的分類，大概有以下幾種組合，主要是按照物件本身樣態進行初步分類，後再接著去串接主題內容。但在影像的部份，由於現在民眾已不太有機會，自行至相館沖洗照片，故檔案基本上都是TIFF、JPG、PNG、MP4等電腦檔案格式儲存，故將「影像」作為一種類型進行分類。

這樣子的分類方式，除了可使資料庫所登錄的類型與主題，透過數據量化的方式顯示於系統圖表，更有助於使用者在操作檢索之前，便可對資料庫中的內容有初步的瞭解。

【素材蒐集】

除透過策展工作外，本館也經常安排文資相關講座，密切與校內各單位保有一定的聯繫機制，在其有系所文物有保存疑問時，也積極給予建議與諮詢協助。近年更舉辦各項實體活動(校園尋寶趣)，並結合社群媒體進行廣告，以擴大資料蒐集的渠道與面向。

【授權工作】

此次規劃的資料庫，是為蒐羅全校各單位與校史有關之資料，與大家熟知單純由博物館進行典藏，同時由博物館進行授權的狀況不盡相同，以下就以此兩種資料類型，進行說明：

1.登載於校史資料庫，且同時為本館典藏品：

授權工作由本館主責，於詳細資訊欄位以超連結方式引導至本館授權頁面。

2.登載於校史資料庫，但非本館典藏：授權工作不由本館主責，會於詳細資訊欄位以超連結方式引導至管理單位，請自行與該單位進行聯繫。

除了上述有關資料庫的定位與重點概念的說明外，其中最吃力不討好的便是前置的資料整理與建置作

業。除了要將所收集到的紙本資料，利用高階掃描(300dpi以上)轉存為電子檔，再經人力檢視每張圖檔是否都有清晰、判讀內文、提取關鍵字及內容確認後，才會上傳至網路空間開放閱覽。

雖說在本文之中，只是短短的幾段文字敘述而已，但實際執行起來確實是十分耗費時間與心力的。往往一本書籍檔案的掃描到關鍵字的提取，可能就要花費數個禮拜進行，更別提若是檔案因為一時疏忽，影響成像造成資訊佚失或是不清楚，則又得重頭再來過了。

為更貼近現代人對行動裝置的使用習慣，於呈現上也必須符合以下幾點網頁操作上的基本訴求：

- 1.網站設計以應該以響應式網頁設計（Responsive web design）可以依不同裝置之瀏覽器調整頁面配置。
- 2.查詢功能應提供模糊搜尋與精確查詢等檢索功能。
- 3.主題分類(如：畢業紀念冊、校園建築等)，可供使用者方便選取，以利節省搜尋之時間。
- 4.查詢結果提供使用者進一步連結顯示詳細資料之功能，並提供詳細資料的永久連結。
- 5.提供搜尋結果每頁顯示筆數之設定(10、20、50、100等筆數)，以及列表重新排序之功能，可選擇依「人名」、「地名」、等欄位重新排序。
6. 搜尋結果列表可顯示簡目與詳目兩種顯示層面。
7. 檢索關鍵字於詳目頁以黃底標示呈現。

未來發展與使用可能

本案雖於2021年底至2022年初便已完成階段性任務，但無論於內容或整體架構部分，尚有許多不足和待補充的部分，還有賴於後續逐一修正即調整。

而在執行該案及實測一年左右的時間，目前也整理了以下幾點有關未來可能發展的方向與面臨到的問題，供大家參考：

【未來擴充】

- 1.協作共筆：本案原先亦有規劃建立回饋機制，透過網路使用者進行即時編輯與勘誤後，經館內校友、研究員或相關背景之專家學者事實查核通過後，以類似維基百科共筆協作的方式，於頁面上以追蹤修訂的方式進行呈現，現擴大研究群體，充實本校校史寫作。
- 2.GIS管理：將校史資料內容藉由不同時期的校區規劃進行標註，並以校區地圖的方式，支援使用者進行檢索。
- 3.100年校史：為了階段性的地方史、校史呈現，提供穩定累計的使用素材。

【面臨困難】

- 1.肖像權：近年個資意識的提升，可公開資料的內容有限，恐造成內容單一，難有共鳴。
- 2.跨單位合作：校史資料不僅限於館內蒐藏，是需要與全校單位共同建置。然而各單位重視程度不一，在談論授權與資料公開事宜皆具有一定難度。
- 3.時程與人力：史料的整理建檔及系統的調整皆費時費力，亟仰賴固定的人力及經費支援。

校史的幻想衣櫃

論文發表人：成大地科所／王立儂



初來到這古色古香之地的最高學府，我原無任何一丁點對校園歷史的熱情或者好奇，頂多是經過博物館時有那一點點讚嘆而已。後來我與成大朝夕相處，校園的種種風光和風氣逐漸顛覆我那膚淺的刻板印象，這令我無意間燃起一抹新穎的熱情。在意識到這樣的轉變之後，我關注起博物館的社群帳號，特別是各式各樣的校史相關活動，也領取了九十週年出版的校史叢書，打算將生活的一小部分，分享給這全新的興趣。在那之後，我又一次來到博物館校史常設展，若槻道隆的大禮服直立在櫥窗裡，被柔和典雅的黃色燈光照耀得莊嚴又高貴，我望著它，決定開啟一段追溯之旅，就為了窺探這學校年輕時的樣子。

每間學校都有各種版本的故事，這些故事散落各處，有的展示在官網乏人問津的角落，有的流傳在老校友的口耳之間，有的集結成冊，像一本不由當事人書寫的，很長很長的回憶錄，靜靜安放在校史室裡。我常常在經過博物館的時候把目光偏到門口那一側，想著要是學校有個衣櫃，且從沒有人丟棄裡頭任何一個時代的衣衫，或許那些精心縫紉過的布料，也串連著整個回憶錄吧。一如整理舊衣服的自己，站在衣櫃前，幾歲穿了這條裙子去了哪裡，什麼時候買了那件襯衫又做了些什麼，往事歷歷在目，好的壞的，悲的喜的，都埋藏在這裡。

回到一九三一年初，若槻道隆就在臺灣總督府臺南高等工業學校最重要的位置上，他制定西式外套和麥桿帽作為制服，彼時的博物館本館建築(在當時另有用途，今二樓的校史展區即當時的校長辦公室)尚在興建中，一如尚未成熟、步上軌道的學校。在這段時期的服飾圖當中，我試圖將校史出版品裡頭形容的制服樣式，包括外套、襯衫、褲裝以及麥桿帽，整體繪於一人身上，並著以彩色，背景則是當時為數不多的建築物，即今日博物館本館。在這

張圖當中，唯有服裝的確切色彩因為黑白照片的緣故而有待商榷。望將來重新繪製時能夠更精確地著色。

西式制服在日治時期的臺灣雖是相當獨特的設計，可惜卻在創校的三年後因學生反對，而被更改回常見的日式制服。該款式在諸多該時代為背景의 影視作品中相當常見，繪製成圖恐怕沒有其他亮點，加上校園的草創時期尚有許多珍貴物件能夠展示，因此我向「大多數學校的標配」開始思考。懷抱教育熱情的辦學之人，送給他們創立的學校的第一份禮物，大多數不外乎是校名、校歌、校訓、校徽、校旗。其中唯有校徽和校旗較容易作圖展示，而校徽太小，校旗較適合作為手持物件，且校旗在制服更改前就已公佈，我便將它作為圖中人物拿著的東西。旗上的圖案是這學校最早的印記，高工二字印在鳳凰花圖型中央，想當年還在日人輔佐之下，還是單純為工業化而生的靈魂，如今都已成為最初的印象。

日治時期結束後，國民政府遷臺，彼時臺南高工不再是臺南高工，而是臺灣省立工學院。由於女學生的加入，校園裡多出一抹柔美的風情，在當時，女孩子幾乎都是收腰的連身裙，或是著襯衫，再扎進高腰七分裙裡。由於近代有時流行復古風，偶爾可能還有女同學也這麼穿搭。而髮型的時代感就異常鮮明了，當時鮮少見到直髮，都是燙捲並露出額頭

的短髮。男孩子的襯衫和西裝褲或是牛仔褲總是搭上皮帶，不過這也許不是和現代差異最大的。當時的男子髮型有油頭，也就是三七分、四六分那一類，我想現今不容易再見到同學這樣打理頭髮了。在我的第三張圖畫中，裡頭的一男一女就如上述那樣裝扮，並且坐在水池邊。

再後來，臺灣本土士紳們給了省立工學院一個新稱號：成功大學。時代飛快地繼續前進，彼時西裝外套也流行起來。成大也有自己的大學服，那是卡其色的西裝外套，胸口繡有「成大」二字。這或許學校的新象徵，改名換姓然後步入下個時代，胸口繡著的名字不僅是擁有大學頭銜後的浪漫，還是一種和臺南本土的連結，我不曉得有多少人知道成功大學本來差點被叫做延平大學，但那的確和這學校從開始便紮根在府城有關係。那時代除了制服，還有知名的刊物《西格瑪》、優美的成功湖及小橋。我經常散步到光復校區（尤其是實驗做累時），那裡的風光讓我暫時得到舒緩並且為下一輪的忙碌儲存精神能量。我一路從雲平大樓走過，然後右轉直至工業設計系館和歷史系館之間，穿過榕樹的草坪再駐足成功湖畔。我總是幻想，在那民風純樸幾十年前，大概會有一個學生，她穿著成大制服，卡其色的西裝外套，然後像我這樣，這樣在成功湖畔思考人生，或是放空，或是想些稀奇古怪的東西，手裡也許還拿著一本《西格瑪》。畢竟根據我粗淺的理解，「西格瑪社」似乎是一個能夠給予同學們思

考各式問題的社團，那她這樣做也不奇怪。在繪製這第四張圖時，成功湖和制服是必須，至於《西格瑪》書刊的外觀，我有幸觀摩「校園生活展」，因此得知該刊物的確切模樣。如此一來，此圖於這樣的概念之下完成。

最後，我像時空旅行結束一樣回到自己所處的時代，仔細在腦海裡整頓這一年多來在校園裡見到的衣著，我希望它們具有時代特色，同時又和成大有關，思來想去還是大學T最適合，當然還包括外套、夾克等等。不論是尚未就讀而先行參觀校園時買下的，還是錄取後順手購入的，或是畢業之際入手做紀念的，似乎都是現今的一種潮流。不過可惜的是，由於能力不足，我無法得知這種近代常見的大學T究竟從何年代開始流行，這是創作最後一張圖時留下的待解決疑問。

經過這一輪回顧，我只是從陳舊的衣櫃裡挑出幾件衣服，去幻想成大很久以前的樣子，去思考時代給學校帶來了什麼，而學校又給這片土地帶來了什麼，以致今日的成大是我們所見到的這個樣子。我並不喜歡從補習班老師或其他極端升學主義者的口中聽到成大這兩個字，更不願透過他們油腔滑調的描述來認識我所就讀的學校，我深信唯有相處、傾聽和時間的作用之下，成大的輪廓方能逐漸明朗，不論是在空間的變化或服儀變遷或其他方面。蒐集老照片及史料的時候，我始終以宏觀的視角來

看待眼前這九十年的歷史，而非以一個人、一棟建築物或一個科系為主體。眼前這個「個體」經歷了什麼？如何反應在服裝上？這又在歷史當中代表什麼？和我之間又有什麼關係或他間接給了我什麼影響？打個簡單的比方，我想知道一個為工業化而生的靈魂曾經領受過怎樣的時代洗禮，又是如何看待並且平衡人文藝術在他生命裡的份量，好讓我在校園裡的一年多能夠受到良好的理工實驗訓練，又能夠有機會去閱讀那些古色古香的過往？與此同時，我亦不認為成大在今日能夠發展成非理工的綜合型大學，是一件相當必然且非常容易的事，儘管仍有各種學科不平衡之疑慮，我仍認為這是無數學者以及教育家還有學生們，在一番取捨及努力進步之後的成果。也許不是全部，但有一部分與此關連的歷史可能也反應到了某一套過去的服裝之上，還等待我去發掘，去重新繪製、書寫，然後在寂靜之處獨自思索它們的意義。

關於對校史的態度，我大多時候是感性的，而那情感是熱愛卻帶有一丁點複雜。儘管不能書寫出足夠嚴謹的文章，我仍感謝這校園裡有一群人也同樣在乎校史的保存，並且願意讓我將這一系列粗淺的想法發表到研討會，甚至是校刊上。我沒有什麼太大的願望好讓這篇文章有個完美結局，唯望那些心繫成大的、關懷校史的、關心校園發展的人們，能夠繼續在這條道路上前行，好讓那些承載高等教育希望的大學，也穩穩地在時代中前進。

學生運動與社會參與

論文發表人：東華大學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孫嘉穗

成大自由的校風與豐富的社團，提供學生在課堂外探究與嘗試生命的多元可能途徑，由西格瑪社參與的學生運動與社會實踐，展現校史中獨特的視角，並述說大學生如何藉由學生運動與社會參與回應當時社會議題。大學的社會實踐在成大發展的不同階段各有不同風貌，也回應不同時期社會脈絡下的關切。校園角落的民主展現從校園民主牆、專題書展與獨立音樂的邀演，皆可展現社團扣連社會議題與回應社會變貌的嘗試。走出校園的學生在社會場域見證社會實貌，以西格瑪社在將軍溪參與的環保運動為例，因為工廠廢水的排放，將軍溪汙染嚴重，已變色的河道上漂浮著死去的豬隻，稻田裡老人辛苦插秧，另一端卻因水源汙染而使植物萎敗著，靠海維生的漁民因為海洋的污染鋌而走險從事不法活動。而學生的參與召引媒體的關注，也讓學生連結記者與社運團體，並學習在地方的公共場域以台語發聲進行社會倡議。而成大在男女比例嚴重失衡下的性別議題與社會參與中的性別覺醒，也在由大學走向社會實踐的過程中往返辯證。在校內的讀書會與校外的社會實踐中，學生運動與社會參與開展了成大學生的視野，也點滴匯聚成高校友與社會的多元連結，並蘊育學生養成具批判性與人文底蘊的獨立精神，也彰顯成大社會參與的印記。



學生的社會參與及校史

那麼，探究成大自由校風衍生下的豐富社團活動有助於理解什麼樣的成大校史呢？以成大的西格瑪社為例，不少西格瑪社的社員戲稱自己在成大讀的是西格瑪系，大學生活中，的確有不少成大人相較於在系所的時光，花了更多時間在社團。而多元異質的社團活動，如同系所，開展了成大人學生生活的多元面向，也在性質各異的社團活動中，與興趣相近的朋友互相培力與涵養各項能力，校史中豐沛的社團發展歷程展現系所外的成大學生生活之多元樣態，也以成大為中心，透過不同形式的社團向外擴展連構於寬廣的社會情境與脈絡，展現成大學生回應各階段歷史情境的社會參與，並顯現學生課堂外的探究與嘗試生命多元的可能途徑、西格瑪社的案例不僅呈顯校史中獨特的視角，也具體展現成大學生回應當時社會議題，參與學生運動與投入社會實踐的歷程。

大學的社會實踐與風貌

成大的校園民主牆曾是成大民主地景的重要象徵，物件與記憶在歷史流轉中幾經更迭，校史如能在回顧歷史物件的存在與消逝，探究物件的生成與消失，應能在不同時期的校史中梳理民主地景回應社會情境的歷史切面與風貌。

西格瑪社的社團活動活動除了不時在校園民主牆張貼主張與倡議，也曾舉辦專題書展與邀請獨立音樂的展演，社團以創意的社會參與形式，展現扣連社會議題與顯現回應社會變貌的嘗試。

在社會場域見證社會實貌

西格瑪社曾參與投入環保運動，學生走出校園在社會場域體認社會實貌是珍貴的經驗，並顯現在各種勢力折衝間仍試圖實踐理想的過程。環保運動中見

證的黑色將軍溪在昔時有著如下的景況：

黑沉沉的汙水凝滯著，一個八十七歲的老婦插著秧，手腳因毒水的侵蝕而疼癢難當，而已播的秧卻逐漸萎敗著。

橋墩下，敞開的袋口露出已死的豬隻，汙濁的溪水孕育不出腐蝕性微生物，遂任乾癟的豬屍錯落散流於溪流中。

工業區的溝渠內，刺鼻的氣味雜合於五色混流的廢水川流而去，清流是一遙不可及的想望。

由於河川的汙染導致年輕人外流，未受教育且無其他謀生能力的年老者只有面對失業的困境。

將軍、北門沿海養殖草蝦、文蛤、牡蠣全面遭受將軍溪水污染，近乎消滅，漁民禁不起損失的打擊而當場大哭。

河川汙染了，漁民怎麼辦？汙染河川與海洋中的漁民悲歌，是失業在地人鋌而走險的人生故事。荒川惡水下的漁民四處陳情，期待透過正常管道解決問題，但有關單位未能積極處理，使問題解決之日遙遙無期，更從而暴露出不平等的社會關係。

昔時親眼目睹將軍溪的汙染情形，溯溪勘查工業區和養豬場兩大污染源之後，環保不再只是書刊雜誌上的名詞，然而學生介入環保以及其他社會運動，卻也有著一定的侷限性和若干值得探討的問題。昔時的反省性思考有著如下的反思：由於學生對社會涉入的實際經驗有限，在評析錯縱複雜的社會問題時，其判斷能力有時仍有待加強，而因生活層面較為單純，觀察外界事物的角度也常跳脫不出學院的範疇，在長遠的策畫和擘劃決策性的決定時，更需要有學理上的基礎，調查方法學上的訓練和素養，

洞察社會現況的能力，這些都不是一蹴可幾，而要逐步的進行觀察能力上的訓練和參與社運經驗的積累。此外，一個社會問題嚴重到有人出來組織醞釀成運動時，必然會牽涉到集團和集團之間的利益衝突，甚至派系和派系間的紛爭，當一個學生懷抱著單純的理想介入時受到的衝擊是相當大的。一方體認到理想和現實的距離，一方面又要自我調適，以在權力競逐間尋求一個中介的立場，持續對社會付出關懷，不因此而感到挫敗而喪失對現實改進的動力。

學生的社會參與和媒體關注

然而，學生的社會參與仍有所貢獻，最明顯的是加強輿論上的聲勢，由於學生的參與常可引起各種傳播媒體的關注，擴大各階層人士對相關問題的重視，進而謀求解決之道。而參與社運為學生提供了深入觀察社會現象的機會，躍入時代的脈動裏直接體察社會實相，明瞭社會問題之所在及其影響，提升對社會現況之分析能力，而在參與的同時，也實踐了對現世關懷的理念。在西格瑪社參與社運的過程中，學生、環保記者與社運團體共同發聲與串聯，在利益團體間折衝，進行在地的培力與發聲。

參與社運的歷程也是學習溝通的歷程，學生在如廟埕的地方公共場域以台語發聲進行社會倡議，失語的弱勢者與尋索母語的學生在其中學習以對方懂得的話語溝通，也是社運經驗中促發各種學習互動，發生展現能動性的難得經驗。

社會參與中的性別處遇

儘管當時的成大學生在參與環保運動時頗受尊重，然而無論是校園內還是校園外，女性的性別處遇仍在許多情境下未受到應有的尊重。

男女比例嚴重失衡下的校園性別議題經常延伸到校外的社會運動場域，如同一起付出心力的社運參與過程，女性成員在社運場域會被在地居民要求去添

飯給所有男性參與者，受過大學洗禮批判各種社會現象的社團男性成員卻也理所當然漠視女性成員在此過程中遭逢不平的性別處遇。然則，這些社運的參與經歷，卻也可激發相關成員日後對性別議題的關切，以及促發後續對性別平權的努力。

如同社會參與中的女性性別處遇，校史中的女性身影呢？創校初期的成大以理工為強項，在經濟環境仍不富裕的年代，重男輕女的氛圍剝奪了許多女性受教育的機會，而當時許多在成大受教育的女學生，背後往往都有著相對開明的家庭與富裕的背景。她們原本是當時臺灣相對少數能夠受教育的女子與女科學家，然而在校史中經常留駐與書寫的多是男性的成就與事蹟，校史中的女性身影常被遺漏，成大校史中的性別失衡，仍有待尋索與探究。

校史再發現與反思

成大社團的衍生脈絡與歷史回顧，展現學生的社會參與及關懷，也顯現社運經驗如何開展成大學生的視野，匯聚成大校友與社會的多元連結，並蘊育學生具備觀察社會與批判視角的人文底蘊，以及彰顯成大學生在校史中社會參與的印記。

而成大學生參與社會運動與社會參與的校史爬梳，有助於理解民主路徑上的成大學生，如何在歷史中參與關懷社會，並學習在大學與社會實踐中往返辯證理論與社會實踐，並反身思考與激發生命路徑的社會關懷，並在不同的場域持續投入改變社會的努力，延續西格瑪社常運用的以有趣的方式進行嚴肅的社會思辨與行動。此外，期盼具備性別意識的校史書寫，能探索佚失於校史中精彩的女性身影，彰顯校史中豐富的性別樣貌。

(部分內容轉引自「新生代的自我追尋—臺灣學生運動文獻彙編」中書章〈黑色將軍溪--談學生與社會運動〉，1995，臺北市:前衛出版社。)

備註：筆者現為國立東華大學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教授。

野百合時代的西格瑪社員

校友座談會

主持人：王健文

與談人：

成大野百合時代的西格瑪社員\

林朝成、翁註重、陳信行、陳瑞麟、黃吉川、劉怡維

資料整理與撰文：成大歷史系\劉欣儒

轉變的世界與轉變的自己

個人生命上的Phase Transition是從高中畢業到進入大學、進入成人，那剛好我們這個年紀的人非常幸運的，遇到臺灣社會的Phase Transition，這兩個Phase Transition 剛好在同一個時間發生，這個時刻就讓我們去想到或是經歷很多很多的問題，也就在這個時代，我們用一種比較不成熟的方法經歷過。

—劉怡維 野百合西格瑪 成大物理系79級

1980年代中期，解嚴前後，臺灣的街頭因為黨外勢力的蓬勃發展逐漸沸騰，除了政治方面的運動，許多不同形式的抗議運動也隨之而起，使臺灣漸漸地從威權的戒嚴時代轉變成民主化的時代。就在這逐漸開放的氣氛中，空氣中瀰漫著一些不安而又興奮的情緒，不安，是對威權時代的存疑；興奮，是那些曾經被禁止的一切。而這些轉變的痕跡，就在正在經歷心靈與社會的轉變的野百合西格瑪，以及面對時代交替的西格瑪社員身上留下了印記，更在成大的校史中留下了鮮明的記號。



林朝成。

華山論劍

西格瑪的行動軌跡就在時代的轉換下出現世代分野，更因為世代間不同的行動方式，出現了好比華山論劍的兩代西格瑪交鋒。陳信行、翁昌黎、劉怡維三位野百合西格瑪與馬毅志、王鎮華等老西格瑪，在1987年7月於德簡書院的聚會中，因政治態度的差異，出現的激烈的辯論，最終不歡而散。

老西格瑪（早、中期）與野百合西格瑪突破現狀的方式不同，老西格瑪面對封閉的威權社會，透過對存在主義的辯論、老莊思想的理解，探索自己未知的事物；而生活在威權過渡到民主時代的野百合西格瑪，則是將有點抽象的知識轉換為社會實踐，想要透過行動翻過名為政治的牆，也算是被時代的騷動推上風口浪尖。

身為野百合西格瑪的劉怡維便回憶起當天的狀況，

當時的我們年輕氣盛，認為自己是正義的一方，認為他們（老西格瑪）都是資產階級、保守。衝突並

不表示正確或是不對，在不同時代之下的人會有不同的詮釋和解釋，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東西，並且也因為它複雜所以才更值得討論。

眾聲喧嘩的年代

那時候的氣氛已經，你在街上已經是成千上萬的人可以上街了，那為什麼我們在校園裡面還要躲躲藏藏。——陳信行 野百合西格瑪 成大造船系78級

1987年臺灣解嚴，為臺灣開起了眾聲喧嘩的年代，社會中出現了農民運動、環境運動與大學自治的呼聲，這些事件西格瑪都有參與並受到影響，尤其是學生在校園中的互動與響應模式。從前戒嚴時期的成大校園是非常沉悶的，但即使到了解嚴特務機關的監視也並未消停，時代的緊張感依舊存在，成大工業設計系79級的野百合西格瑪翁註重，就找到了一本情治機關幫他寫的日記。

野百合西格瑪，就在威權轉變為民主的時代下，開始了大學生活，雖然對他們而言，行動的代價雖然



黃吉川。



劉怡維。



王健文、黃吉川、林朝成、陳信行、陳瑞麟、陳瑞麟助理、劉怡維、翁註重。

沒有上個世代高，但仍會有一些壓力存在，即使如此這樣的時代仍抵擋不了即將破殼而出的西格瑪們。

運動游撃隊

早在解嚴之前，某些西格瑪就開始悄悄地在黃吉川的家中舉辦的地下讀書會，雖然現在已經忘記當時讀了些什麼，但只記得讀書會的氣氛很刺激，畢竟在戒嚴時期舉辦這樣的地下讀書會可是一件違法的事情。野百合西格瑪的行動，就在這刺激卻又似乎有點荒唐的活動中慢慢展開。

1987年3月，雖然政府尚未正式宣布解嚴，西格瑪的第一個公開抗議活動，聲援原住民的抗議活動「抗議東埔挖墳事件」便已經開始。西格瑪涉獵非常多不同的社會議題，不管是原住民、農民、環保、反污染等議題，都可以看到西格瑪的身影。劉怡維便

笑著說，西格瑪就像是游擊隊，每次在進行完運動後，不管接下來會如何，西格瑪並不會留下來進行整體的檢討，而是集體消失前往新化去看電影。

西格瑪就是如此有趣的一個團體，總是用一些好玩的事情做著嚴肅的事，因為沒有一個人願意被一個主題綁住，他們就在行動的過程中消耗了許許多多的問題。

反正大家都在搞，所以我們也來搞一攤！

除了在校外的公開活動，西格瑪也在成大的校園組織了多場抗議活動，在公開對外的抗議東埔挖墳事件後，西格瑪也將原住民議題帶進了成大校園。1987年4月，西格瑪與經緯社聯合在校內舉辦遊行，對《唐山過臺灣》電影中對原住民的汙衊表達抗議。這場抗議活動除了是西格瑪在校內的一場抗議活動外，更是當時成大唯一的示威行動。



活動結束後，為了不讓議題因校方的施壓而消失在校園中，西格瑪便在校方尚未對兩個社團進行處分時，隨即北上接洽原住民權益促進會，邀請民歌手胡德夫來到成大，在成功廳舉辦「另一種民歌」演唱會，在那個封閉的年代連續演唱了好幾首禁歌，雖然當天到場的觀眾並不多，但西格瑪仍持續用行動為原住民發聲。

除了原住民議題，1987至1990年的成大校園，校園中的本土性社團也漸漸的熱絡，校園中的議題逐漸多元。當我們問到西格瑪當時為什麼要做這些行動時，其中的來龍去脈已經難以回憶，回到最簡單的初衷，便是想要攪動一下當時的校園，反正大家都在搞，所以我們也要來搞一攤！就是這樣的少年心性，使西格瑪帶著不安份的心靈狀態，在校園中掀起了一絲又一絲的波瀾。

發行地下刊物

最終，有參與遊行及演唱會的西格瑪，被學校處以記過處分。但是在經過這次的事件後，西格瑪並未妥協於校方的施壓，反而決定要加大在校園中的力道，因此西格瑪與經緯社再度聯合，發行地下刊物《平等域》。在當時校園中，只要是對非特定人又或是宣傳用的出版品，都需要經過學校以及校園黨部的審查，發行地下刊物除了可以躲避校園的審查，更可以用這樣的行為為自己發聲。

要發行地下刊物，那要發給誰呢？劉怡維便分享了一個關於發放刊物的小故事。通常發放這些不能浮上檯面的刊物，會選擇在比較沒有人的地方進行，但是第一次發放刊物的西格瑪卻跑到了人聲鼎沸的宿舍，將刊物塞進宿舍的門縫中。沒有意外的，才剛在宿舍塞完刊物，馬上就有人衝出宿舍對西格瑪罵髒話，最終他們轉往早上沒有人的成大附工進行發放。

王健文。
翁註重。
呂昱（來賓）。



陳信行。



陳瑞麟。

在過去老西格瑪也出版過許多的刊物，而這些刊物多半與《草原》或是《西格瑪通訊》一樣，是具有文學性、詩意的小品集，但《平等域》卻是一本具有強烈的批判性及行動性的刊物，並用一種像是另立山頭的方式發行，野百合西格瑪似乎用了非西格瑪的另一種身分進入了社會運動之中。

為自己發聲，來片斯迪麥吧！

除了對社會議題進行倡議，西格瑪也要在這層層審查的校園中聲援自己。在校園中不只有出版品需要被審查，演講、影展、表演等各式活動，都需要校方的批准才能執行，而被學校列為重點人物的西格瑪，更是受到學校的重重阻撓。當校方再次的禁止西格瑪在戶外進行演講，卻讓火舞社在戶外空間表演時，「來片斯迪麥」的靜坐活動便油然而生，10月7日西格瑪戴上了畫有叉叉圖案的口罩，來到了校門口靜坐，他們以身示範、聲援自己的行動。

成大民主牆

1989年中國爆發安門事件，因為看不慣某些團體舉辦毫無反思、團康式的晚會來表達對天安門的支持，西格瑪開始在大學路兩側的紅磚牆上用貼海報的方式，設立成大民主牆，讓成大師生利用書寫為自己發聲。

海報屬於出版品，在校內張貼海報理應也需要經過校園的審查，但是為了聲援天安門事件，校園一時之間出現了许多未經審查的海報，而學校負責審查的課程組便開始撕毀學生們的海報。就是校方撕毀海報的動作，使西格瑪與校方產生了衝突，幸虧當天剛好有記者在場，讓校方決定低調處理，西格瑪也因此爭取到了成大民主牆。

到了1990年的野百合運動，雖然在當時的自由廣場上，多數西格瑪並沒有參與到核心，但在當時以老



林朝成、陳信行。

師身分到場支持學運的西格瑪林朝成眼中，在廣場中參與學運的西格瑪，是相當成熟的在表達自己想法的。同時，在校園中的西格瑪，也與經緯社、台研社、台文社、環保社等社團共同在民主牆前，以演講、大字報等方式呼籲學生北上支援學運。

時代之所趨

在參與了一連串的社會運動過後，被劃定為異議性社團的西格瑪，很容易地被主流劃定為站在主流要打擊的一方，使西格瑪在校園中被貼上了「民進黨」的標籤，並且隨著標籤效果的加深，影響了西格瑪的招生與行動。

1980年代開啟的狂飆年代，隨著1991年清華大學獨台會案的結束逐漸沉寂，臺灣的社會漸漸地來到一個穩定的時期，而西格瑪也隨著時代結束了校內社團時期。如今，兩代的西格瑪仍在網路上有所交

流，雖然曾在德簡書院有過類似華山論劍的爭鋒，有著不一樣的行動軌跡，但西格瑪仍然是西格瑪，他們相似的地方往往多過不同的地方。

西格瑪精神

數學符號中的西格瑪 Σ ，是代表同類項之和的數學符號，那麼西格瑪社又是代表著什麼？

西格瑪是無法歸類的……

在西格瑪通訊27期的封面說明了西格瑪的精神，無法歸類，西格瑪沒有組織，沒有社員認證，在這裡沒有人會被框架束縛。

我是西格瑪畢業的！

對西格瑪來說，他們自己創辦了一所大學，在裡面什麼系的人通通都有，每個人也都有自己的意見與



陳瑞麟捐贈學生時期收藏之社團文物，由會議主持人陳恒安與博物館典藏組同仁李侑歡代表接受。

想法，因此「爭執」便成為了家常便飯，但是在爭執過後並不會因此壞了感情，因為每個人都尊重對方的自我，尊重對方是一個不同的西格瑪。如果說數學符號的西格瑪是同類相之和，那麼西格瑪應該是同類項的「相加」，並且始終互相刺激互相補益，最終經由每位西格瑪的連接到達無限的團體。

不一樣的時代，一樣的西格瑪

西格瑪不管在談什麼議題，不管用什麼態度在談。這十幾年來，老的跟新的西格瑪大概都共有的一種精神，就是我們享受跨越藩籬的快感，尤其是知識的藩籬。——陳信行 野百合西格瑪 成大造船系78級

將西格瑪的歷史攤開後，你會發現，從老西格瑪到野百合西格瑪之間的行動轉向，其實是一個長達三十年的演化過程。最初代的西格瑪，就是一群對理工以外知識有興趣的理工青年，他們不甘於只站

在生命的一個片面，便開始接觸一些人文的東西，漸漸地向人文轉向；而當他們開始接觸到人文的關懷後，這些新的思潮又隨著時代的變化，慢慢的轉化為行動，造就出兩代表面看似不同卻又透漏出一股相同氣息的西格瑪。

伴隨著歷史社會條件的快速變遷，1970年代中期以後的西格瑪，他們與上一代的差別、異質不只因為個別的心性，也因為不同的時代向著不同世代的西格瑪問著不同的問題，使得不同世代的西格瑪做出也許不同的解答。

在老少的西格瑪中，我都看到了同樣不安分的靈魂，在各自的時代中盡情的攪動著校園。如果說西格瑪的行動是因時代而轉向，那我認為同樣的西格瑪也在創造時代，他們在時代中拓荒，在成大的校史中開展出屬於他們獨特的樣貌。

2022年10月～2022年12月校園大事記

圖文資料來源\編輯室

10月

October

2022-10-06 成大與東海合辦「高教跨域與前瞻扎根」高峰論壇 推廣跨領域教學成果

國立成功大學社會科學院與東海大學社會科學院 10 月 1、2 日舉辦「人文社會前瞻人才培育高峰論壇」，邀請成功大學、東海大學、暨南大學分享執行教育部人文社會與科技前瞻人才培育計畫和「素養導向高教學習創新計畫」的研究成果。

2022-10-07 新北與成大簽署土砂災害防治合作備忘錄 侯友宜：及時應變 持續提升防災量能

新北市政府與國立成功大學簽署「土砂災害防治合作備忘錄」，未來也將加入「亞太防災訓練平台」。市長侯友宜表示，面對災害和極端氣候要及時做好準備。新北透過官學合作、臺日合作，盼將災害減至最低。

2022-10-13 成大醫材創新唯一連續 3 年獲得國際健康長壽大挑戰計畫之機構

國立成功大學前瞻醫療器材科技中心成員籌組團隊參加國際徵案，連續3年獲得由中研院及美國國家醫學院發起之「健康長壽大挑戰計畫」的「催化創新獎」！2022 年該計畫8 組獲選團隊，其中 3 組團隊成員出自成大前瞻醫材中心。



未來交通智慧永續 2022 年六都交通運輸論壇 成大攜手六都交通局邁向綠能智慧城市。



全國唯一獲獎頂大 2022 資誠永續影響力獎成大永續漁電奪銅獎。

2022-10-14 美·力·成功 藝術共好 成大與南美館簽署合作意向書

國立成功大學與臺南市美術館簽署合作意向書，預計延伸教學現場與當代藝術場域結合，擴大成大師生藝術生態圈；透過產學合作共享資源及相關行政支援，促成藝術推動、人才培育及學術研究等藝術共好計畫。

未來交通智慧永續 2022 年六都交通運輸論壇 成大攜手六都交通局邁向綠能智慧城市

2022 年六都交通運輸論壇，10 月 14 日在國立成功大學舉行。六都交通局、各大運輸系統業者皆派代表出席。臺南市副市長戴謙致詞時提到，希望能透過產官學研各界人士，彼此交換專業意見。

2022-10-20 全國唯一獲獎頂大 2022 資誠永續影響力獎成大永續漁電奪銅獎

國立成功大學參加 2022 第六屆資誠永續影響力獎競賽，在社會創新組中，以「永續漁電」榮獲銅獎，「踏溯臺南」及「相伴 2026」也雙雙入選。成大不僅是獲得最多獎項肯定的大學，也是金銀銅 3 個獎項中唯一獲獎的大專校院。

2022-10-25 臺美華語教育再添盟友 成大與美國路易斯安那傑為大學締約合作

國立成功大學與美國路易斯安那傑為大學（Xavier University of Louisiana）在外交部駐休士頓辦事處代表的見證下，於臺灣時間 10 月 25 日上午視訊同步簽署雙邊合作備忘錄，共同推廣華語教育與臺灣優華語計畫。

2022-10-28 成大「成蝶計畫」與國際知名半導體供應商帆宣 攜手打造國際高階人才

國立成功大學2019年推動成蝶計畫以來，陸續與10間國際知名企業合作，建立多元的產學合作人才育成平台。10月28日與帆宣系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簽署國際高階人才培育合作備忘錄，將提供成大學生到該企業實習。

2022-10-31 國立成功大學校長遴選結果出爐 沈孟儒當選成大第18任校長

國立成功大學校長遴選結果揭曉，由沈孟儒當選第18任校長，於112年2月1日正式上任。新任校長沈孟儒，1966年生，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學士（1993年），牛津大學生理所博士（2002年），現為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藥理學研究所特聘教授，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兼任主治醫師。



成大「成蝶計畫」與國際知名半導體供應商帆宣 攜手打造國際高階人才。

11月

November

2022-11-03

金融資安實境演練 成大與永豐產學攜手強化資安人才培育2022-1

國立成功大學與永豐商業銀行產學專案「金融資安攻防模擬平台」10月3日在成大電機系舉辦「金融資安攻防競賽」，雙方共計派出20位人員，透過資安攻防搶旗賽（Capture The Flag, CTF），實境演練金融資安攻防戰力。

2022-11-07

成大 90 週年紀念酒包裝設計 榮獲美國 IDEA 及臺灣金點設計獎獎章

國立成功大學 90 週年紀念酒的包裝設計接連榮獲 2022「美國國際設計卓越獎 IDEA-Finalist」及 2022「臺灣金點設計獎（Golden Pin Design Award）」，並將於 11 月 29 日開始的臺灣金點設計獎展覽參展。

2022-11-08

【91週年校慶】推動校園數位化 成大啟用數位證明平台首創中英文成績單加密

國立成功大學 111 學年度正式啟用「成大數位證明平台」，採用教育部數位學位證書核心發證與驗證技術，現階段成大已提供學生申請中、英文數位成績單，提昇獎學金申請、升學或求職資格審查等申辦效率。

2022-11-09

英國 QS 發布 2023 亞洲大學排名 成大進入排名第 36

英國高等教育調查機構QS今天發布2023亞洲大學排名，臺灣進入排名的大學院校有47所，其中有9所進入前100強，以國立臺灣大學表現最佳，在亞洲排名第19。其次為國立成功大學，在亞洲排名第36。

播植科技人文種子 看見更大的世界 成大啟端館正式啟用

國立成功大學9日上午在自強校區舉行「啟端館」啟用儀式，由奇景光電董事長吳炳昇、成大校長蘇慧貞、電資學院暨敏求智慧運算學院院長詹寶珠、智慧半導體及永續製造學院院長蘇炎坤及電機系系主任林志隆共同揭幕。

2022-11-15 美國路易斯安那傑為大學校長訪問成大 肯定兩校以語言文化為合作開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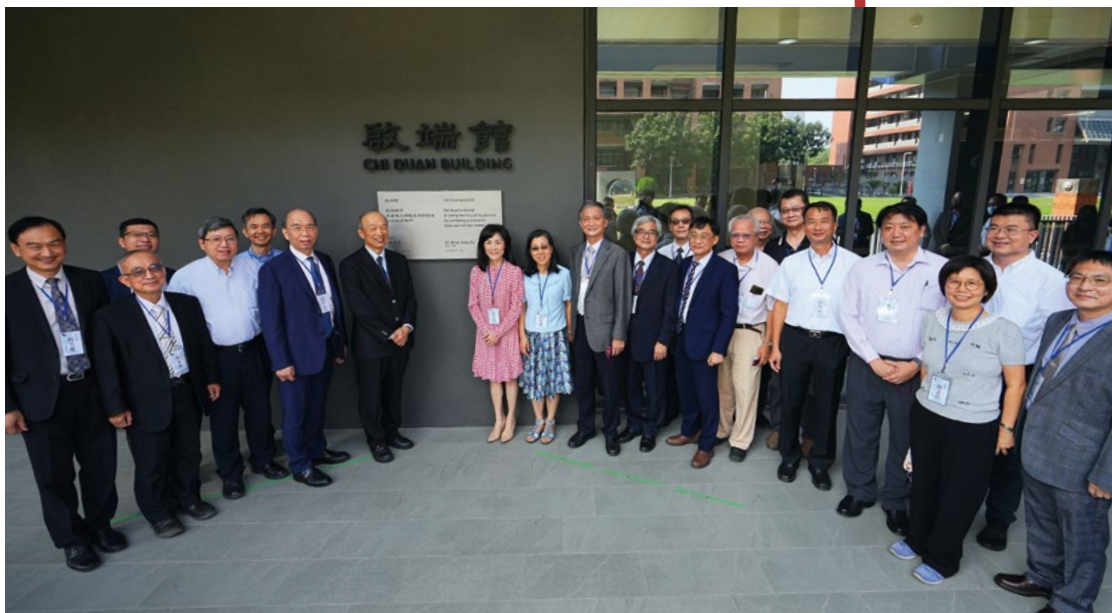
路易斯安那傑為大學（Xavier University of Louisiana）校長雷諾德·弗雷特（Reynold Verreta）由教育部國際司陪同於 11 月 10 至 11 日蒞臨國立成功大學與成大師長對談、參訪文學院與華語中心、參與校慶運動會開幕及成大海外教育展等。

2022-11-16 成大校長蘇慧貞獲頒 2022 全球企業永續獎（GCSA）傑出人物獎

國立成功大學校長蘇慧貞16日出席於臺北圓山大飯店舉行的「2022 第五屆全球企業永續論壇（GCSF）開幕式暨聯合頒獎典禮」，經臺南市市長黃偉哲與億載會會長陳麗芬共同推薦，獲選 2022 年全球永續獎（GCSA）「傑出人物獎（Outstanding Professional）」。

2022-11-23 SATU 校長論壇疫後首度回歸實體 9 國大學代表齊聚成大共議永續策略

臺灣與東南亞暨南亞大學校長論壇（SATU Presidents' Forum）雙年大會暨年度推動委員會議今（23）日於國立成功大學大成館盛大開幕，邀集來自臺灣、印度、印尼、馬來西亞、越南、泰國、新加坡、菲律賓、汶萊等國際夥伴學校之校長或代表共襄盛舉。本次大會主軸為「永續聯盟：從未知與挑戰探討全球策略夥伴合作」，即日起接連 2 天將聚焦「開放科學與知識共享」、「策略合作」及「永續發展」等議題，探討未來高等教育的願景與挑戰。



播植科技人文種子 看見更大的世界 成大啟端館正式啟用。



臺南低碳城市會議成大登場 集結跨界量能推動永續人才培育。

SATU 校長論壇疫後首度回歸實體 9 國大學代表齊聚成大共議永續策略。

2022-11-24 2022 SATU 校長論壇閉幕式 近百名代表共同簽署邁向永續未來發展宣言

臺灣與東南亞暨南亞大學校長論壇（SATU Presidents' Forum）雙年大會暨年度推動委員會 24 日於成大舉辦閉幕式，由 SATU 校長論壇主席暨成大校長蘇慧貞帶領現場貴賓回顧歷年成果，同時宣布會員校共同簽署的「SATU 迎向永續未來發展宣言」內容。

2022-11-29 臺南低碳城市會議成大登場 集結跨界量能推動永續人才培育

2022 臺南低碳城市會議 29 日在成大未來館舉行，國立成功大學與臺南市政府、歐洲在臺商務協會-低碳倡議行動（ECCT-LCI）、沙崙智慧產業創新聯盟四方更新簽署合作備忘錄，今年會議論壇以「永續城市之奠基：節能與綠建築」為主軸。

12月

December

2022-12-02 成大校長蘇慧貞、校友陳其宏獲頒第二十四屆科技管理最高榮譽個人獎

科技管理及永續創新同獲殊榮！國立成功大學校長蘇慧貞及「國立成功大學全球校友總會」第一屆理事長陳其宏，分別獲頒中華民國科技管理學會第二十四屆科技管理最高榮譽個人獎。

2022-12-05 成大新校長沈孟儒明年2/1上任 強調落實校園關懷文化

前成大醫院院長沈孟儒當選成功大學第十八任校長。成大五日為沈孟儒舉辦媒體見面會，說明未來治校理念，沈孟儒表示，首要工作就是落實校園關懷文化，將成立大一新生支持辦公室，也將加強心輔資源，讓師生幸福有感。

2022-12-06 三度成為 The Earthshot Prize 提名單位 成大誠邀各界為地球永續共盡心力

由英國威廉王子設立的「為地球奮鬥獎（The Earthshot Prize）」即日起到 12 月 25 日徵件中，國立成功大學第三度獲邀成為 The Earthshot Prize（TEP）官方提名單位，成為全臺唯一受邀、具有提名權的機構。

2021-12-09 成大成醫攜手共創產研醫平台 將與 FlyingV 打造全臺首座數位精準健康生醫聚合器（Aggregator）

「2022 智慧醫療創新醫材國際學術論壇與成果發表暨產學醫交流會」邀請產官學研醫各界人士及臺灣生醫、醫材產業代表共襄盛舉。也與臺灣知名群眾募資 FlyingV 集團的 FlyingVest Ventures 曙光網路加速器共同簽署合作意向書。

數位牙科新境界 全國唯一國產牙科醫材教學訓練中心成大揭牌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牙醫學系暨口腔醫學研究所9日成立「數位模擬教學中心」，共同展望數位牙科新境界。

波蘭科學與高等教育部訪問成大 建立科研合作永續根基

波蘭科學與高等教育部政務次長托馬斯·雷姆科夫斯基（Tomasz Rzymkowski）一行9日在教育部分國際司陪同下拜會國立成功大學校長蘇慧貞及校內主管。會中也邀請成大校長蘇慧貞擔任該學院醫學委員會委員。



成大新校長沈孟儒明年 2/1 上任
強調落實校園關懷文化。

2022

11/15-11/16

國際會議廳 第二演講廳

November 15th -16th (Tue.-We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Hall
2nd Lecture Room國立成功大學博物館
校史與機構史研討會

11/15 Day 1

09:30-10:00	報到 第二演講室
10:00-10:10	開幕式 成大博物館 吳秉聲館長致詞 成功大學 陳玉女副校長致詞
10:10-10:15	大合照
10:15-11:25	專題演講1 主持人：王秀雲 演講人：Troy Reeves (Oral Historia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何謂口述歷史：為何對記錄校史至為重要？ Oral History: What is it? And why is it vital to documenting a university's history?
11:25-11:30	休息
11:30-12:20	專題演講2 主持人：楊倍昌 演講人：林崇熙 (國家教育研究院 院長) 校史在於揭露：博物館作為一種方法
12:20-13:30	午餐 (多功能廳)
論文發表第一場 主持暨與談人：王健文	
13:30-13:45	陳恒安 為什麼我們需要「符合當代」的校史與大學史的書寫與研究？
13:45-14:00	連克 國立成功大學校本部Google街景史
14:00-14:15	蕭宇泰 見證政策轉變的國立成功大學校本部校區變遷
14:15-14:30	簡宏逸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所存日本時代學籍簿：內容、校勘、故事
14:30-14:45	與談
14:45-15:05	茶敘
論文發表第二場 主持暨與談人：陳政宏	
15:05-15:20	李貽峻 「故鄉、異鄉、歸鄉」：成大醫學院創院院長認同之旅的心理傳記探查
15:20-15:35	廖伯豪 物中的校史密碼—以成大電機系傳世與成大博物館藏物理系教學文物研究為例
15:35-15:50	許哲兢、陳滄潔 成大校園白恐案件的轉譯與應用—以吳聲達案為例
15:50-15:55	休息
15:55-16:10	劉韋廷 學者與歷史：道教研究在成大的發軔(1975-2013)
16:10-16:25	王政中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系與臺灣史研究(1969-1994)
16:25-16:40	曾令毅 近代臺灣航空發展與「成大」：航空技術的人與事(1931-1972)
16:40-16:55	與談
16:55-	第一天結束

議程

Day 1

On University and Institutional History A Seminar by NCKU

2022

11/15 - 11/16

國際會議廳 第二演講廳

November 15th -16th (Tue.-We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Hall
2nd Lecture Room國立成功大學博物館
校史與機構史研討會

11/16 Day 2

09:30-10:00	報到 第二演講室
10:00-10:50	專題演講3 主持人：顧盼 演講人：田中友香理 Yukari Tanaka（筑波大學人文社會研究科 助理教授） 筑波大學的歷史和檔案：建校150週年 筑波大学の歴史とアーカイブズ—創基150年の年に—
10:50-10:55	休息
論文發表第三場 主持暨與談人：楊尹瑄	
10:55-11:10	張晉維 東方MIT與今日建築：奇美拉之外的現代建築教育「機構」
11:10-11:25	張筱梅 公費分發制度影響下的醫學生培訓：以1970至80年代陽明醫學院為例
11:25-11:40	張安琪 藝術與政治：1960-1980年代臺灣省立博物館的展示轉型
11:40-11:55	彭煥勝 從新竹師專的校史看師範生的學生生活
11:55-12:10	與談
12:10-13:10	午餐（多功能廳）
校史共筆——你與我與他的成大 主持暨與談人：陳恒安	
13:10-13:25	蔡侑樺 國立成功大學的校園規劃發展歷程
13:25-13:40	廖淑芳 論成大力行校區家寶醫學研究室的保存意義
13:40-13:55	李柏霖 校史數位化及其應用討論——以國立成功大學校史資料庫平台為例
13:55-14:10	曹沛雯 成大校刊
14:10-14:15	休息
14:15-14:30	王立儀 校史的幻想：衣櫃
14:30-14:45	孫嘉穗 學生運動與社會參與
14:45-15:00	與談
15:00-15:20	茶敘
成大校友座談 主持人：王健文	
15:20-16:50	與談人—成大野百合時代的西格瑪社員： 林朝成、翁註重、陳信行、陳瑞麟、黃吉川、劉怡維
16:50-	閉幕，賦歸

議程

Day 2

On University and Institutional History A Seminar by NCKU